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  
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21 年)

## 目录

已经重整旗鼓，更要策马扬鞭 .....	2
2020 年底昌硕和世硕两厂讨要返费斗争经验教训总结 .....	8
中国资产阶级会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吗？ .....	34
我参与左翼学生社团的一些心得体会 .....	37
工人斗争与民主的关系 .....	52
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在中国争取民主的真正力量 .....	54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能有“运动”？ .....	58
庸俗“灌输论”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温床 .....	62
要善于想象革命 .....	64
在没有希望与女朋友的年代，北一辉很可怕吗 .....	70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好？ .....	75
向网友介绍“红色经济观察”和“红色能源观察” .....	79
关于 HP 先生可能被驱逐出境的问题 .....	82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与阶级斗争 .....	87
中国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工业体系的国家吗？ .....	100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说说“中国经济，细思极恐” .....	113
试论无产阶级持久战及“躺平”在阶级斗争中的战略意义 .....	121

## 红色中国新年笔谈：已经重整旗鼓，更要策马扬鞭

（2021年1月1日）

井冈山卫士

2020年将作为新自由主义走向崩溃的“元年”载入史册。

曾经的新自由主义是多么地不可阻挡。四十多年前它用大屠杀、大逮捕和“芝加哥男孩”宣布了自己的诞生，三十多年前它用倒塌的柏林墙为自己开路；二十年前它把战旗插到了“帝国坟场”，妄图藐视一切历史规律；十多年前还有大国的总理说《国富论》是自己的床头读物，用以表达对自由贸易的忠诚。现在它竟输给了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子弹打不死它，飞机炸不烂它，《纽约时报》的大忽悠骗不了它，连华尔街的美元都收买不了它。曾经宣布“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竟然对新冠病毒束手无策，这就是2020年的世界。

新自由主义是政策，是意识形态，也是一系列阶级关系或者社会契约的统称。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社会契约是大政府资本主义没落之后的产物，其本质是没落工人贵族的社会契约。一方面，劳动人民不在政治上挑战资本主义，也不在经济政策上挑战全球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剥削海外剩余价值并且向本国工人再分配的方式来维持其实际生活水平。同时，资产阶级形式民主仍然在运转，在一些并非涉及到资产阶级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如同性恋权利）向小资产阶级做出形式上的让步。尽管核心国家高工资高福利的时代已经过去，其劳动人民仍然享受着相当的物质待遇，这是其阶级关系稳定的物质基础。

在有着还算相对健全的国家机器的半外围国家，新自由主义社会契约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和民族解放运动腐化的产物，其本质是经济增长的社会契约。一方面，劳动人民同样不去挑战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要么通过出口自然资源、要么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向人民承诺在两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实现核心国家生活水平的六成至七成（美其名曰“基本现代化”、“全面现代化”）。至于资产阶级形式民主，要么没有，有的话也无法有效运行。理由很简单：太贵了，养不起。

工人贵族契约的关键点在于当下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在于工资，工资在于工作。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摧毁了过去长期稳定的就业关系，把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甩到了不稳定的服务业。产业转移则直接把整县整城的就业和社会结构全部摧毁。越是没有就业，就越需要进口便宜的消费品来维持社会稳定。增长的社会契约的关键点在于未来的生活水平，也就是在于增长率。从供给（生产）的角度讲，增长率由投资决定，投资由储蓄决定，储蓄则是收入分配的结果。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越高，储蓄率通常也越高。所以，外围半外围国家的低工资，同时维持了本国高增长以及核心国家高生活水准两方面的社会妥协。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没能看到历史的终结，倒是看到了自己的终结。廉价消费品已经逐渐无法补偿核心国家工人丢工作丢福利的损失。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全球化群众运动明确提出了反对非法移民、让制造业迁回美国的诉求。这是核心国家工人保护本国劳动力市场斗争的一部分。在中国这样的半外围国家，高资本积累吸纳了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利润份额下降，工资份额上升，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越来越难以满足，直接威胁利润率。在两方面社会契约都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新冠瘟疫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资产阶级的困难。

**资产阶级不是傻瓜，他们也在构想如何塑造未来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契约。**总体而言，资产阶级不会放弃全球化、私有化和去管制等新自由主义时代维持利润率的基本政策，但是其他的社会关系需要进行重大调整。**目前由世界经济论坛牵头的，由世界资产阶级主流支持的所谓“大重启”，就是这种社会契约的一种构想。**具体而言，可能包括如下几项：第一，在所有积累秩序大体稳定的地区，如东亚、北美、欧洲实行高技术资产阶级专政，把所有人的身份、社交媒体、病历、银行账户等信息纳入资产阶级统一管理的网络系统，展开全面的社会控制。第二，在核心国家逐渐废除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用普遍的舞弊造假支配选举，建立寡头政治；逐渐取消政治自由，执行言论审查，消灭对资产阶级不利的信息，对群众运动积极分子（如特朗普的积极支持者）展开政治迫害。第三，强迫东亚劳动人民继续维持 996 血汗工厂的劳动模式，继续向世界其他地方贡献剩余价值，维持资产阶级专制制度不变。第四，放弃北美、欧洲本地的工人阶级，削减社会福利，大量引进移民劳工压制工资水平和工人谈判力。第五，对于那些无法维持稳定积累秩序的地区，如中东北非，在不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和其他地区连锁反应的情况下放任其自生自灭。

第六，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想要完成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如俄罗斯），试图将其拉入世界分工体系，如果不成功，则按第五条方式处理。一句话概括，他们想要建立一个中国资产阶级出钱出货、核心国家资产阶级出枪出芯片的高技术资本主义“全球理想国”。如果这能称得上是个社会契约的话，那么缔约方就只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享受高利润；小资产阶级中依附于高科技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部分可以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负责资产阶级文化再生产、充当意识形态打手的小资产阶级则享受次一级的生活待遇。

当然，这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可能的构想（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今天的世界资产阶级比四十年前新自由主义时代初期要虚弱得多。首先，美国世界霸权相对衰落，为全球资本主义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大为下降，各国资本家的相互协调开始出现问题；美国全方位的地缘战略撤退已经是迫在眉睫。第二，近二十年来，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武力扶植的傀儡政权都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傀儡政权基本上是政令不出首都，美军一撤就要关门歇业。第三，核心国家内部的反全球化运动已经脱离传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控制，向广泛的群众运动方向发展。第四，中国阶级斗争的条件正在走向成熟，并可能在未来给全球产品链造成重大冲击。第五，不仅“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子虚乌有的炒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量也已经基本耗尽，技术进步的速度正在减缓（而不是加快）。第六，技术总是由人操纵的，越复杂的技术，尤其是要掌控整个社会的技术，经手的人就会越多，经历的社会关系就越复杂。号称无所不能的中国大数据系统，却常常被地方和基层官僚把数据拿出去卖钱，以至于上海的全部党员信息都被挂出去卖了；而一切真刀真枪的镇压行动，还是要由真人来干。所以，以后真要爆发社会革命，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物质手段“代差”，决不会超过日本侵略者和八路军之间的武器代差。

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所在的历史节点。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到今年，放到中国国内，也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民族主义者，或曰“小粉红”在上半年风顺顺水，但在下半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平心而论，中国的抗疫工作是有效的，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是不行的，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自尊心的提升，让小粉红们扬眉吐气了一把。但是，抗疫完成之后的日子还是要过，解决了生存问题却不解决生活问题是不行的。经济恢复缓慢，就业市场疲软，工作时间长、

强度大又时刻会被开除的窘况，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绕不过去的坎。自由派观察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比如他们在年底就通过社交媒体放出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但对自己的未来却十分绝望**”。我们深入想想的话就会发现，这句话的前半部分讲的实际上是小粉红“粉”的部分，即民族主义的部分；后半部分讲的是小粉红“红”的部分，即社会主义的倾向。这两部分的冲突实际上是小粉红自身所面对的阶级斗争趋于白热化的反映。中国在世界体系内地位的上升确实带来了某种生活水平水涨船高的可能性，然而这水涨船高的好处多数小粉红却没捞着。“粉”与“红”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在过去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小粉红的生活状况还没有窘迫到迫使他们去选择“粉”或者选择“红”的地步。资产阶级当然希望他们选择“粉”，所以包括观察者网在内的的媒体都在宣传所谓“入关学”、污蔑美国劳动人民都是“匪帮”，试图将阶级矛盾转嫁为民族矛盾，这在疫情期间尤其明显。《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也“不失时机”地讨论毛泽东的“错误”，主动和进步运动保持距离。不过，**中国资产阶级是不敢也没有能力“入关”挑战美国霸权的，民族主义的“入关”梦永远都是梦**，小粉红“粉”的方面永远不会被兑现。中国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发展既不会给小粉红经济上的富足，也不会政治上让他们扬眉吐气，**“小粉红”弃粉转红已经成为时代潮流**。

如果说民族主义者遇到的是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那么**自由派遇到的就是一盘死棋**。中国自由派的高级货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受益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渴望政治民主是假，想把自己的技术和管理技能卖给出价更高的外国雇主是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基本满足了他们的经济诉求，而未来“大重启”的技术专制主义路线则更能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他们最多在某些具体生活的不便上对资产阶级有些牢骚，至于想要“推墙”、“沉船”那是万万不敢的。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减速的这几年里，原本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跌落到了和无产阶级差不多的水平，成为了边缘化小资产阶级。其中还有朴素正义感的部分可能被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吸引，而其中“失败的利己主义者”则构成了自由派的低端货。他们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理想或完整的建国方略，只能作为现有的某些政治派别的对立面而存在。既要反“粉”，也要反“红”；既要反民族主义，也要反社会主义；既要反对在世界体系内地位的上升，也要反对人民群众打击资本和维护正义的一切斗争。**简单来说，就是在一切主要方向上都站到了多数人的对立面**。中国自由派的麻

烦还不止这些，他们在美国的阶级斗争中首鼠两端、举棋不定。高端自由派投靠美国资产阶级的主流集团民主党，实际全盘接受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低端自由派则出于民族自恨情绪支持美国群众斗争的代表特朗普。究竟是反“共”，还是反华，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对社会主义？在可预见的未来，自由派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的，也是找不到出路的。

**中国的进步左派运动在佳士工人运动中遭到了阶段性的失败。**学生组织被打垮了，社会组织受到严厉看管，许多积极分子被迫害，失去了组织支持的进步学生只能在黑暗中继续探索；**有些人自杀了，有些人还在战斗。**不过资本主义主要矛盾仍在发生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进步事业中来。以往的进步运动积极群体是相互隔绝的，老工人一摊子，新工人一摊子，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一摊子，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联合起来，从未真正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但是，资本主义帮我们建立了这些联系。就在2020年，一些高中生开始独立组建进步社团开展社会工作，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中学生的群体中实际上有着较为严格的等级划分：排名靠后的学生通常会进入专科学校，他们很早就知道自己成不了人上人，故而形成一个以“混社会”为核心意识形态的圈子；而那些排名靠前的学生则很多有着统治阶级预备队的骄傲，再不济也能考上一类本科当个白领，在他们当中通常会形成以竞争为核心的尖子群体。根据学校和班级掌握教育资源的多少，这两个圈子的相对大小也会不同，但通常是没有重合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减速改变了这一切。“尖子”就算考上好学校，成为上层小资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更别说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了。中国的半外围地位将绝大多数人口锁定在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职位上，多数人的出路和“混子”没有两样。“混子”的圈子逐渐扩大，与“尖子”的圈子开始重合。原本被边缘化的反抗资本主义教育体制的活动，现在越来越能得到“尖子”的支持。这些**中学里的进步社团现在还显稚嫩，但是不失为培养未来进步青年的演兵场。**与此同时，大量**弃粉转红**的人扩展了左翼进步运动的群众基础。原本几个宗派团体带头大哥就能呼风唤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群众斗争杰出人物还会涌现出来，中国劳动人民从不缺少英雄。

新自由主义的灯塔熄灭了，资产阶级在收缩力量重整积累秩序。民族主义者陷入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分裂，自由派的末日余晖已近在眼前，这就是2020年。历史规律不会消

失，主要矛盾还在发展。中国的进步运动已经脱离了民族主义的襁褓，正在甩掉宗派主义的枷锁，也必将打碎中国这个世界体系的关键环节，为世界人民的斗争开辟道路。

已经重整旗鼓，更要策马扬鞭。中国劳动人民英雄时代的大幕就要拉开了！这就是2021年。



编注：这篇文章篇幅宏大，内容详实，详细讨论了去年底上海郊区两个苹果手机代工厂工人为了夺回应得“返费”而开展的斗争，探讨了斗争取得基本胜利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作者并且对部分左派积极分子在这两次斗争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了批评。作者对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左派作用的批评，主要在文章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中。

## 2020年底昌硕和世硕两厂讨要“返费”斗争经验教训总结，兼谈某些“左派”的反动作用 (2021年3月10日)

### 浦江边的火柿子

2020年底的昌硕&世硕运动影响较大，虽然资料缺乏并且杂乱无章，我们仍然会尽可能地复现当时的情况。

#### 一、分析

中国资产阶级是依靠对亿万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才得以发展壮大的，但是，自从资本主义复辟四十年来，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总量正在不断的减少，劳动力成本正在不断的提高，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正在不断的增强，资产阶级剥削得到的剩余价值正在不断减少，这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利润率必然下降，而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了，资产阶级的日子就到头了，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因此，中国资产阶级面对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它们退无可退，不打垮无产阶级，就会被无产阶级所打垮。

在这次运动中，资方一直都是采取“少给一点是一点”的态度，尽一切可能去压榨工人，想方设法克扣工人的工资，这说明在半外围国家，拖欠工资和胡乱罚款不仅是“规训”劳动力的手段，而且是资方的一笔常态化收入来源。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便是它们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为了这一目的，他们通过许诺高额返费来欺骗工人，像传销那样雇佣大量学生工、临时工，通过层层分包实现劳动控制，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无法维持资本主义正常的科层制管理体系，中国资产阶级看似强大，但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利润去收买工人，它们畏惧工人运动，对于工人运动是完全的反对。

官僚当局在运动中也显现出摇摆的态度。斗争前期，工人阶级与官僚当局发生激烈对抗，但昌硕前期的工人的斗争并没有因为镇压而停滞，世硕工人的斗争更是顶着官僚当局的压力持续数日，这说明官僚当局并不是像某些左派说的那样强大，暴力机器也会因为高涨的工人运动而显示出它的外强中干。而在斗争中期，资产阶级不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工人阶级也不愿接受就这么结束了，劳资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很有可能再次爆发冲突。为了维持官僚当局的统治稳定，为了将阶级矛盾限制在不打破现行秩序的范围内，官僚当局在中期出面调停，通过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手段使昌硕将返费由70%提高至90%，世硕也是如此，这说明官僚当局并不是如一些左派所说的那样，只会偏袒资产阶级，而不做出让步，官僚当局的生命线是它的统治合法性，而官僚当局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力-利益交换”关系则是次要的。运动后期，经过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官僚当局三方之间的斗争与

妥协后，达成了一个能使大多数人工人接受的结果（也包括被迫接受的结果），各方也就逐步降温，运动走向结束。

昌硕运动中，左派扮演了极为反动的角色。左派一开始的宣传便造成绝大多数工人的厌恶，使得资产阶级自由派得以借助工人对左派的厌恶，大幅削弱了运动中左派的影响力。而在左派被削弱后，其余左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联合，为自由派欺骗工人的行动辩护，帮助资产阶级分化打击工人，在绝大多数工人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在官僚当局已经事先得到消息并且做好了镇压工人的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在最终结果得到绝大多数工人接受的情况下，组织了一场就连左派自己都非常清楚的知道是极有可能遭到镇压的行动，即“12.26 昌硕集会”。这次失败的游行也没有改变最后的结果，反而使得部分工人被抓进看守所，部分工人最终只拿到 30%到 40%的返费。事后，左派对此的解释完全是在一味的推脱，将责任归结为官僚当局的强大与大部分工人的不参与，全然不顾左派自己的决策错误。在昌硕运动中，左派实际上可耻的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令人遗憾。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昌硕的斗争迫使工厂把返费从原定标准的五成左右提高到七成，市政府介入后提高到了九成。世硕的斗争迫使工厂从打九折改为扣几百到一千。虽然距离预定目标有一小段距离，但相较于一开始昌硕的 50%与世硕的 90%，这是个不小的前进，因此可以认为，昌硕&世硕运动是成功的。

## 二、基本情况

昌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台资企业，位于上海浦东新区，距离迪士尼仅 5 公里。2004 年建厂，是与富士康相似的代工厂，承担了部分苹果手机的代工生产，该厂一共设有七个部门，F1 厂是模组加工；F2 是小模组加工；F3 是 iPhone 整机组装生产；F4 是 iPhone 整机组装生产；F5 是 iPhone 整机组装生产；F6 生产苹果笔记本电脑；F7 生产苹果笔记本电脑。

昌硕厂的规模很大，占地 3200 亩，曾经号称有 10 万员工、是上海最大的电子厂；不过近年来员工数量下降不少，现在可能不到七万人。在昌硕的厂区内、外有两个大型的公寓宿舍，由于厂外出租房租金太贵，多数工人会选择住在宿舍里。在厂区和生活区都有食堂，但伙食不太好。工厂方面会给予员工一定的吃、住补贴，但工人仍需自己承担一部分。

昌硕厂的普工/操作工，每月底薪只有 2500 元左右（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为 2480 元）。在旺季订单较多的时候，需要每周工作六天，每天 12 小时，早班：7:30a. m. - 8:00p. m.；晚班：8:00p. m. -8:00a. m. 昼夜两班倒，则每月算上加班费可到手 4500 元左右。然而这些代工厂每年都会有明显的淡、旺季之分，在淡季基本无班可加，则工人只能拿到基本工资，月基本工资大约在 3000-4000 元，考虑到上海的消费水平，工人们也就更倾向于去返费高的厂上班。

值得一提的是，与上海昌硕同样隶属于和硕联合科技的还有昆山的世硕厂、苏州的华硕厂。其中世硕厂今年曾出过三起较大的新闻，第一起发生在 9 月 5 日，几个工作人员在给新员工发放证件时，随手将证件扔到地上，让员工弯腰去捡，导致大量员工愤而离职，该厂三千余名员工，工人们提桶跑路后，世硕仅剩百余名工人，工厂生产线因此瘫痪；第二起发生在 10 月，有工人因为过度加班而猝死；第三起发生在 11 月，世硕厂被曝出使用学生工，随后苹果公司以此为由与其暂停了新业务的合作。而在苏州的工友口中，也流传着“死达方，烂华硕，打死不进佳世达”的顺口溜，可见整个和硕集团都算不得好厂。

### 三、返费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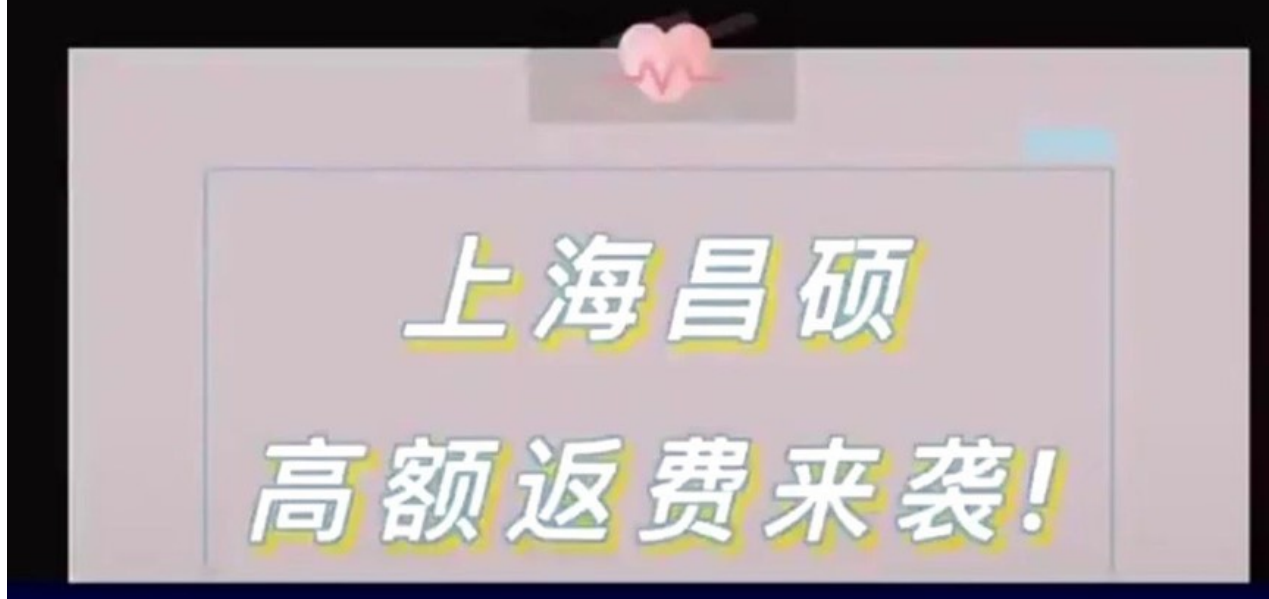
为了节省成本，像昌硕这种代工厂希望在旺季里能有充足的劳动力来完成订单，到了淡季则最好工人们都离职走人。于是，昌硕厂大量使用了劳务派遣，而较少雇佣正式工。在旺季到来时，还会承诺入职打卡满 55 天或 75 天的工人可以得到一大笔返费。结果，工人们为了能获得返费，在约定的两个月或三个月期限到来之前不敢离职，在旺季结束后又会不甘只拿底薪而主动离去，工厂可以随用随招，省下了大笔社保公积金等费用。

工厂首先会找派遣公司，和工人之间隔开一层，工人只能跟派遣公司签合同，不能跟工厂建立劳动关系。这意味着工厂可以随时把工人“退回去”给派遣公司，解雇人无需提前通知或支付赔偿金，若工人被拖欠工资，或发生工伤职业病，工厂也可以耍无赖说不关他们事。其次，工厂和派遣公司会让各地中介帮忙招工。

此外，昌硕厂或派遣公司将招聘工作大量外包给了大大小小的劳务中介所，只有很少一部分工人由工厂直接招聘。每招到一个人，工厂就付给中介一笔费用。通常，中介为了多挣人头费，会承诺在工厂正式的返费标准以上，从自己的费用中返一部分给工人。因此中介又往往会将工资和返费说得高于实际，以便吸引工人。例如，有的中介声称入职 3 个月可以拿到 1.1 万至 1.6 万元的返费、3 个月的总收入能够有两万多元；同时许多中介还会鼓励工人们拿完返费就走人。在这一万多元的返费中，有 8 千元是与昌硕直接签订了协议，剩余的 3 千元则需向派遣公司或中介领取。剩余的返费也出自昌硕之手，但却经由派遣公司或中介发放，后者往往会暗中抽成。然而昌硕的返费工都是有两个返费标准的，一个是中介招人的时候承诺的，一个是在昌硕门口入职的时候，派遣公司和中介逼人在合同上签的标准（不签就不让入职，而中介又会承诺差额由他们来补）。也就是说，合同规定的返费相比于中介所承诺的返费是少了一部分的。另外，昌硕厂之前就多次出现过拖欠返费和无故辞退员工的情况，是著名的黑厂。昌硕厂曾在入职之前骗人说做满 45 天就给 6-7 千返费，结果在员工离职时拖了一个月才给了不到一千返费。

# 上海昌硕科技 | 最后一期高返费招聘，返费高达13500元!

原创 上海昌硕科技 上海昌硕科技 10月20日



除了有返费以外，昌硕厂还有另一种称作“小时工”招聘手段，即许诺付给工人有二十几元甚至三十几元的时薪，按工作时长计算工资；但在入职后实际的时薪只有14元左右（ $2500 \div 21.75 \div 8 \approx 14$ 元），二者的差额要等工作满一定天数后才会发放，称为“差价”。这种支付方式也使得工人不敢轻易离职。

通过上述手段，昌硕厂得以在每年的旺季招得大量的临时工，并在淡季不支付补偿金就将其遣散。在这些“返费工”和“小时工/差价工”中，有不少是被专科学校以实习名义送来的学生工，也有中介从河南、深圳等地招来的工人。其实许多工人都知道许诺的返费和工资可能被克扣，但对于他们而言，也难以找到更有“良心”的工作了。在昌硕，正式工都是领导级别，长期工只是少部分，大多数是短期工和学生工。

## 四、昌硕斗争时间线

由于昌硕从苹果手中接到的订单大大减少（有的工人认为是疫情影响了销量，有的则认为中美贸易战导致）。

2020年4月，昌硕计划在3天内要裁员2万人。为了逼工人就范，自动离职，它仍以领取返费作为要挟。厂方称，如果工人能在4月20至24日数天内完成登记，并在其后3天内完成离职手续，便能获发还返费。但如果拒绝离职，工人会因停产而被逼休假，就要等到七月才可领回返费。同时，上海昌硕不断削减小时工和派遣工、减少全职员工的加班时数等做法亦导致员工不满。

4月20日，因不合理待遇，工人自发包围公司的服务中心，发起大规模地集体抗议行动。斗争持续了数天，最后在昌硕厂给了三分之二返费后，大多数工人都走了。

2020年底，昌硕厂进入淡季。

2020年11月底，厂线组长给作业员开会说，昌硕没订单了，没有加班，要“上四休三”。由于工厂出现了每周“做四休三”的情况，导致工人们只能拿到2500元左右的底薪。此外，世硕再次宣布要延迟一个月发放返费。

2020年12月，昌硕厂又决定将工人强制调往昆山世硕厂支援，并声称到昆山后将享受与上海相同的待遇，并且到约定的期限仍能领到返费和差价；如果拒绝调动，则必须离职。

12月13日，昌硕各部门临时通知去世硕的至少有一万人，已有一批员工前往昆山，有传闻说到调动后他们在上海的工时不被承认，不能够按时领到返费。

结合资方之前的种种行为，工人怀疑这是资方在逼迫工人自行提前离职。

若是提前离职，昌硕结算工资只承认合同上的返费，中介那部分返费公司不管，而中介又立马发出通知，现在离职他们那部分返费就甭想要到了（因为昌硕也没有给中介发钱，工人如果提前离职，中介那部分返费需要中介垫付）。

以下是中介的通知：

### 上海昌硕再次通知！

上海昌硕自愿签离职的，都属于个人问题，员工拿不到返费，代理拿不到利润，只要没到合同期的，没做到返费打卡天数的，没有出名单的，必须不能离职，现在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让员工提前离职的，请知悉！！

这样计算下来，工人最后得到的返费是原来承诺的50%，也就是一万多块钱要被昌硕扣掉一半。

12月18日工人爆发了维权，被当地警方镇压。

12月19日工人再次以更大的规模聚集在工厂门口，5号门、6号门、9号门均爆发了大规模示威，要求确保发放报酬。根据当地受访工人和商贩估计，聚集在秀沿路5号门工人有两三千，整条马路都被封锁了。从网上流传的视频来看，很难判断确切的人数，并且可以看出外圈的工人只是在围观。

在上海浦东昌硕电子厂招收临时工时，该厂许诺：返费是主动给予的，只需打卡60或90天即可获返费13500元或者10000元。而到了发薪日，工友们拿到的返费要么数额不足，要么就根本没拿到。当初许诺的“高额返费”不过就是为了把工人们忽悠来而画的大饼。讨薪的大部分是9月以前进场的这批工人，已经工作超过3个月了。1个月是22个工作日，55个连续工作日相当于3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到了3个月了，工人发现

走不了。工厂要工人继续留在工厂里面，这样的话，他拿不到返费，还有差价，就是每小时额外要多付的工资。对工人来讲，1万块钱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工资下降，返费也将因为没法满足打卡天数大打折扣，



当地警方出动警力进行镇压，有消息称现场的保安、武警约有数百人。根据参与工人事后描述，愤怒的工人在示威中向警方投掷了石块等，冲突不断升级，最后演变为暴力冲突，造成多人受伤，有工人被捕。有消息称，第一次游行的组织者被捕，一名带头讨薪的工人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起诉，可能面临高达5年的监禁。



12月19日傍晚，随着白天冲突的影响不断扩大，知乎上出现问答“如何看待12.19传出的上海昌硕“专业辅警”殴打员工视频及事件？”绝大多数回答仅仅是在抨击官僚当局，只有一个回答在抨击昌硕资方。

12月19日晚，资方召集工人代表进行谈判，给出了如下方案，允许工人们办理离职，并将支付部分返费和差价。

以下是方案：

#### （一）支援世硕

1. 尊重员工个人意愿，于2020/12/21重新调查员工意愿，员工自愿报名。
2. 支援人员维持昌硕薪资福利待遇，加班费依据昌硕薪资标准计算。
3. 支援期间的天数将合并计算到昌硕在职天数，不影响求职补贴（返费）的计算。
4. 支援期间各派遣公司会在世硕驻厂服务，发放补贴及办理离职手续（同在上海的办理模式）。

#### （二）返费工：提前离职求职补贴计算说明

1. 员工求职补贴（返费），公司将在2020/12/21~12/25期间，由派遣公司及中介、员工依据书面证据，进行确认，重新签订确认书，并依据截止2020/12/25的实际在职天数折算。
2. 员工可在2020/12/26-12/30期间办理离职，折算后的求职补贴将会在员工办理离职当天打款至员工账户。
3. 正常薪资于2021/1/10发薪日发放。

#### （三）渠道差价补贴工：提前离职渠道差价补贴计算说明

1. 计薪周期在2020/10/26-11/25期间的渠道差价补贴，在2020/12/25依据入职约定单价及实际出勤工时（正常班时数+加班时数）发放。
2. 计薪周期在2020/11/26-12/25期间的渠道差价补贴，企业在2020/12/26-12/29依据入职约定单价及实际出勤工时（正常班时数+加班时数）计算渠道差价补贴，并在2020/12/30-12/31日发放。正常薪资于2021/1/10发薪日发放。
3. 愿意继续留任的员工·自2020/12/26起同工同酬。

（四）公司真诚希望员工留任，也将努力提升产能，在保证员工休息权的情况下，安排合理的加班。无意愿继续留任之员工，请依各厂通知在2020/12/21~12/25期间分批进行登记，在2020/12/26-12/31分批办理离职，期间可保留员工住宿权限至求职补贴（返费）或渠道差价补贴入账前，入账后须办理离厂手续。

#### （五）合理表达，理性沟通

1. 员工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到派遣员工服务处咨询与沟通，地址园区9栋宿舍楼一



2. 厂区会增派厂级干部，值班协助解决问题。

如有任何疑问，请至派遣员工服务处咨询·以上事宜特此公告！

昌硕 DL 招募部，2020 年 12 月 19 日

2020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对于再派遣问题，

- (1) 12 月 21 日重新调查员工意愿，员工自愿报名。
- (2) 支援人员维持昌硕薪资福利待遇，加班费依据昌硕薪资标准计算。
- (3) 支援期间的天数将合并计算到昌硕在职天数，不影响求职补贴（返费）的计算。

对于派遣工返费问题，

- (1) 2020/12/21~12/25 期间，由派遣公司及中介、员工依据书面证据，进行确认，重新签订确认书，并依据截止 2020/12/25 的实际在职天数折算。
- (2) 工人在 12 月 26 日到 30 日期间办理离职，折算后的返费将会在离职当天打款。

对于渠道差价补贴工问题，

- (1) 计薪周期在 10 月 26 日到 11 月 25 日期间的补贴，在 12 月 25 日依据入职约定单价及实际出勤工时（正常班时数+加班时数）发放。
  - (2) 计薪周期在 11 月 26 日到 12 月 25 日期间的补贴，在 12 月 26 日到 29 日依据入职约定单价及实际出勤工时发放。
  - (3) 愿意继续留任的员工，从 12 月 26 日起同工同酬。
- 此外，正常薪资都将于 2021 年 1 月 10 日发薪日发放。

对于谈判结果，大多数工人不太相信昌硕给的方案，以及不满意厂里对待员工的态度，有工人表示：“如果昌硕真的可以按公告来执行，我们大部分人还是乐意接受的。”一份名为《昌硕运动有感》的文章被左派广泛转发。以下是《昌硕运动有感》：

**抛弃幻想，准备战斗！**

今天上午，也就是 2020 年 12 月 19 日，在上海浦东昌硕科技有限公司门外，发生了让人无比愤慨的一幕：至少 2000 多名被拖欠血汗钱的电子厂工人，满腔怒火的聚集在一起，向压榨他们的公司讨个说法，却遭遇到了警察的无情阻拦，个别工人被警察们粗暴的重拳打倒在地，血流满面，长久不起。此次发生的工人斗争运动和被镇压过程，撕碎了中特帝国虚假伪善的面具，让它的独裁淫威和反动本质彻头彻尾的暴露在人民群众。

上海是中特的经济心脏，在如此纸醉金迷的繁华都城，居然会出现“泥腿子”们联合起来抗争资产阶级的行为，足以说明现阶段的阶级矛盾是多么深刻、多么激烈。讽刺的是直到今天中午，和往常一样，本人还在和网友辩论着，他们心目中的当前的“伟大盛世”是多么幸福安宁、多么国泰民安。和往常一样，今天在各个网络平台上，每一条涉及“美国暴乱”的消息下面，都是狂欢的小粉红们兴高采烈的无脑复读嘲讽，无时无刻不在用“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来彰显自己的优越感。和往常一样，今天的工人们，依旧在陈平之流口中是“低成本劳动优势”，是维持庞大制造业体系运转的人肉电池，是缺胳膊少腿后可以随时更换的廉价商品。和往常一样，联合起来的工人们立刻被政府打成“借助讨薪名义聚众滋事的流氓团伙”，并被国家暴力机关无情镇压。

有意思的是，尽管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应该对被欺骗和压榨剥削的工人们保持同情，但是对待此事的看法立刻就因为观众的自身政治主张而分化为不同的群体。这里主要讲一下某些“保皇派”网左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工人们固然值得“怜悯”，但是这种冲击工厂的“极端错误”暴行让工人们失去了法理优势。“为什么不走法律途径？为什么要如此极端暴力的解决？”他们如此痛心疾首的为工人们感到“惋惜”，好像工人们都是白痴，脑子不好使的暴民，只会暴力的原始物种，只能活该被镇压。

愤怒的工人们，是被逼到了何种地步，才终于联合起来冲击公司，然而迎接他们的，并不是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鱼水情深，而是无情的拳打脚踢和棍棒相加。工人们难道没有家庭、没有亲人？如果法律程序真的管用，一个正常人还会选择暴力方式吗？

先不说那些冗长繁琐的法律程序究竟能拖到什么时候，也不提工人们有没有钱请得起油头粉面的律师，单单是保皇派对于中共政府官僚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就可笑至极：好像青天大老爷的中特官僚根本毫不知情，工人们何须闹事，只需上报官府，老爷们必将重拳出击，用雷霆手段来狠狠惩治黑心老板，就能天下太平，重拾正义，还草民们一个朗朗乾坤，这些对中共充斥着天真臆想的保皇派是不会相信中特眼中的工人和人肉电池并无区别的。

“廉价劳动力”顾名思义，就是随时可替代的商品、人肉电池，死不足惜的工业零件，如此直白的名称，足以证明中共官僚对血汗工厂里面工人的轻蔑态度，跟婆罗门看见达利特贱民一样毫不掩饰的对其从骨髓中散发着的鄙视情绪。但是这些保皇派无视事实，沉浸在自己的主观幻想当中，对中特官僚乃至中共中央的官僚依然存在及其可笑的弥赛亚救世主情景期望，本质上就是自己的立场软弱和奴性发作。

但凡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头脑清晰的左派人士，甚至是一个三观正常的普通人，都不会在这一运动的铁的事实面前无动于衷。中特实质上已经完全蜕变为了大官僚阶级而对大多数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中特社政权已经完全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是反动阶级，是用警察和军队武装自己来镇压人民的统治阶级。认不清这一铁的事实，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醒悟，还自称“左派”、“社会主义”人士，要搞“尊习讨邓”、“社会主义复辟”、“体制内改良”，通通都是放屁，只要这个政权运转一天，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就不会停止，对人民运动的镇压就不会停止。只有抛弃幻想、准备战斗，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才能真正当家做主，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加 QQ 群 935481442 团结起来）

12月20日，部分左派在工人群当中就修正主义与马列主义发生左派内部论战。部分左派学生的宣传造成了工人的厌恶，比如在群里讲六四、佳士。以下是这些左派的部分发言：

第一则：

别讨薪了，没有老板你们咋干活！没有老板你们都活不下去。

第二则：

日本、韩国新生人口雪崩，人口结构急速恶化，老龄化形势严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与警察合谋策划实施的一场盛世人口大屠杀。在警察统治的时代，警察恐吓、镇压群众，向群众耀武扬威，已经被接受和习惯了，但酿成的后果就是把社会的未来和希望谋杀了。

第三则：

理论需要实践，但是正在实践的人却不愿意配合理论。

第四则：

工人同志们，请原谅我们的打扰。但请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说上几句。资本的猖獗，你们都看到了吧，不仅仅要剥削你们，甚至连你们的血汗钱都要抢走。我知道你们都上有老下有小，有所顾虑，但是如果再不起来做出些行动，资本的阴霾不仅仅笼罩在我们头上，更在我们后辈的头上。想象一下，不仅仅是你，连你们的家人，你们孩子都要继续受苦。不，他们的处境可能比你们更加艰难。跟你们说一下你们的现状：

我故意说了一句“没有老板你们怎么活，别讨薪了。”

然后有个人说不讨薪怎么行。

还有人说理论是空话（那个上大专的管理），说白了你们就是想拿回工资，但不想知道为什么你们的工资会被拖欠，也不愿倾听别人的忠告

工人们很担心这些左派在维权群里讨论政治敏感话题，造成群被封，工友被警察抓。工人们一遍遍地重复自己的目的仅仅只是要讨回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别的不考虑。以下是部分工人发言：

要我的思想，根本没有啥阶级，那是政治范畴，普通老百姓管诺干啥，各显神通过好自己就可以有本事多赚钱，多花，没本事少花就行了

维权群的管理员将这些背书的左派打成境外势力，背书的左派被全部踢出群聊，群里的大多数工人开始抵制左派。以下是管理员的部分发言：

你看看他们说的什么，什么天安门事件，这些跟你们工资有毛关系，看清楚，只要资料里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图片的人，不一定是中国人，他们的 QQ 号是收买的不是本人的，谣言你们闹事，是让你们对社会不满，给你们灌输一些不正当思想，脑子放清醒一些，他们肯定私下加了很多，如果你们想平安拿钱回家过年，那就不要听这些话，群里只要是说无产阶级的人，都是进来蛊惑人心的。你们怎么就是非不分

被踢出的左派将抵制他们的行为称为分裂工人运动：

这种人就是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混进来企图分裂工人队伍，更是想阻止我们学生自发的与工人结合的斗争，对于这种工贼我们不仅仅要抵制，更要拉出来批判，要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工人兄弟们不要被这种工贼所迷惑，不要让他们分裂我们的团结，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我们的两个目的才能实现。

为了避免被管理员踢出，余下的部分左派开始自称工人，笔者见到了数十个自称是工人的左派，这些左派开始与管理员步调一致，有些左派成了管理。而在后来组建的外围的维权群中，许多左派一唱一和，积极的鼓动工人上街游行，工人基本上没有发言。

12月22日，一份名为《告昌硕打工人书》开始广泛传播，主要是左派在各个群内转发，有部分自由派。以下是《告昌硕打工人书》：

## 告昌硕打工人书

- 一、公告安抚了骚乱的心，维权释放了压抑、委屈的情绪，但是不知道群主等一系列为讨薪付出的兄弟们怎么样了？你们还好吗？
- 二、流血流泪，才换来解决方案，但昌硕这种不把员工“当人看的工厂”，更不可能有什么诚信可言，刚把大家安抚住就又变卦了（‘员工服务中心’对公告的解释和维权当天厂里给的说法完全不一致，除了恐吓和不屑，没告诉你任何关于返费、差价的解决办法）。
- 三、中介、劳务公司从中作祟，把我们当枪使，怕自己赚不到佣金，极力宣传让员工继续留任或去支援。
- 四、员工三大困境：1、不敢离职。在职都搞不清返费、差价如何发，离职了更可怕。2、支援世硕，世硕的返费都没发员工也在维权，世硕也是上五休二，厂里没有效益最终坑的还是员工，到时候被踢皮球讨薪无门。3、留任，没有加班，饭钱都搞不到。

五、既然别无选择，那我们继续维权，到底，打工人也是人，也有尊严，更有权利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底薪是有法律保护的，提前结束工期按照西方的契约精神是需要给予补偿的，现在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反过来了，我们成了有罪的人。规则真的就是有钱人的游戏吗？

六、维权目的很简单，在离职前明确返费、差价的计算方式，做到公开透明。

七、利益是大家的，合理维权，不是打架闹事。如果人人不出头，不参与，那打工人的日子永远没一点发言权，任人摆布，任人剥削，任人扒皮，我们只是人家的机器罢了。

八、12月26日早上8:30，昌硕5号门，切记合理维权。[抱拳]可以转发、可以截图。

12月23日，一份名为《告全体中介同仁书》开始传播，最开始为一部分左派在各个群内转发，这部分左派不接受工人对文件真实性的质疑，含糊其辞，并未交代文件来源，管理员将部分质疑的工人打成中介与工贼后踢出维权群。以下是《告全体中介同仁书》：

### 告全体中介同仁书

各位中介同仁，大家辛苦了！今年经济形势不好，昌硕订单下降，各个公司利润均受影响。为了企业正常经营，对工人工作做出合理调整，没想到他们却无脑反抗，真是忘恩负义。没有我们中介，那些打工仔如何在大上海找到这么好的工作，拿这么高的返费？我们管理成百上千的工人，挣点钱容易吗？结果这些工人却不知好歹，我们必须得团结起来度过这次危机。大家不用怕，有政府给我们撑腰，我们是合法的生意人，工人敢闹事，起哄，肯定还会被抓。

- 1、工人无非想多拿钱，可惜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唯利是图，大部分人不敢出头，只敢躲在后面捡便宜。只要我们把带头的拿捏了，剩下的就都可以搞定。
- 2、马上就年底了，不管结果怎么样，大部分工人会回家过年，返费少一点，只要不是少太多，他们也能接受。拖得越久，对我们越有利，工人能拿到的返费越低。
- 3、最好让工人走法律渠道，劳动局和法院那么忙，他们能管多少人？何况还有受理时间，需要提高各种证据等等，我们耗得起！很多人签的返费都比当初承诺的低，法律是看证据的，没有证据去哪要那么高的返费？
- 4、注意不要让工人抱团起哄，场面大了，引起社会舆论关注，总归对我们不好。一个一个，一批一批给他们处理。一个一个谈，一切都尽在我们掌控之中。他们人少我们就不怕。

5、各中介公司注意团结，不要轻易和工人妥协否则只会涨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还会给那些没全额拿到返费的工人借口。

注意：此消息仅限在中介同仁中流传，切勿外传！！！！

12月20日到12月23日期间，昌硕内部发布新通告，返费由50%变为70%。

上海					
<p>因企业订单骤减，导致无班可加，现企业正准备全面辞退&amp;劝退员工离职，如未劝退人员二包商利润年后三月份才结算。考虑二包商利润及员工待遇，故现公司给予提前走的政策，如员工被企业清退或开除是没有费用的，政策如下请通知员工： 经协商沟通申请12月底前离职的，日期对应返费，按返费70%的部分打给员工。员工部分离职后两周内打返费，二包商部分1月底发放（包含已打金额）。如有代理不愿意给员工金额的，二包商费用3月1号才结算（包含已打金额）</p>					
面试日期	入职日期	2020/12/10-14号之间离职给予返费金额，随时签离职	2020/12/15-12月21号之间离职给予返费金额，随时签离职	2020/12/22-12月30号之间离职给予返费金额，随时签离职	按天计算模式
2020年10月9日	2020年10月11日	在职满60天的7000。 满30天不满60天的5200	7000	8000	在职满60天离职的，按员工270/天，代理30/天，总价300/天结算（包含已打金额），包离职自离不扣工资。离职后次月10号发同工同酬工资，15号补差价，代理费1月底结算
2020年10月10日	2020年10月12日				
2020年10月11日	2020年10月13日				
2020年10月12日	2020年10月14日				
2020年10月13日	2020年10月15日	3500	在职满60天的5200。满30天不满60天的3500	7000	
2020年10月14日	2020年10月16日				
2020年10月15日	2020年10月17日				
2020年10月16日	2020年10月18日				
2020年10月17日	2020年10月19日				
2020年10月18日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22日	2020年10月24日				
2020年10月23日	2020年10月25日				
2020年10月24日	2020年10月26日	3500	3500	满60天7000，满30天不满60天5200	
2020年10月25日	2020年10月27日				
2020年10月26日	2020年10月28日				

12月23日，上海市政府介入。中介发出两则通告。

第一则：

紧急通知：

上海昌硕，昆山世硕的今天不要签单子哩，明天会有新政策出来！！！！

第二则：

特别通知：

【上海昌硕】的员工请注意，今天上海市政府已经开始介入调查处理返费的事情，提醒大家这两天先不要给厂里签字，再观望拖几天，有好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谁自愿签过的，后果自付！

12月24日，昌硕发布了新的方案，由70%提升至90%。

上海昌硕员工返费金额：

1. 如员工选择提前解绑，在12月底之前离职，则员工返费金额统一为以二包商提供的承诺员工返费金额为基础打九折以后再按天折算，（打完九折后最低不能低于确认书金额）员工返费会在员工签订离职24小时之内支付给员工。【建议马上离职，安心回家过年】
2. 如员工留任，做到原约定期限，则员工返费金额统一以二包商提供的承诺员工返费金额为基础打九折后，在打款日支付。【不建议留任，后续会出现很多事情】

上海昌硕返费工二包商利润：

1. 如员工可以提前解绑，在12月底之前可以离职，则二包商利润按原约定价格打九折后按天折算。且利润会在2月10日之前支付。
2. 如员工留任，做到原约定期限。则二包商利润统一按原约定价格的50%支付，且需到3月1日员工无异常以后再行支付。

最后几天处理，抓住机会，过后不签

中介发布了以下信息：

以下三个是目前昌硕人员问的最多的问题，由于人员较多，导致现在信息都回不过来，希望大家看后不要再发，因为信息真的太多了，回不过来。

问：现在是不是提前走？

答：目前我们提前走的政策是厂区给出的政策，如果提前走能不能拿到钱，拿到多少，均与我们这边无关。所以派遣公司给我们的通知是不建议提前走。

问：选择继续留任，能否在年前拿到费用？

答：当时进场时共有两个时间节点，第一批是做到1.26日（上班60天），1.28、29出名单打款，第二批做到2.1日（上班60天），2.4~2.5出名单打钱，出名单需在职。这是当时的政策，都是统一的，不论是拿返费的员工，或者是我们招聘员工的劳务也好，双方都是在拿到钱后才算挣到钱，所以目的都是一样的，目前公司没有通知的说年前不能出要年后，所以是默认年前，大家都是统一的，如果到时候不出名单，那么所有人都不愿意，所以不要再问到底能不能出，目前这个我们个人还不能够做百分百保证。

问：厂里调查价格怎么填？

答：厂里调查价格目前那边调查人员只让写当时进厂时填的价格，那就写当时写的价格，到时候出了名单我们这边还会再次提交价格。如果可以写我们承诺的价格，那就写。这是我们收到的

以下是鼓动工人继续维权的消息：

就算签了的也要参加二次维权

- 1、随意篡改返费金额
- 2、不按照中介承诺返费金额折算
- 3、还有同等金额折算下来各位同仁得到的返费也不一样

维权因素：

- 1、随意篡改返费金额
- 2、不按照中介承诺返费金额折算
- 3、还有同等金额折算下来各位同仁得到的返费也不一样
- 4、释放因维权被抓的同仁

希望得到的条件：

- 1、已签的人员从新签订返费确认单
- 2、按照中介承诺的返费折算（提供证据）
- 3、所有折算返费的公式必须一样

如有问题补充者                      复制添加

名为“疯马”的左派发布了以下信息：

宣传：

1. 不顾及河蟹问题，出一版工人立场的新闻通稿



2. 依据该通稿开启谜语人模式在各平台传播，删除一切有可能被和谐的字眼
3. 视频套壳传播，以微博为主要平台，但方法类似，将贸暴力视频嵌入各类#话题视频，如周迅六年爱情回顾，动员群人转发或者投稿

目的：躲开机器审核和人工审核打时间差

世硕工人的 12. 25 示威通知传到昌硕，一部分昌硕工人误以为这是昌硕的斗争行动号召。以下是部分通知：

时间 12 月 25 号早上八点地点十号门

各位同仁准时到达人人人人

团结一心，捍卫自己的权益，为了您和您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团结一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吧。

加油！！！！

有人意识到 12. 26 是毛泽东诞辰，对于 26 日的行动表示不安，部分左派不以为然。以下是部分发言：



万类霜天竞自

不闹什么都不会有



万类霜天竞自

一点点 2020/12/24 16:05:13  
周六是毛主席诞辰，这个时间点不能去

@一点点 对毛教员最好的纪念，就是工人的斗争



无名

万类霜天竞自 2020/12/24 16:46:04  
@一点点 对毛教员最好的纪念，就是工人的斗争

@万类霜天竞自 对👉

当晚，有几十名工人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关了一晚上，第二天中午被释放。12 月 25 日是提前离职确认返费标准的最后一天。昌硕贴出离职办理手续的通知：

## 离职手续办理地点公布

### 园区办理地点及時間：

一期宿舍：1 棟 2 棟宿舍地下室

二期宿舍：23 棟宿舍一层南侧（门牌号 114）

#### >园区办理时间：

12/25：下午 16：00-晚上 22：00

12/26-12/28 早上 08：00-晚上 20：00

12/29-12/31 早上 08：00-晚上 18：00

### 外租宿舍办理地点及時間：

中侨宿舍：K 栋宿舍一层北侧

苗桥宿舍：1 栋宿舍一层，宿管值班室外周邓宿舍：A 栋宿舍一层大厅

申江宿舍：宿舍餐厅门前

坦直宿舍：宿管值班室门前

航三宿舍：4 栋一层门前

#### 外租办理时间：

12/25：下午 16：00-晚上 22：00

12/26-12/28 早上 08：00-晚上 20：00

12/29-12/31 早上 08：00-晚上 18：00

可选择住宿點辦理，也可至園區辦理

生活管理部—宿務課宣

2020/12/25

12 月 25 日上午，一部分昌硕工人聚集到 5 号门，一部分聚集到宿舍区的九栋派遣员工综合服务处，但两地的人数较少。早上 6：30 左右，有工人发现昌硕 5 号门集结了大量警车。有工人对 26 日的行动表示不安，担心再次被警察镇压，部分左派承认政府很有可

能镇压工人，但仍旧继续鼓动工人上街。部分自称工人的左派信誓旦旦的表示 26 日他们一定会去上街游行。以下是部分左派的部分发言：

嘿嘿，要是无恶意走一圈也能被打，那是镇压者的问题不是工友的问题  
好吧我直说，是公家的问题

12 月 25 日晚八点，有大批保安在九栋派遣员工综合服务处集结，并未与现场办理离职的工人发生冲突，仅在监视工人，维持现场秩序。

25 日期间，有许多工人开始签离职单，人数大约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12 月 26 日早上 8:30，昌硕工人的第二次游行示威开始，人数远少于 12.19 的行动。

12 月 26 日中午，有工人被捕，根据现场工人估计，被捕的工人约有一百五十人。现场消息基本上是工人传出来的，未见之前自称一定会去参加的、自称工人的左派传出任何一手消息。26 日当天仍有大量工人办理离职手续。



12月27日凌晨，警方抓捕了大量维权群群主，将其关押24小时。

12月27日，网上有消息称12.26当中有工人被警察打死，消息来源为一个自称工人的左派，传播较广的是推特上的“中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新闻部”的消息，该账号发布的视频实际上为2018年的，并非此次昌硕运动，并且，视频中倒地的人衣着单薄，显然不是12月份的上海。这则假消息被左派广泛传播，大纪元时报等自由派媒体在这个死人的消息上并未做文章。



12月26日后，昌硕走的最少有一万多人，根据一些工人的描述，一条线上几百人，走的只剩下五六个人，昌硕23栋宿舍，每个宿舍走了七八个人，只剩下一两个人，每个宿舍差不多都走完了，能留下来基本上都是为了那点返费。

以上是昌硕斗争的时间线，接下来我们开始世硕斗争的时间线。

## 五、世硕斗争时间线

9 月份是世硕的旺季，9 月份为了招到大批的人，中介给出只要打卡上班 60 天或 90 天就给 1 万或 16000 元的劳务返费（每天招工的返费也会变动），基本上都是 9 月入职的。以下是世硕招聘返费工与小时工的宣传：

返费暴涨！小时工 33.5 元！返费 14500 元！今日发车！

今日发车价！

【昆山世硕电子】返费 14500 元！小时工 33.5 元/小时！

18-40 周岁，底薪 2020 元 8 小时双休，吃企业补贴 280 元，住扣 30 元，加班按劳动法，要会背 26 字母的，纹身小的，全包进！

模式三：小时工 33.5 元/H，

（含所有津贴及奖金，吃住自付，有商保）。工期计算至 11/25 每月 10 号发薪日同工同酬；25 号在职，当天打差价款（扣 5% 税及服务费）

模式二：返费 14500 元！

2021/01/25 在职打卡须满足 80 天，一周出一次名单，出名单须在职，总价 14000 元，（含 5% 服务费、企业应扣项）

模式一：返费 1100 元！在职 90 天打卡须满足 55 天，一周出一次名单，出名单须在职，返费 13500 元，（含 5% 服务费、企业应扣项）

临近结算时间了，世硕也像昌硕那样，方设法逼迫工人自行提前离职，克扣工资。公司没有按照当时的约定金额返给员工。

2020 年 12 月 18 日，入职较早的世硕工人进行了斗争，遭到了当地警方的镇压。

12 月 24 日，多则鼓动工人们集合闹事的消息在工人群里传播。以下是部分消息：

第一则：

大家上班都互相转告一下，千万不要签字，签了字是多少就是多少，据我所知大部分的人都强迫性少 2000，25 号早上 8 点集合世硕 10 号门维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让狗日的劳务得逞，12000 返费给 10000，想屁吃呢？返费除了扣税一分钱不能少，现在返费名单也暂停更新了，必须要一个说法，跟昌硕一样团结一心，不管你名单多久出，不管你拿没拿到钱，这件事是包括每一个在昆山世硕上班的人，早上 8 点世硕 10 号门，合理维权！

## 第二则：

大家听我一句，最好的方法是先闹一下，然后你们发个视频抖音快手微博相关的社交平台，越多人发越好，然后说世硕以欺骗员工返费为理由，艾特所有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比如人民日报四川观察等等等等，这样子绝对有效果，不防大家试一下，工厂最怕就是自己名声被搞臭，影响工厂自己在行业当中的地位，大家想一想吧

明天世硕十号门集合 6：30

12 月 26 号昌硕革命

12 月 25 日，工人们再次进行斗争，再次遭到了警察的镇压。

12 月 29 日，世硕发出通知：继 9 月 18 号以后入职的派遣人员，返费金额打 9 折。工人的两次斗争对资方与当地政府形成了巨大压力，世硕被迫承认当初承诺金额的 90%。

以下是世硕发布的通告：

### 紧急通知

由于协商地点临时有变，故请大家帮忙转发通知一下员工尽快到世硕面试点二楼面试教室找对应派遣公司签单子。（工作时间暂定为每天上午 8：30~晚上 10：00）

### 昆山世硕员工返费金额方案：

因市场价格混乱无序，虚假承诺横行，为保护员工合法权益及维护市场秩序，现统一政策如下：如员工做到原约定期限，则员工返费金额统一以二包商提供的真实承诺员工返费金额为基础打九折后，在打款日支付。

### 昆山世硕返费工二包商利润：

如员工做到原约定期限，且此二包所送员工协商签署确认书比例达 70%，则二包商利润统一按原约定价格支付。若此二包所送员工协商签署确认书比例低于 70%，则二包商利润统一按原约定价格的五折支付。（若二包商不如实提供承诺员工真实金额则取消二包商利润）

当昌硕的返费工奔着能拿到全额返费转移到世硕之后，世硕宣布给返费打折，这次还是。对于按照协议完成了规定的活，工期已满的 8000 名工人们来说，仍然被克扣了 10% 的返费。这些工人是因为拿不到公司承诺的返费，也就是差价工资。工人们觉得，既然每一个工时都包含了血汗，就一定要讨回 100% 的返费。

2020 年 12 月 31 日，数千名工人围堵了“世硕家园”（即招聘中心），警方出动大量警力，但无法控制工人。工人们高喊“还我返费，拒绝九折”的口号，向厂方讨要说法，要求付清拖欠的工资。之后，工人们又走上街头，打算游行到市政府寻求主持公道，

要求政府出面帮助欠薪问题。在前往政府的过程中，部分工人在途中被警方带走，而其余工人均被中途拦截原路返回。



12月31日当天，经过工人们一天的斗争后，世硕将“打九折”的方案修改为了“统一扣除1000元”。

大多数工人并不接受资方的这一妥协，拒不签字。而世硕依然秉持少给一点是一点的态度对待返费打折事件，有消息称“如果拒不签字，返费会被无限期拖延甚至可能只给10000元。”

2021年1月1日上午，有数十名工人到昆山市政府抗议，市政府的信访局和劳动局领导迫于压力随工人回到世硕家园进行调解，提出了新方案：返费低于15000的扣200，高于15000的扣1000（仍然要扣除5%服务费）；当场签单的只是少数，仅有30人左右。一位工人兄弟的返费是16000元，他没有签单，他表示“我要一分不少”。



1月1日傍晚，世硕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从打九折改为每个人的返费减1000块钱。通过不同中介进厂的工人，返费不一样，同样是减1000块钱，减1000块钱对于返费10000的工人等于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90%，但是对于返费高于15000元的工人来说等于一个小小的提升。

1月2日上午，仍然有不少工人前往昆山市政府信访局，结果这次市领导连样子都不肯做一下了，直接派出大批警察，用武力把工人装上大巴，押运回世硕。期间，警察多次出手殴打反抗的工人。此外，几百人的维权群群主也被约谈，被迫解散群聊。有工人在篮球馆要跳楼，但是被强制拉下来了，事后被警方拘留，所幸最后平安无事。

1月3日，在市政府，讨要说法的女工人被警察带走，女工友高呼：“我只是想要一个说法呀！为什么扣我们返费？！”工人们也被警方强行送回世硕厂区。





而在世硕家园招募中心，很多工人向劳务和中介打听返费方案，除少数个别人问到减500、800的方案外，大多数中介态度仍然死硬，仍然要克扣1000返费，“你看见哪家补了？返费打折是世硕厂里定的。你可以报案，我们会协助你”。有个别中介声称之后会补上返费的差额。

12月31日至1月3日，数千名世硕工人连续4天抗议该公司克扣返费。参与斗争的工人有三到四千人，在世硕家园招聘中心，每天都有一千人以上在抗议。当地警方出动了

一百余人，一天带走了三四个，最多五六个人。多个维权微信群群主陆续遭到被警方约谈，不得不将群解散。但是在已有许多维权积极分子被抓、被约谈的情况下，依然有很多工友没有放弃，他们积极地商讨斗争策略，自发地在快手上等平台上呐喊，并将一个又一个维权群重新组建起来。

1月4日，世硕开始恢复上班，工人如果旷工便会被厂方抓住把柄开除，并将返费全部赖掉，因此工人们不得不暂定行动。同时，厂方和劳务中介不断地要求工人们接受现有方案，签订返费单；但有一部分工友仍坚持保卫自己的权益，拒绝签单。

1月7日是向其中一批工人发放返费的日子，不少工友发现，由于拒绝之前签单，最后拿到的返费只比总额少了几百元。

至此，世硕运动结束。

## 中国资产阶级会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吗？

(2021年3月16日)

远航一号

在与一部分左派青年中流行的“中帝论”错误观点做斗争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资产阶级会不会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持有这种观点的左派青年认为，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争夺市场、原材料和投资场所必然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最终因为这种冲突不可调和而爆发战争；即使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不爆发战争，一旦中国资本主义陷入危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会趁机煽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狂热，同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以转嫁危机，挽救自己的灭亡。

对于这些错误观点，笔者在五年前，在“简单说说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一文中，已经做了批驳。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指出，由于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分工的特点，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半外围性质，中、美两家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一致，不存在根本不可调和的冲突：“就中国资本主义来说，中国现在既不是半殖民地或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也不是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承担出口制造业为主要职能的半外围工业国。作为这样一个半外围工业国，中国资本主义主要通过向美国、西欧、日本输出大批廉价工业制成品的方式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转移大量剩余价值。如果没有通过剥削大量中国廉价劳动力而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能不能运转，是很成问题的。然而，中国资本主义要承担这样的‘世界工厂’的职能，就必然要到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去采购原材料，就必然要从俄罗斯、中东进口能源，就必然要依赖日本、德国提供的机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为了这些目的而进行的‘资本输出’乃至所谓‘一带一路’，美帝国主义不仅不会反对，反而会乐观其成。因为只有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不断壮大乃至‘强大’，美国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来自中国的超额剩余价值，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才能运转下去。”

“在中国资产阶级方面，除了他们个人之间已经与美国资产阶级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外，就其阶级本性来说，它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是维持住世界主要制造业出口国的地位。为了这个目的，中国资本主义除了需要美国的市场以外，还必须服从美帝国主义制定的金融规则，甚至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还不可避免地要依赖美国海空军来保护中国经过印度洋、太平洋的贸易航路乃至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进口来源国的政治稳定。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现有的资本积累的格局下，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也决不会真正有取美国而代之的想法，而是会在涉及世界资本主义根本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做‘负责任的大国’、与美帝国主义保持一致。”

中、美两家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一致，决定了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排除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太平洋西例第一岛链、东南亚诸国多为美帝国主义仆从国）。

除了上述这个根本原因以外，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打算从现代战争形式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中国资产阶级会不会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问题。

我们知道，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最终导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灾难。

从战争形式来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点，是各主要交战国动员自己的全部人口、资源、工业和军事潜力，以消灭敌国全部武装部队以及战争潜力为目的而进行的“全面战争”。这种“全面战争”的特点，是实行“全民皆兵”式的充分动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苏联、美国的武装力量都达到了一千万以上；日本国力贫弱，在战争后期也将军队总数扩张到了600万以上。以德国来说，其战争后期的武装力量规模大约相当于战前人口的六分之一、男性人口的三分之一、服役年龄男性人口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这种“全面战争”的特点，是要动员几乎全部的服役年龄男性（15岁至50岁之间）或者直接投入战争或者在军事工业中从事高强度劳役。

就苏联来说，苏联所进行的是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拥护，又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动员人民投入卫国战争自然不成问题。就各个资产阶级国家来说，要做到全面的战争动员，要求进行动员的资产阶级国家有比较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即使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也要在政治上具备高度的“合法性”。这样才能保证，实行战争动员以后，一下子掌握了大量武器弹药的普通劳动群众不会像十九世纪的法国国民自卫军那样，常常将枪口调转过来对准资产阶级，而不是为资产阶级充当炮灰。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来说，中国作为主要交战国之一，人口规模在四亿以上，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腐朽无能，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不能实行真正的战争动员，兵员补充只能依靠“拉壮丁”，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年份中只能维持两、三百万的军队规模，还不到日本的一半。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实际上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才建立起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个层次的“全民皆兵”的动员体制，真正做到了在充分发动群众基础上的“全面抗战”，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军的“片面抗战”。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政治觉醒，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全面战争”已经不再发生了。造成这种全新局面的原因，除了由于核武器的发展，导致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破坏性大大增加，迫使各国资产阶级不得不慎重面对战争后果以外，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丧失了在国内实行全面动员的能力。

以美国来说，最后一次实行大规模征兵，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由于美国人民在越南战争后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几乎威胁到美国资产阶级的统治，自那时起，美国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向美国人民做出重大让步，事实上放弃了义务兵役制，实际上实行了主要从底层劳动者、少数族裔中招兵的雇佣兵制度。由于实行这种类似于罗马帝国后期的雇佣兵制度，美国只能维持有限规模的军队数量，常备陆军不过50万人，编为二十几个旅，散布在全球各地。

自越南战争以后，美国依仗着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武力，只能对一般中小国家发动战争。以2001年以后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来看，美国在一个战略方向上最多能够部署的兵力不过10万左右，一旦战争陷入持久，甚至没有力量平息一个贫弱的中等国家派系林立、四分五裂的游击武装的反抗，无法实现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

就中国来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曾经以城市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以及农村的劳动群众集体组织为依托实行广泛的人民武装制度。但是，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由于害怕人民掌握

武装，取消了民兵制度。自那时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日渐腐朽，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早已经丧失了将几乎全体成年男性武装起来的政治信心。

在这样的形势下，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国资本主义根本不具备发动全面战争的政治条件。这样，中国资产阶级可以依托的武装力量仅有常备军。除去主要承担对内镇压职能的武警等准军事部队以外，可以用于对外战争或军事冲突的常备陆军不过 100 万人，编为 40 个左右的步兵旅。

从纯军事角度来说，中国资产阶级的军事力量除了对尼泊尔、不丹等极其弱小的国家有绝对优势以外（但这些国家并无战略价值），对周边其他稍微大一些的国家（地区）均不具备军事征服的能力。如果中国资产阶级动用常备军向周边某一国（地区）发动征服战争，必然遭到这些国家（地区）人民的坚决抵抗。由于这些被侵略的国家（地区）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反而可以实行全面动员来反抗中国资产阶级的侵略；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纯军事优势还不如美帝国主义，中国资产阶级的军事冒险必然遭到惨败。

这样，中国资产阶级的常备陆军实际上仅能应付一般的边境冲突。仅以边境冲突来说，由于其规模、政治效果的限制，根本不可能起到“工业党”战狼所幻想的、“中帝论”分子所畏惧的、能够全面影响“民心士气”的煽动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的作用，更不能缓解中国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此外，在边境冲突中，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陆军在一个战略方向上仅能使用其全部力量的一部分，而敌对方的中小国家却有可能集中其全部力量中的大部分，从而中国资产阶级即使在边境冲突中也没有完全的胜算。

所以，就中国资本主义与周边各个国家（地区）的关系来说，中国资产阶级基本上不具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中国的周边，也不存在对于缓解中国资本主义矛盾来说有价值的战略目标。

就中国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来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在尖端军事技术方面将处于长期落后的状况（仅靠“砸钱”根本无法改变），决定了中国的海空军现在与将来都不可能在太平洋或印度洋挑战美帝的霸权，甚至在台湾海峡、南海如果发生与美帝海空军的冲突也不能占上风。所谓“收复台湾”、突破第一岛链，将永远是网上谈兵的“工业党”赵括们的黄粱梦而已。

至于“中帝论”分子，他们大喊狂喊战争危险，实际上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恐惧、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缺乏信心，并借此来安慰他们作为“激进”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脆弱心理而已。对于“中帝病”，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当中国资本主义面临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国工人阶级表现出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时，才能“药到病除”，彻底治愈。

## 我参与左翼学生社团的一些心得体会

(2021年4月15日)

野草

我在2018年之前参与了几年左翼学生社团的工作，与各地社团的同志都有些交流，有些心得体会想与大家交流。

18年之后，由于大环境的变化，旧的工作模式受到限制，而新的道路尚未明晰，再加上受到打压，整个运动陷入低潮。

有的同志失去了斗志，回归主流；有的束手无策，有力无处使；当然有的人还在继续坚持，但成效甚微。沉寂了两年多时间，是时候苏醒了。历史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我们停滞不前，就是倒退，直到被彻底地甩出运动之外，同自己曾经的理想告别。

怎么样更好地再出发？

我认为首先是做好总结，尽量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将经验扩散，为新同志提供参考。有人说，这些东西还是不要传播为好，因为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或者说“泄密”。但是这些东西几乎已经都已曝光，我们却还对同志保密，那不是掩耳盗铃吗？

(从长期来看，我们不能操之过急，以卵击石，要对理论和现实深入研究，同时积蓄力量，否则行动便是盲目的，只能在低水平的层次上重复。甚至可能会因为一些冒失的行动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想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则是难上加难。)

作为一名加入左翼社团多年的“老人”，这份抛砖引玉的工作就由我来做吧。我尽量做到全面准确（我的经验加上对外交流了解的情况），但难免会带有个人色彩，也不一定都正确，只是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希望更多的同志能够一起来写好我们的总结。

我这里说的左翼社团，其实就是接受马列毛主义的大学学生社团。其来源有二，一是受老同志影响建立的马列社团以及由此衍生的社团；二是由其他类型

社团如三农社团、进步社团（类似历史上的新民学会，没有特别明确的宗旨）等转化而来，二者各有特点。

我将从思想、组织以及实践三个层面来论述。

### （一）、思想统一方面的问题

思想上的不统一或者宗旨的不明确，是第二类学生社团的常见问题。

例如，某地社团最初成立时，以在校学生为主，毕业生只有一位，是很年轻的团队，因此各方面经验比较缺乏，尤其是缺乏对整个社会的了解和把握。思想也不是完全统一，受到乡建思想、马列主义、还有韩德强思想等思想的影响，但后来逐步统一到马列主义。

这些人聚在一起要做什么？比较明确，也比较模糊。主要工作是做社团，做社团是为了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培养人要干什么呢？就不是特别明确，每个人心目中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所以做事偏经验主义，没有很强的理论指导。

总的来说，这是和五四时期新民学会那一类社团性质非常接近的团体，可以称作进步社团，其成员坚持理想主义，坚持底层立场，同时逐步向马列主义转变。同样，这样的社团和历史上同类社团的命运一样，属于过渡性质的社团，其成员也会逐步分化，走向不同的道路。这不是悲剧，而是喜剧。

第一类社团思想统一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主要是怎么办的问题，后来统一于毕业之后以进厂为主要目标，这也是考核成员是否坚定的主要标准。但是这样一个简单粗暴的标准，是否正确，还是有争议的。当然，后来的选择会稍微多元一些，不像一开始发现新大陆那样的激进。

思想上的不统一、不明确，会给实际工作带来很多问题，甚至决定着工作最终的成败。

### （二）、组织方面的问题

组织方面，由于大部分人经验不足，在决策上，社团发起人实际上会有很大的发言权，形成了事实上的“老大哥”——也就是权威，其他人很难提出什么有建设

性的不同意见（但是越往后，不同意见会越多）。这就很容易导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决策是自上而下的，先由核心团队制定计划，再去落实。早期由于大部分核心人员在校，直接参与工作，这种模式的负面影响不大。但越到后来，团队体量越大，核心人员毕业，社团工作由校内高年级同学接手，继续以前工作模式的弊端便逐渐显现。

一是制定计划的人不那么了解实际情况，这是次要的，二是制定计划的人不去具体落实，这样的计划，一般是悬在半空中的，离落地还有一段距离。主要在于实施计划的人没有经验，不知怎么实施或者是有思想包袱没有解决。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校外负责人根据以往一些经验和当下需要制定学期计划，然后和各社团负责人商量敲定，再由各社团负责人和社团成员商量，看是否需要调整。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大家做的都比较吃力，整个计划能实现60%以上就算不错了。这其中最难的是社团负责人，他们负责集体意志的贯彻，但这在实际中经常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他或许还有很多自己不同的想法，沟通、落实都比较吃力，相互之间的矛盾没有很好的暴露和解决，而是一直积累，偶尔爆发。

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社团刚刚起步时，发起人劲头足，虽然没有很多的经验与套路，采用的多是手工业方式，发展效果却还比较好。越到后面，人越多，工作越正规，工作效果却越难以保证，直到最后进入瓶颈期。

这样的组织方式，有一定优点，那就是效率较高，能体现负责人的意志或者说能坚持一定的方向（这算不算优点？），当然这是在社团建立初期骨干人数很少的情况下（1-2人），随着社团的发展，弊端便逐渐显露。

一是没有很好的“传帮带”机制，“老大哥”大包大揽，不能很好的发挥非核心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很多时候是在被动的执行，即使有自己的想法，也在无形中被压制，这样也不利于他们能力的提高，造成骨干断层现象。随之也就带



来计划和实际有较大出入，较难落实，预期效果难以保证，大家工作起来很累的问题。

二是山头现象严重，校内骨干只和本校负责人熟悉，不了解其他学校情况不熟悉其他负责人，无形中造成了思想隔阂和局限，甚至是相互看不起。

三是开展工作有限，只有读书会这一能力培养，无法全面（宣传，工友之家）提高骨干能力和加快新社员发展速度。造成了社员很多时候是只会做读书会的宣传，不会拿起笔杆子对外宣传。虽然毛选读了不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辩证地处理问题而不是陷入形而上学，我们还是差的很远。

有人说这是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我觉得有待商榷。但手工业模式容易带来官僚主义的弊病，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在有的团体中甚至发展的非常极端。比如有些成员和领导层思想不一致，便被开除出队伍。开除的原因并不是成员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只是由于方法策略和领导层有所不同。这发生在某知名左翼团体中，成员的理论素养（理论读的应该很多）不能说不高，但在实际工作中发生如此极端的现象，不得不令人感到困惑，也令人深思。

这种的组织方式反映着青年左派的幼稚病，背后的原因我还没有想透，但起码有以下原因两点。

一是左人不同程度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少人认为自己是领袖，既是领袖，我怎么可能会犯错呢，别人怎么能不听我的呢？这些领袖几乎无一不在实践中碰了壁，有的甚至从领袖变成了逃兵，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

这里不是反对领袖，而是反对自封领袖，固步自封。如果每位同志都能以领袖的责任感去工作，那当然是极好的。

二是圈子的封闭，封建式的权威思想没有在实践中解决，很容易形成论资排辈现象，大家自然而然地尊某人或某几人为“老大哥”，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不同意见，但是自己资历浅，经验少，或者是碍于面子，这些意见被隐性地压制了。

这和应试教育对学生的长期摧残也有关系，很多人缺乏批判反思的能力，习惯于“跟着走”。熬得时间久了，后来者也逐渐成了“权威”，整个团队死气沉沉，

不管是自封的领袖还是被迫“黄袍加身”，都逐渐在在我陶醉中裹足不前，甚至倒退。

三是理论学习与社会现实、社会实践和阶级斗争结合的不够紧密。读书会嘛，也用不着多么先进的组织方式，存在的种种弊病还不足以致命。以致于大家容易满足现状，缺乏反思和进取。

总之就是一句话，如何更好地发扬民主集中制。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团体在这方面处理的比较好，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否则会非常拖我们的后腿，甚至使我们腐化变质。就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来看，民主生活会可以对此情况做一定的限制，另外，团队中“领袖”在主观上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压制不同的声音。

最后我想说，对于马恩列斯，对于毛主席，这些伟大的导师们，我们也要敢于质疑，他们是极为反对别人把他们捧为偶像或者当作神像的。不要做没有头脑的信众，而要勇于做历史的开创者。

手工业模式往前发展是工厂化模式，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分工明确，在有大量骨干的条件下开展多项工作，极大地培养了新社员和锻炼了骨干的能力。以某校为例，先一学期分多批次培养工作所需的大量骨干，然后在这些骨干基础上开展读书会、工友之家和宣传工作（校内和校外宣传），每项工作至少 1-2 名外联成员。以宣传为例，发掘热点，确定主题，撰写文章都有明确分工和讨论，以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一旦新社员有了明确的参加工作的意向，则可以在上述这几个工作模块中进行锻炼，最后确定自己擅长的一个工作主要负责，并参与其他工作模块。

但是某校条件较为特殊，这一模式基本没有推广开来。

可见从整体上来说，左翼学生社团在组织上还非常的落后。

### （三）、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基于这样的思想和组织，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我谈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 第一、 社团灌输论。

灌输论来自列宁，大意是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思想，最多只能产生工联意识，所以社会主义思想只能由无产阶级先锋队从外面灌输到工人内部。

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不能不分场合、不分时机、不看对象的“硬灌”，牛不喝水强按头，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社团工作中也存在着“灌输论”。

为什么我要称之为社团灌输论呢？

因为整个社团的工作就是给社员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效果怎么样呢？以某知名左翼社团为例，招新人数至少上百，甚至两百，经过一年的灌输，大概能留下二三十人，越往后流失越多。等到大三大四的时候，能够明确自己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事业，毕业工作服从社团安排的，灌输成功的“产品”也就五人左右（这是两三年前的数据，不一定非常精确）。

规模小、实力弱的社团，每一届也就能灌输出来一两个成品，人数再多就是运气了。有一个社团比较例外，那就是 18 年走火入魔的那个，由于校内条件特殊，灌输效果比较好。

对于绝大部分没有灌输成功的“产品”，则会给他们贴一个标签——不革命。所有左翼社团均实行这样的灌输论，无一例外，因为这些社团追根溯源，差不多都是那么一两个根子出来的。这些社团的存在发展的时间大约为 2012 年到 2018 年，2018 年被扫荡了一批，幸存的现在如何发展，我不太了解。但是据我观察，社团灌输论改变不大。

社团灌输论的形成有一定条件。要灌输一定的思想，这是社团的主观目的；灌输的对象是校内同学，再具体一点，是通过每年一到两次的招新活动吸收到社团内的同学。社团灌输论就是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这一套体系主要包括理论学习、社会实践、内部建设、校内公益、外联，主要从阶级感情，社会关系，理论认识来改造新成员。

以我们的经验，能跟着我们走的人大多是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而且我们在培养人时首要看重的也是阶级立场这一点，然后才是理论上的学习和社会关系上的改造；当然也有不少是被马列理论折服背叛自己阶级的同学（大多出现在名校）。

理论学习由浅入深，普遍的是先从社会话题例如三农、工人、教育环境等问题切入，目的是了解社会（主要是工农的真实处境，有人说这是专门看社会阴暗面），引起思考；然后是国史，最后是理论，时间大概持续一到两年。对这一理论认可且能力不错的就可以带小组活动了。

对于不同的学校可以有变通，例如接受能力强氛围宽松又有马列社团名号的，则直接单刀直入结合现实讲解政治经济学，没有马列社团名号的则主要批判现实社会；接受能力差的学校则贴合实际解惑，不会整太多名词概念。

这一套学习在逻辑上没什么问题，也比较完善和成熟，所以后起社团一般就直接搬运了。在学习交流的时候，灌输的特点比较明显。比如说在交流讨论的时候，在最后总有一位“托儿”或者“大佬”总结一下，升华一下，给出一个有倾向性的结论；或者是在讨论的时候有和主流不同的观点，受到社团熏陶的同学便与其辩论，很想说服对方。

长此以往，就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了，但是真的都灌进去了吗？

社会实践主要是寒暑假外出调研，了解社会，理论联系实际。有的要组织进厂打工，有条件的还可以和小黑厂老板斗智斗勇。对于学生来说，第一次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的理论，对自身思想认识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有的社团比较依赖此类活动，一般来说，每次假期活动，对于社团成员的分化是个转折点。

内部建设也比较重要，主要方法是老学长或老学姐苦口婆心的和学弟学妹谈心，热情程度堪比父母或者对象，能让学弟学妹们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心，当然还有思想上的启蒙，后者是主要的目的。

在原子化的大学社会里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对于社团的发展很有必要。一般搞的好的社团，内部建设都不差。

校内公益主要是和后勤工人的互动，首要的目的是接触工人，改造自我，对于工人思想的影响几乎是零。当然这个要分情况，对于年轻的后勤工人群体，校内公益的定位就是在工人中培养骨干甚至帮助工人维权了。但这对于社团成员的要求很高，几乎只有一所学校开展了此类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外联就是相互走动交流，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社团规模较大的情况下，外联承担着这一地区工作方向的指导和其他地区的联系工作，是领导机构，校内联则是只负责本校工作）。

不可否认，这一套工作体系是同志们辛勤探索出来的，每一位参与过社团工作的同志都曾为之挥洒汗水，感谢大家的付出。

但是，这一体系的致命问题就是效率低下，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培养出来的人极其有限。因为这一体系从根子上就是有问题的。

怎么说呢？由于某种原因，左翼社团公开打出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不多，很大一部分是打着类似新民学会或者 XX 读书会这样的招牌活动，还有的是借壳上市，知名度有限。这样招新招来的人可谓是八仙过海，有的人是出于好奇，有的人是随便加的，有的人是被招新学长学姐的热情感染，有的人是觉得社会实践很好玩……即使公开打出了马列旗号，但你也会遇到各种抱着奇奇怪怪目的来的人。

这样庞杂的人员集合到一起，开始接受社团的灌输。请问，能一灌就灵吗？不可能。

有时候甚至会闹一些笑话。比如有的学生参加活动非常积极，学长觉得他是个好苗子，很可能成为社团未来的干将，但参与一次社会实践活动之后，该同学却人间蒸发。原来人家积极参加活动是为了努力提升自己，当他感觉到社团不能再给他提供更多的东西、甚至他感到这个社团有点“危险”的时候，他就毫不留情地走了，留下了有点尴尬的学长。

一个人的认识和其出身经历有关，那些思想发生质变的同学，有哪个是完全靠社团灌输出来的呢？

事实是他本身就有一定的基础，社团加以引导启发，促进了他的转变。一个很显然的道理，我们不可能从石头里孵出小鸡来。然而我们社团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试图从石头里孵出鸡仔，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卖力，一连孵了好多年，还在坚持不懈地孵。我们的一套东西，虽然说是真理，但现阶段，受制于经济环境，能接受的人有限，更不要说去践行了。整个社会左派的比例，决定了社团中骨干的多少。

社团灌输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混淆了群众工作和骨干工作。

谁也不能否认，社团工作是群众工作，但是我们灌输给群众的却不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比如有些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关注工人话题啊？为什么要读《宣言》啊？为什么不搞点更轻松的活动？给群众灌输一些部门不熟悉、不理解、不需要甚至是不接受的东西，效果怎么会好。很多人会逐渐发现，这个社团不一般，在宣传另一套东西，不能接受就离开了。

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即使团队氛围再好，学长学姐再贴心，那也还是不接受。把一个另类的标准强加给群众，那自然效果有限。这一套理论学习体系更像内部培训，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认同基础上的系统化的理论训练，而不是用来向群众做宣传或者从群众中选拔骨干的。

由于以上原因，导致我们社团工作整体效果有限。如果不壮士断腕，凤凰涅槃，传统校内社团怕是要慢慢消亡。与其用大量的时间孵石头，还不如去发现鸡蛋或者小鸡，小鸡自己会找米吃，不用灌。

人都有惰性，我发现左翼有些人尤其懒（比如我），行动跟不上，脑子也转不起来。借口还挺多，什么时机不到，什么反对剥削，但可能还没等你等到时机，资本家就已经把你淘汰了。我们还是得克服惰性和惯性，抓紧想出新办法，否则道路就会越走越窄。

第二，逆社会化。

社会化这个词大部分朋友应该都听过，来自于“三勤三化”，包括我们在内的左翼社团几乎都走了一条逆社会化的道路。我这么一说，逆社会化的意思就很明白了。

逆社会化有几方面的表现。

一、社团骨干在校内成为“奇葩”。

奇葩在哪里呢？比如说不重视学习，甚至成绩很差；观点激进，爱搞事情；不能很好地融入班集体或者处理好同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学院几百号人，辅导员放眼望去，就能看出你不一般。还有一些同学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选择了退学……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受社团的主流价值观影响。有时个人学习或者其他事务会和社团工作冲突，社团便提倡社团第一，个人第二。有的人说，不要老想着协调，有时候冲突是难以避免的，要做取舍，当然社团工作是第一位的。老想着自己的事情，就是思想不坚定（大致这么个意思）。

我事后反思，其实冲突也不是特别大，这种价值观教育也是需要的，但是当这种要求超过了一定限度，那就是有点“左”了。再就是由于对主流价值观、对“奋斗 B”的反感，还可能有个人的惰性和消极情绪，也使这种“遗世独立”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也算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但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者，首先要做一个正常人。在学校不做一个正常人，有些工作就不好开展，也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更重要的是以后难以在社会立足，除非你是富二代。

很明显，90%以上的学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说了也不一定理解，因为从小就靠父母供养。一个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尽管马克思是革命导师，但是没有恩格斯的供给，他一家人就可能要饿死，或者他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样我们就可能失去一个伟大的导师；恩格斯对资本家充满了厌恶，但为了同伴的生存，但还是不得不当了十几年老板。

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思考一下，你毕业后要如何解决自己甚至家人的生存问题？所以说，做一个正常的学生是必要的，这是从长远考虑。搞社会主义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靠头脑风暴或者激情热血。在形成强有力组织情况下才有持续不断的职业革命家出现。

二、不进工厂不革命。

这大概是 14 年左右提出来的口号，意指不再坐而论道，要同工人阶级结合，是给毕业生提出的要求。这的确是一大进步，但也将很多人关到了门外。我们是要抓主要矛盾，但是也不能忽略次要矛盾。

不同的团体对这一口号认同程度不一，但是在社团骨干就业时，各社团的推荐方向有所不同，但也有统一的地方，那就是“不听安排的不革命”。对于左翼社团来说，这样的要求是必须的，因为目的就是要培养能做事的人。但是如果不考虑每个成员的实际情况，就一刀切，那就是瞎指挥。

比如有的社团反对考研，认为考研是追求个人奋斗，对于我们的事业也没什么太大的帮助。

这样设置一个无限拔高的上限就把很多本可以团结的同志排除在外了，而自己也搞不长久。

### 三、同家庭“决裂”。

由于我们的选择和主流价值观强烈冲突，自然绝大部分家长也持反对态度，由此引发了和家庭的冲突。

在校内的时候，这种冲突还不太明显，因为我们可以忽悠家长说我们在好好学习。但是毕业选择的时候冲突就会很大，比如说一个大学生甚至是名牌大学生放弃前途去下工厂，估计没有家长能够接受。如果采取欺骗隐瞒的手段，可以拖延一阵。但是如果家庭需要经济方面的支援，长久下去冲突也会加深。

由于行动趋于激进化，同家庭的矛盾也大大加深了，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尤其是“八青年”事件之后，社团成员工作被曝光，家人极其反对，同家庭“决裂”便成了社团成员的一个信条或者标准。谁反对我的行动，我就跟他决裂。这在后来的声援团斗争和社团保卫战时表现的比较明显。如果做不到，便斥责其“不革命”、“不坚定”。后来“领袖集团”强硬推行他们制定的这条标准，引起很多成员反对，甚至导致社团分裂，大批成员流失。

家长有很多糊涂观念，这在当下是必然的，我们当然要同这种错误的思想斗争，同这种错误的观点“决裂”。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我们的宣传难以影响到



大多数工农群众，他们是不支持我们站在主流社会的对立面的。所以在实际行动中，我们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断绝关系的这种“决裂”方式。

家长的观点是主流观点的反映，简单的“决裂”并不能使他们的想法改变，还很容易使家长误信某些宣传，说我们被传销洗脑了或者进了邪教。家长更加不依不饶，你要决裂，家长不一定和你决裂啊。这样只能使自己非常孤立和痛苦，还会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再者，很多家庭需要孩子在毕业之后给予经济支援，比如家里有老弱病残的，这个时候要求成员和家庭决裂，不是把人家推入火坑吗？

这样的“决裂”，除了标榜自己，还有什么意义呢？自己的理想高于一切，其他人则一文不值，只配当自己的工具。

要想决裂还是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起码得是中产家庭，家人不需要自己的支援。有的人父母是剥削阶级的成员，这个时候要不要决裂呢？如果恩格斯和他那个严酷无情顽固的老爹决裂，那马克思一家恐怕要饿死了。你把你爹的家产继承下来，或者利用你爹的权力为无产阶级事业创造便利，他不香吗？

无独有偶，韩德强带领一大批学生到正道农场修仙，受尽了左人的嘲讽，蔑称其为“韩教主”。“韩教主”也要求其学生和家庭决裂，做不到的学生便被视为“不纯洁”。有的学生和家庭决裂，而家长可能认为他们中了邪，直接把学生绑回家去了。一个右的出奇，一个左的离谱，但他们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呀。我是领袖，我是教主，我定的规矩就是教义，反对我就是“不革命”，就要把你开除。

二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打着漂亮的口号为自己谋私利，甚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理想而把别人当工具。这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把标准无限拔高，为自己树立起最革命最先进的形象，谁不听我的，谁就是反动派。导致自己越来越孤立，最终在孤注一掷地冲锋中碰的粉碎，还说自己创造了历史。是的，但这是不光彩的历史。

一个集体内部的考核标准，只能是相对科学的下限，而不是无限拔高的上限。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共产风”和文革时期的“唯我独革”，都是这种思想的反

映，我们不得不深思。而某些领袖被捕之后，很快写下了七八十页的自白书，是其本质的彻底暴露。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扇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

#### 四、互助合作幻想。

由于逆社会化的原因，社团成员只能活在理想当中——囊中羞涩。如果是去工厂，或者是在一些公益机构工作，收入很低，只能勉强养活自己，生活比较艰难（如果条件允许，我完全赞成大家下工厂，去机构）。

大家就开动脑筋想办法，团结互助呀。有的人提出了一种方案，叫作生活共同体，大意是毕业之后一起生活，在某个地方租一栋楼或者一处大院子，方便学习交流，生活成本还低，这的确是一个美丽的方案。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要生存，首要的是先找到一份工作，工作距离远，怎么住到一起？再者，相处了几十年的夫妻都有矛盾，一群人聚在一起是非肯定更多。比如有的人有洁癖，而有的人不怎么注意卫生，他两就很难合得来，距离产生美。虽然说这是一个小问题，但在实际中却非常普遍，需要加以考虑。还有，如果有人结婚或者谈了对象，也需要一定的独立空间，慢慢就分散了。最后，如果有什么问题，一群人聚在一起也很难周旋。

综上，这种方案很难持久。这里面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抱团崇拜，是对资本压迫消极抵抗。有意思的是，最初提出这种方案的人往往始终没和大家住在一起。这种互助合作幻想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比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组织的公社，蒲鲁东幻想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人民银行”，五四时期奉行“新村主义”的互助社团，最后统统都破了产。可见，我们还一直在走历史上已经走过的弯路，小资产阶级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

总的来说，逆社会化根源于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不考虑当前实际条件，不考虑成员情况，主观地制定一些改造社会的计划。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中，不是有效利用资本主义的条件，而是希望在其中开辟一处世外桃源，既是自我保护，又可以以此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造，结果却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就像自己面前有一个病人，不去解剖观察，运用现代化的

手段分析，而是闭住眼睛冥思苦想，根据主观想象开了一份药方。真可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危险极了。

第三，山头主义。

山头主义，就是占山为王，划分势力范围；我的就是我的，不容他人染指；我的是最好的，别人都一般般；你说联合可以，但要以我为主。

山头的出现有其客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历史原因是各地团体出现的时间、缘由不同，历史传统也不尽相同，因此发展各有特色，形成了不同的山头。再就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团体，由于内部分歧导致分裂，如果其规模较大，也可能形成新的山头。

然而，山头主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却不是必然的。

山头主义的发展和青年左派的小资产阶级性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主要的。

有的人主观上以我为主，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然后去推广普及，认为别人不那么行，而自己则是领袖（起码是未来的领袖）。有的人“唯我独革”，高标准严要求，自己是高傲的珠穆朗玛峰，别人都是不入流的小土包。有的人谨小慎微，说彼此联系不要太过密切，先各自发展，树大招风（可能怕惹火烧身）。有的人私有观念极重（往往是那些领袖），自己的地盘一寸也不容别人染指，拒绝自己的“小弟”和其他团队接触，生怕被带偏了（其实是怕带跑了，但别人一定就是过来和你“抢肉”吃的吗？）.....

这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一是经验无法共享，做无用功，发展缓慢。有些东西明明别人已经做的很好，为什么不实行“拿来主义”，非得自己再摸索一番呢？当然，能不能“拿来”也是问题，有时候还得给人交点学费，有时候交学费人也不给。或者是有些路走不通，却总还有人去重复那些走不通的老路。

二是像一地鸡毛，都是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很分散，也很不专业，坚持着传统的手工业方式，颇有些“工匠”精神，没有形成整体的合力。有些团体说自己缺人，有些团体手里有些人，却当作资本捏在手里观望。总的来说，就是不能让我们多快好省的发展，这是极大的犯罪。

主要的原因是那些领袖的权欲观念，没了山头，自己怎么发号施令呢，怎么能在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呢？而小弟们，则是不容易有很强的“山头主义”的，因为没了山头，他们也还是小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有些小弟支持山头主义，或者是由于其也有着同样的权欲（自己的山头壮大了，自己的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或者是由于经验不足，脑子比较糊涂，只能听大佬的话；或者是被“家法”裹挟，不能越雷池半步。

搞马列的同志们必须明白我们的事业既是解放他人也是解放自己，就是要同一切旧思想旧势力作斗争，如果不能克服这种个人主义，同旧思想决裂，是不能长久地支持下去的（建议阅读毛主席的《小资产阶级的通病》）。

关于山头主义和手工业模式，大家都会拿出列宁的《怎么办》批判。可是被奉为圣经的《怎么办》，很大程度上成了抽打别人的鞭子。人们却从来没有拿它作为镜子照照自己，或者是真的把它当作了圣经。

以上，便是我的经验总结。我主要的目的是谈问题，并非要全盘否定我们以往的工作。现状不容乐观，但未来仍然可期。这需要我们重新开辟一条可行的道路。

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是时候重新出发了。

可能会有更多在 2018 年之后觉悟起来的同志看到这篇文章，这是上一个阶段左翼学生运动的教训，你可以不认可其中的一些观点，但是一定要重视它，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而不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它不一定是巨人的肩膀，但作为一块垫脚石足矣。

前进吧，同志们！

# 工人斗争与民主的关系

(2021年4月29日)

## 自由之翼

### 1.民主是什么？

我认为，民主包括两个部分：民主意识和民主手段。一个普通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认识到自己应当努力捍卫这个利益(否则只会有人侵犯你的利益，而没人会帮你捍卫它)，这就是有了民主(为自己做主)意识。然后，他需要认识到，社会上有很多人都有各自的利益要追求，自己必须设法与他们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如果是以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达成的，便成为形式民主。前几年中国有不少精神资本家，这种人就是连自己的利益在哪都认识不清，连民主意识都没有，当然更不可能参与民主实践了。

### 2.为何追求民主？

没有人的利益跟你完全一致。如果你从不参与决策，那么你的利益大概率不会被重视。事实上，任何一场抗争都可以视作对民主的追求。即使是搞经济斗争，你也要设法确保组织者/工人代表真的能代表大多数工人的利益，才能获得工人们的支持吧。这就是一种对民主的追求，并且如果你不用民主的手段，即代表由全体工人选举，随时可被全体工人投票罢免，又如何能实现呢？指望领头者的个人觉悟吗？历史上被资方收买的劳工代表并不少见。

### 3.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

阶级斗争是持续存在的。工人民主化的经济斗争当然也应追求长期化、正式化，即成立民主工会。当全国大多数工人(他们是大部分人口和主要经济力量)都加入了民主的工会，政体的民主化也就呼之欲出了(除非你希望这些工会各搞各的，这既不符合斗争规律：不同企业的工人是有共同利益的，他们没理由不联合；也与左派的公有、统筹思想相悖)。所以，以为只争工资不谈政治就不会对独裁统治形成威胁是错误的想法，搞经济斗争本身就是在向民主化迈进，指望靠政治脱敏来让统治者放松对你经济斗争的警惕和敌意是不可能的。不过不谈政治至少会延缓对政权的挑战，实际斗争中完全可以利用这点讨价还价，一个刺头唱黑脸威胁要谈政治，一个领头人唱红脸要好处。只要斗争的组织是民主的并且成功了，就事实上推进了民主化，相信自由派是愿意配合去做黑脸的。但是无论如何，谈判靠的是底牌，不是靠示弱博取同情。工人斗争时可以留着民主牌不打，但绝没有主动撕毁底牌来乞求对方会减小镇压力度的道理。如果组织不民主还成功了？那就是说统治阶级明明可以利用这点挫败运动却不挫败，等于他愿意主动让利，这基本不可能的事。如果他们真的愿意，那我们也没必要斗争了。

#### 4.工人斗争广度与民主的关系

如上所说，当工人斗争已经变得广泛乃至普遍时，各厂工人的斗争团体会有联合的愿望（同时斗争的人越多统治阶级越难镇压），而要想联合就得互相尊重彼此的诉求，就会产生民主。而当今工人斗争还很零散，中国大部分工人还没有觉悟和行动起来，大喊民主并不能得到很多支援。比如一个老板有面包厂和皮鞋厂，现在面包厂工人起来斗争要求涨工资了，而皮鞋厂工人不愿支援，那么面包厂工人要求涨工资时显然没有义务顺便帮皮鞋厂工人也争取一份（要求越多，成功几率就越小）。这与开头所说“没人会帮你捍卫你的利益”是一致的。自然，面包厂工人也只会争取本厂范围的民主，工人代表由面包厂工人选举，代表面包厂工人的利益，而不会“争取两厂共同的利益”。推而广之，便是此时一厂的罢工没有义务帮全国人民要求民主。（这与去年黑命贵运动差不多，有人批评黑人要的是特权，他们没说错，但黑人游行时华人在当模范公民，那黑人当然没义务帮你争取权益。今年亚裔也搞了一场游行，据说就有黑命贵的人来支援了。只有你有了自己的力量，别人才会来跟你谈团结）

#### 5.我为何支持民主

中共的官僚独裁对我的利益造成众多损失。政府财政不透明，缺乏监督，纳税人的钱被大量浪费、贪污；此外，官僚利用权力（牌照等）垄断最赚钱的行业，再把自己的裙带安插进去。老百姓只能去竞争低端岗位当人肉电池；官僚独裁意味着法制不彰，强力部门沦为其家丁，可以随意抓人去喝茶；官僚与黑心商家勾结充当其保护伞，毁掉食品安全，破坏社会信任、破坏自然环境。互联网审核导致中文互联网虽用户众多却质量不佳，曾经做的比较好的媒体如好奇心新闻被网信部关停，要么在墙内吃屎要么花钱冒险违法翻墙。争取民主并不是追求道德、正义，而是在争取自己的利益。（这句话对共产主义也成立）

# 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在中国争取民主的真正力量——与自由之翼网友商榷

(2021年4月29日)

远航一号

自由之翼网友在“工人斗争与民主的关系”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对于民主的性质、为什么要民主、工人斗争策略、工人斗争如何发展为争取民主的斗争等问题的看法。自由之翼网友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许多进步青年多多少少也有。我们欢迎这样的讨论。现在先就自由之翼网友的文章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作为进一步讨论的起点。

## 一、民主和自由

自由之翼网友认为，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达成协议。这一方面似乎是受了资产阶级社会契约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并不十分准确。

如果从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出发，民主的本质就是“主权在民”，但是“民”如何行使“主权”并没有一种公认的绝对合理的方法。现在普遍流行的代议制民主制（即人民通过选举代表来行使民主权力的制度）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变通方法。依据选举制度的不同，占多数的代表未必甚至往往不代表占多数的人口（在实行“赢者通吃”的威斯特敏斯特制度中尤其如此）。即使不考虑代表如何产生，在同一个议会内，什么算“多数”、什么算“少数”也因国家、具体政治制度、议事规则而千差万别（比如什么样的议案需要“绝对多数”、多大的绝对多数等，对于需要绝对多数的议案，少数事实上就有了否决权，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多数服从少数”）。以上问题还没有考虑到谁有资格算作多数或少数的一部分（谁是公民、什么样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自由之翼网友提到人们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权利）。这就又涉及到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即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果“主权在民”，或者说人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人民可不可以剥夺个人的权利？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剥夺哪些个人的哪些权利？换言之，要不要对民主加以限制、加以哪些限制？

因为有这些限制，按照流行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在欧美日等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制度，而是所谓“自由民主”制度。民主不能侵犯若干“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来自于“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来自于“自然法”与“天赋人权”。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资产阶级政治学所谓“多数暴政”的学说在本质上是为了确保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防止民主危害资产阶级统治，是对民主的阉割，是残缺不全的民主。但就未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来说，也就现实生活中许多左派小组面临的实际问题来说，确实也存在着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少数服从多数与保护少数人权利、容忍乃至鼓励少数人不同意见

的问题。原则再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情况，或者口头说得漂亮、一遇不同意见就暴跳如雷乃至怀恨在心的情况，在现实工作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 二、民主不是现代资产阶级一般的政治统治形式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制度的本质是用政治制度的方式（包括法律、惯例、政策等）将历史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稳定下来，也就是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妥协稳定下来。这种妥协的内容是，无产阶级承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放弃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回报”，资产阶级承认无产阶级有某些经济和政治权利。此外，在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资产阶级各集团还可以按照所谓公开、透明、费厄泼赖的方式争权夺利，避免彼此之间的斗争危害整个阶级的利益。

就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来说，前一个方面的内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妥协关系）是主要的、根本的，后一个方面的内容是附带的、相对次要的。如果没有前一个方面的条件，后一个方面的“费厄泼赖”也无从谈起。

十九世纪中晚期、二十世纪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种流行的观念，那就是认为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理想的政治统治形式。列宁也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世界历史的实际发展证明，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世界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的。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来看，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无产阶级（以及与无产阶级结盟的其他劳动群众、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到一定程度，可以迫使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做出相当的让步；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又没有大到足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程度，而资产阶级为了制止无产阶级革命而做出的让步又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只有少数特别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英美从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法德意日从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才同时具备上述历史条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标准的“自由民主”制度仅仅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以及少数例外情况下（如印度）才得以稳定地、不间断地存在。其它的半外围、外围国家不是资产阶级专制体制（“权威主义政体”），就是动荡的失败国家，或者是虽有民主外壳、少量政治自由但实际上是寡头统治的半独裁国家（如俄罗斯、匈牙利）。

## 三、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在中国争取民主的真正力量

就中国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主要承担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既不能与核心国家在技术前沿竞争，也不能与人均资源丰富的国家在自然资源领域竞争，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必然要依赖对大量廉价劳动力血汗工厂式的残酷剥削维持自己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现在又将这种血汗工厂模式的剥削延伸到大部分小资产阶级。

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低人权优势”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生命线，离开了“低人权优势”，中国资本主义就活不了。因此，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容纳无产阶级甚至全部或大部小资产阶级的妥协空间。不仅欠



薪、996 是常态，卡车司机自杀、程序员猝死是常态，连付国豪这样为资产阶级立过功的小资忠臣也得不到资产阶级给与的安抚和奖励。

中国资本主义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在整个的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不可能建立起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形成普遍的政治自由，更不会出现遍地开花的“民主工会”。

由于上述的原因，政治民主不符合中国资产阶级任何一个集团的长远和眼前利益。因此，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都不是争取民主的力量，也不是民主力量可以联合的对象。

中国政治中，真正的争取民主的力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小资产阶级右派（自由派）虽然也打着“民主”的旗号向资产阶级要求某些利益，但是他们害怕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远胜过他们害怕资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由于这个根本的原因，一般来说，小资产阶级右派不是中国民主力量可以联合的对象。当然，这不排除自由派中极少数确实真诚的民主分子在未来的某些条件下可能向人民靠拢。

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半外围工业大国，又必然造就一个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这是现代中国的另外一个主要特点。这后一个特点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力量必然在不远的将来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由于在中国不存在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以“自由民主”方式妥协的条件，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的力量一旦突破了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就必然不仅仅是争取民主的斗争，而且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

#### **四、现实斗争已经证明，“民主工会”行不通**

如上所述，在整个的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不可能出现民主以及普遍的政治自由。因此，“自由之翼”网友所主张的，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工人就应该争取到处建立“民主工会”，再由此产生联合的愿望，再一起来争取政治民主，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过去，有一些左派小组企图这样做，已经为事实证明是失败的。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是必然起来要求民主的，但不是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而只能是在未来的革命形势来临以后；而当革命形势来临的时候，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要求必然不限于民主，必然打破资本主义的一切狭隘界限。

#### **五、关于美国的“亚裔”**

“自由之翼”网友还提到美国的”黑命贵“以及华裔反对种族歧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意见是不完全统一的。我简单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所谓“亚裔”的概念就是美国资产阶级的种族政治制造出来的一个完全没有科学根据、也没有客观物质基础的荒谬概念。这里只需要指出，各种亚裔的资本家与亚裔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远远大于各亚裔族群劳动人民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族群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

就亚裔中的非资产阶级成分来说，亚裔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物质利益在于享受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小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拥有的一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特权以及获得上升为资产阶级的“正当”机会。就后一个方面来说，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不是白人小资产阶级而是非洲裔小资产阶级。

就亚裔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城市中的小业主、失业和半失业者）来说，与白人劳动群众几乎没有物质利益方面的重大冲突。除了受各族群的资本家压迫以外，亚裔劳动群众受到的现实的、直接的威胁就是日益发展并失控的城市犯罪。这种城市犯罪的发展，在以往是因为资本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贫富分化和绝对贫困化，但是在过去一年中，似乎已经成为美国大资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的帮助下）打着“种族正义”的旗号有意推波助澜的一种发展趋势，其目的恰恰是为了打击和恐吓以白人劳动群众为主的美国无产阶级，而美国城市中的亚裔劳动群众又往往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美国资产阶级借着亚裔劳动群众成为资本主义城市犯罪恶化牺牲品的机会，趁机炒作所谓“亚裔仇恨”，其目的，当然不是真的为了亚裔人民的福祉，而是企图进一步挑唆各族群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将脏水泼到白人无产阶级头上，制造一种仿佛白人劳动者必然、天生就会种族歧视、仇恨亚裔的社会氛围。对于这样的阴谋，一般的亚裔劳动群众固然无法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但是从他们长期的生活经验中，是完全可以了解哪些人对他们的人身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最直接、最迫切的危害。

##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能有“运动”？——关于先锋队问题，向同志们说几句话

（2021年5月1日）

流水

### 先锋队与“先锋队理论”

壮壮同志在好几篇文章中都集中论述了先锋队出现的必然性，以此说明“反对先锋队”的错误，这只怕是一种误解——只有那些笃信各种唯心主义奇谈怪论的小资自由派们才会认为革命能在一夕之间，依靠某些力量的恩赐就完成了。事物的发展是由量变引发质变，革命运动也不会例外，发展的过程中必然首先是一部分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首先觉悟，进而发动起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群众，最后形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获得最后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先锋队就是反对革命本身。壮壮同志所想要批判的“反对先锋队”，事实上反对的是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单独的工人阶级是弱小的，不依靠外部力量（也就是“先锋队理论”的实践者们）就不能在日常斗争中取得实质上的胜利，乃至形成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力量。

其实还有另一种稍有区别的“先锋队理论”，区别在于认为工人阶级斗争风起云涌，力量不断增长，需要的是外部力量去领导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功。我自己对这种形式的“先锋队理论”还是可以接受的，虽然“领导工人运动获得更大成功”这种目的一般不能实现，而且往往因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原因还会起到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应该说也是理论发展过程、青年左翼成长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挫折。而近几年“先锋队理论”的拥护者主要变成了认同工人阶级弱小的前者（或许部分原因和18年事件有关，尤其是声援团自始自终在宣传上坚称“全部斗争行动都是觉悟工人们自发进行的”，部分不求甚解的左翼青年同志就引申出工人阶级弱小的观点）。

当然这种先锋队理论并不是直接否认工人运动，他们承认的是工人运动的形式，比如壮壮同志在19年的《一年多以来的一些经验教训》文中举例了去年的塔吊工人、卡车司机的英勇斗争；而否认的是工人运动的内容，要么认为连经济意义上的成果都没有取得，要么认为工人没有形成组织力量，经济斗争的成果只是资产阶级出于其他原因让步的结果（尽管刚刚还论述过同一个资产阶级是多么的穷凶极恶、强大无比）。

这样的先锋队理论号称是继承列宁的革命学说，是贯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的”的原则。然而他们在实际表达的意思明明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运动”——在这些先锋队们看来，

不靠着外部的领导，工人阶级讨不到工资，建不了组织，甚至连已有的权利都会被蚕食殆尽。列宁同志号召“不要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而先锋队们认为的是，只有靠着他们群众才能长出躯干和四肢，才能成长为运动。

而且为了说明工人阶级的失败，往往要渲染资产阶级的强大，于是中帝论也被借用过来，有时甚至还会借用渲染一下资产阶级自由派说的所谓“中国高压恐怖统治”。不过最强大的还不是资产阶级，还是这些先锋队们——居然能在恐怖统治之下组织起涣散无力的无产阶级们，将来还要带领他们取得革命胜利。但不说将来看看现在：先锋队们觉得一边介绍工人阶级的弱小，一边渲染资产阶级的强大，靠这些能够号召左翼青年们行动起来加入先锋队行列，可最后经常有时是在政治上起到了消极作用，反而让一些左翼青年们陷入了悲观失败情绪中。

### **“永不言败”的先锋队**

先锋队们的宣传有时给左翼青年带来的是失败主义，而先锋队自己却经常是“永不言败”的——并不是永不失败，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丢失了经验教训。

先锋队理论在左翼青年中何时兴起的我不是很了解，13、14年间有着“工作重心是脑力无产者还是体力无产者”、“左翼学生毕业后进工厂工作”等关于左翼融工的争论与宣传，应当是在这一过程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七八年后的今天，先锋队理论的实践经验教训又是什么呢，在先锋队理论的支持者们又是如何叙述的呢？

往往是一片空白，青年左翼们创建平台宣传先锋队理论，很少去讲讲理论是如何在左翼中发展起来的，之前的实践情况。壮壮同志19年的文章讲了塔吊事件、卡车罢工中左派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又讲了设想的知识分子到工人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偏偏就是少了最应该有的对18年事件的经验教训总结，对此前几年先锋队融工成果的说明——这难道不才是最能够号召左翼青年，驳倒反对者的有力材料吗？壮壮同志上个月发的文章《与红色中国网谈谈先锋队和灌输》部分弥补了这一点，但讲的大多还是抽象的可能性，少了具体的现实性。

那么大部分先锋队理论的宣传给人的感觉就是，先锋队理论的拥护者们都是恰在此时应运而生的天才，前人没有做过，只待后人启航。所以先锋队理论——作为现阶段最激进左翼实践理论——在宣传中居然常常是以一副奇妙的头重脚轻姿态出现的。对于中帝论、工人弱小论等等都是信手拈来论证充分，而对于做了什么、能做什么的论述则往往是靠举出一系列可能性的例子。

甚至“脚轻”还算好的，“脚歪”只怕后果更加难料，去年8月一个青年左翼宣传平台《新闻》编辑部发布18年事件纪念文章（<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7325>），总结事件的教

训是“不能再被老左们带歪了路，走向了右倾机会主义”；在一些左翼青年的认识中，18年的失败是由于工人学生们没有经验还抱有幻想，比如使用各种国内通讯工具进行宣传。

当然或许这是由于18年事件的特殊情况有一定关系，不说反思，声援团连比较全面客观反映事件实情的总结似乎也是没有的。但即便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失败都归结于某些不怀好意的外部力量、某些事务上的细节，起码也应该有剩下百分之一的空间来认真思考一下：经过不少左翼同志多年实践，18年事件的长期规划和付出大量代价后，先锋队理论得到了什么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未来将如何发展？否则这种理论如何能成长到能带领无产阶级赢得胜利获得解放呢？

### “先锋队队员”的实践

壮壮同志《一年多以来的一些经验教训》文中还说到参与实践才有成长和收获，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先锋队们也不能是一副“有实践就是政治正确”的态度来回应所有反对者，实践的工作方法也应当考虑到社会现实情况才能真正有效。

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左翼青年同志中的宣传工作：去年在bilibili网站上的左翼青年同志中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制作左翼宣传视频的同志发言称自己将前往印共毛参与革命斗争

（<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03>），实际情况是这位同志在实践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想要退出，碍于面子选择用参与印共毛来解释自己的消失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6414936/>）。

这个事情中体现了部分左翼青年中莫名激进，脱离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狂热：还没有明确组织的虚拟网络空间尚能逼迫一位青年同志撒一个很大的谎（甚至像上面那篇文章里所展示的：一些人发现之后还要声称这是“叛徒行为”），现实中具有一定组织如学生社团等情况恐怕不会更好，之前野草同志总结了参与左翼社团的心得体会（<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8256>），不无可惜地提到：即使2018年以后，社团灌输论改变不大。

这种小资狂热和先锋队理论的宣传者们恐怕脱不开干系，为什么一位左翼青年会认为要抛弃所有社会关系，去到国外参与斗争才是革命的呢？这不正是先锋队理论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强大无比”、“中国工人斗争性不强”等所能导出的结论吗？先锋队宣传员们所热衷的三点：“中国高压统治无孔不入”，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爱讲的；“中国工人受尽盘剥，生活悲惨”，这是一般的进步小资产阶级的同情言论；只有“所以知识分子要参与、领导工人运动”这点才起码算是无产阶级政治宣传。那么先锋队的宣传是起到了让左翼青年们认同第三点参与工人运动，还是让第一、二点片面地占据左翼青年的思想，给别人做了嫁衣呢？现在看来似乎前者的程度要小一些，后者的影响还大一些。

当然比起一、二，我更希望先锋队的宣传能用第三点“一统江湖”，那么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与反对先锋

队理论进行争执，而是让更多的左翼青年理解参与工人运动的光明前途，结合社会现实情况让左翼青年们进行实践。但如果始终要坚持“资产阶级强大，工人阶级弱小”这一出发点，只凭先锋队宣传员们做政治工作，只怕难度是不小的。

实践的工作方法另一个方面就是在工人中的工作，不少仅仅听信先锋队理论，结合自己的热情就要“对工人阶级搞政治宣传”的青年左翼们，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适得其反的各式反例。比如浦江边的火柿子同志总结的去年昌硕世硕斗争经验（<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8091>），就提到了“某些‘左派’的反动作用”，部分左翼学生不加思考地强行向工人进行政治宣传起了坏的影响。又比如上个月一位左翼青年义愤于盟主被批捕，制作了传单希望在线下向外卖员们宣传（<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8203>）实践精神值得钦佩，但传单中的政治宣传语言，即使与工人单独交流时要让对方认同都不容易，何况以传单的形式来宣传。

这一方面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先锋队理论的影响，先锋队理论说要知识分子要带领工人群众，要引导向政治斗争，对于有热情参与实践的左翼青年就变成了以各种形式派发政治口号，用他们认为有效的各种手段“让工人革命”，实在是与客观实际并不符合。

而当左翼青年们真正用心参与工人群众工作实践并且独立思考后，往往会总结出更加接近现实的理论规律。这篇来自认同先锋队理论的《新闻》编辑部的文章（<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02>）总结了他们的实践经验，其中包括了不符合甚至是反对先锋队理论的观点，比如资产阶级不能无限制、无代价地使用镇压力量，工人斗争已经在实质上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困难，左翼青年参与工人讨薪活动的定位、行动和目的，一般情况下直接对工人进行政治宣传并不合适等等。

尽管这篇文章大部分还未能摆脱先锋队理论的窠臼，但在《新闻》杂志中众多坚定宣传先锋队理论的文章中还是显得弥足珍贵。若文章作者能进一步“解放思想”，尝试抛弃某些观点，想必理论能更加流畅自然地与实践经验贴合。

庸俗“灌输论”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温床

(2021年5月4日)

远航一号

流水同志这篇文章里没有提及或者没有明说的另外一个分歧是：“先锋队”到底是在实际斗争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还是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本阶级并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只是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出身工农但有望成为小资）、尚未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左青”？

列宁“灌输论”的一个前提，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才能掌握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与其他各阶级之间的全部联系）。但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都证明，不是读了几本书甚至几百本书，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是必须经过从理论到实践，从感性到理性，再从理论到实践，再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这样多次循环往复，才能逐步接近真理。作为一般的刚刚走出校门的“左青”，就算是开始接近真理，顶多不过掌握了真理的局部之局部，拿什么去灌输？

列宁在《怎么办》第三部分第五节“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战士”中关于灌输问题的论述是：“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

请注意：列宁关于灌输的理由是，政治意识只能从工人经济斗争的外面来，因为政治意识需要了解一切阶级相互之间的联系、一切阶级与国家的联系。注意，列宁讲的是“一切阶级”。关于这些“一切阶级”的知识，列宁认为，不能来自“实际工作者”，只能来自社会民主党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对比一下毛主席 1943 年的论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显然，列宁在 1901 年创作《怎么办》时，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形成，政治经验不丰富，对于工人阶级斗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成熟、阐述不充分。列宁的“灌输论”有意无意间造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机械割裂，似乎实际经验（工联主义知识）只能来自于“实际工作者”（工人与厂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知识）只能来自“外面”，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更没有一个相互作用、循环往复的过程，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知识”也不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种“灌输论”，客观上是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种教条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

上述“灌输论”，在今天的中国，又在各左青小组中滋长出教条主义（用理论硬套实践），并由教条主义发展为宗派主义（因为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别人不仅不正确，而且错误就意味着危害革命，所以要不接受本团体收编，要不就绝不能团结，偶尔团结，也采取一些不诚恳的办法）



## 要善于想象革命 (2021年5月6日)

远航一号

为什么要想象革命？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有远大的理想，有改天换地的精神，有消灭一切毒蛇猛兽、铲除一切人间害人虫的决心和气魄。革命是我们的生命。

但是，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和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怎样才能想象革命呢？怎样的革命才是现实的、可预期的，如毛主席所说，“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的、“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这是个问题。一方面，在2012年以后一度蓬勃发展的左派青年小组在2018年受了大的挫折，他们的“革命路线”也随之破产了，这些小组的领袖大多数也已经“淡出”了。还有一些同志并没有放弃理想，但是也难免陷入相当的彷徨和迷茫，除了“坚持”以外，暂时还不能够清楚地看到坚持的前途在哪里。

另一方面，新一代的青少年进步小组正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这些新的小组，朝气蓬勃、斗志昂扬，但是并没有经受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考验，还不了解斗争的残酷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为什么在经历了一次大的风浪之后，有些人被淘汰了，有些人却能够迎难而上，在大风大浪中脱颖而出，迎接下一场战斗？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对于未来的胜利有没有信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人是有思想、有预见能力的动物。人的行为是受自己对未来的预见指导的。无论是干革命还是谋生活，我们的将来有没有“盼头”是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的一个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中国的革命事业有没有“盼头”呢？为此，有必要先讨论一些实际问题。

### 二十世纪的革命经验

革命是改天换地的事。但是，中国的“天”怎么改、“地”怎么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前人的经验。

二十世纪世界各国的革命（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反革命）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以及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

了解红色中国网的同志知道，2018年的夏天，在红色中国网与部分左派青年同志之间爆发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帝国主义国家”的争论。在那场争论中，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按照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正确理解，如果中国果然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从而可以通过剥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区而攫取大量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不仅不能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且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将有能力收买工人贵族、培植改良主义，建立起资本主义范围内的阶级妥协（见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6083>；远航一号，“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6136>）。

反对我们的同志不承认我们的观点，并且指出，沙皇俄国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并且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这里且不论俄国革命的胜利是由当时沙俄的帝国主义性质决定的还是由其半外围的性质决定的，仅就俄国革命的形式来说，俄国革命是通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彼得格勒以及莫斯科的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首先，是因为帝国主义大战严重地削弱了沙皇俄国；更主要的，是因为在战争中沙皇俄国不得不进行全面动员，从而造成了工人和劳动农民掌握武装的情况。这两种条件在今天的中国都不具备。

如远航一号在以前论证过的，由于世界各国劳动群众政治觉悟的增长以及现代战争形式的变化，在中国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会再发生以消灭敌对国全部战争潜力为目标的全面战争，资产阶级也不再敢实行“全民皆兵”式的动员（见远航一号，“中国资产阶级会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吗？”<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8110>）。由于这些变化，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不会出现主要大城市的工人掌握大量武装而资产阶级军队濒于土崩瓦解的状况。事实上，在1917年以后，除了在一些国家曾经发生过由激进军官集团发动的军事政变以外，在各国就再没有发生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情形。

那么，未来的中国革命能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呢？也是行不通的。我们知道，在上一次革命的时候，中国社会是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剥削劳动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联系的其他国内反动派。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工业国，未来革命的主力军是城市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与对象与上一次革命相比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决定了新的革命不可能照搬旧的革命策略。

目前，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些外围国家，在资产阶级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仍然有按照农村包围城市的指导思想坚持革命斗争的力量。很多青年同志对于印共（毛）的斗争抱有很大的期待。这种期待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目前，印共（毛）的军事斗争进入了困难阶段，其根据地和游击区与十多年前相比都大大缩小了。印共（毛）掌握的武装力量目前不到一万人。相比之下，印度资产阶级的正规军和各种准军事部队有大约200万人，还不算各种地方“民兵”和地主武装。从社会基础来说，印共（毛）主要依靠的是山区少数民族，在印度大多数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力有限。印度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主要受国大党、印共（马）和印共的影响。前者是印度历史悠久的资产阶级政党，后两者是老牌修正主义党。

自1989年以来，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诸多外围、半外围国家政权更迭的一种主要形式。所谓“颜色革命”，在形式上是通过持续的、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和示威活动对通常是采取独裁、专制政体的统治者施加压力，直至对方被迫放弃政权，实现政权更迭。这种“颜色革命”，通常在表面上是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活跃分子领导，但往往得到资产阶级某一派的默许或支持，在许多情况下还有若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介入。工人阶级在历次“颜色革命”中往往处于政治上不自觉的状态。

如果对历次“颜色革命”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凡属于“成功”的“颜色革命”，其最后“成功”都不是由于单纯的街头抗议乃至“国际制裁”的压力，而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特别是在斗争的最后关头资产阶级军队选择“中立”或公开支持反对派。因此，即使是所谓“成功”的颜色革命，最后的结局也是资产阶级的一派代替另一派，不仅

工人阶级白白牺牲，连小资产阶级也得不到实质性的好处。不仅如此，一旦形势稳定下来并且资产阶级感到政治上有必要，昨天还“支持民主”的军方，今天就可以反过来镇压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埃及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缅甸的情形也类似。

2019年，香港群众（主要是香港小资产阶级）企图在香港复制“颜色革命”的模式，但是在香港根本不具备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一部分倒戈的条件。除此以外，香港工人阶级没有发动起来（不是说香港工人应该被“发动”，香港工人拒绝被“发动”符合他们的实际物质利益），香港小资产阶级又采取了歧视、排斥内地劳动群众的错误立场，加之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不愿意淌香港这滩浑水，香港群众运动必然要陷入失败。

## 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这样说来，二十世纪革命（与反革命）的几条主要经验——城市工人武装起义、持久人民战争、“颜色革命”——在今天的中国都行不通。

那么，前方的道路在哪里呢？我们说，作为革命者，应当要想象革命，不仅应当想象革命，而且还必须敢于想象革命、善于想象革命。

要做到善于想象革命，就不能拘泥于前人、外国人的经验，就要敢于、善于探索前人和外国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就要敢于和善于摸索出属于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新路。

要做到这点，就要努力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相比有哪些特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这样，才能找到未来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未来中国革命的优点——以往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失败了，或者他们的经验不再适用了，凭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就有可能胜利？

了解红色中国网的同志知道，若干年来，我们一直主张，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从“中帝论”（主张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论点）出发不可能寻找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如上，现在不存在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条件），而从中国是一个半外围国家的认识出发，却有可能寻找到这样一条道路。

什么叫“半外围”呢？首先，不要把“半外围”与“半殖民地”混淆起来。“半外围”是相对于“外围”说的。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这表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在生产关系方面已经几乎不存在前资本主义残余，表现在中国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主要的工业国，表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很大的增长，已经不存在前资本主义形态的剥削阶级。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并不掌握大量的尖端技术（能够带来超额垄断利润的技术），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掌握（极个别领域除外）。这一方面是因为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的阻挠，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导致一旦中国资本家掌握某项技术，哪项技术在世界市场上就会丧失其垄断特性，而逐步沦为一般的竞争性技术，从而无法给中国资本家带来超额垄断利润。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况：大约在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开始放慢，与世界技术前沿接近的速度也在放慢。为了维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而过度投资又反过来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已经有很多论述，在未来的几个月还会提供更多的统计证据。本来，在2007年以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是大大高于世界

平均水平的，但是近年来已经下降到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并且这个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

如果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能制止，会给中国资本主义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一种可能是，利润率下降到一定水平以下，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而外资撤逃，中国的资本家也纷纷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崩溃。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就会发生急剧变化。但是，毕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还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未来的经济危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爆发，经济危机会不会转化为政治危机，都有待于未来的实际发展来验证。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随着利润率的下降，中国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那样，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率会逐步放慢，但并不崩溃。我们主要来讨论这第二种假想情形。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地位，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无法在世界技术前沿与主要核心国家展开竞争（或者这种竞争会导致参与竞争的资本家利润率一起下降，将垄断行业变为竞争性行业）。另外，中国也不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无法通过高价值自然资源出口取得某些阶段性的超额利润（如中东石油出口国）。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中国资本主义只能依靠残酷剥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这不仅表现在比较低的工资水平，更多地是表现在超长的劳动时间（平均每个工人的年劳动时间在 2300 小时以上，比一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年劳动时间多出三分之一到一半）和非人的劳动强度（从而过劳死、工人绝望自杀频频发生）。但是，为了维持这样的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必须剥夺工人的各项民主权利，剥夺工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的权利，并用专制手段对工人的反抗进行镇压。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作为中国特色的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所以，对于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的需要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永远不可能与中国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就社会福利、政治民主等问题达成稳定的妥协。

但是，现在这种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的物质基础出现了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见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8370>），为了维持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所必需的青壮农民工劳动力正在迅速萎缩。2016 年时，在 2.82 亿农民工中，尚有约 9000 万年龄在 30 岁以下；到了 2019 年，在 2.91 亿农民工中，只有 7300 万年龄在 30 岁以下。在短短三年时间中，30 岁以下农民工的总数减少了 1700 万，平均每年减少约 570 万。2020 年，农民工总数减少到 2.86 亿，其中 30 岁以下的减少到约 6500 万，比上一年减少了 800 万。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情形特殊。即使不考虑 2020 年，以 2019 年为起点，如果 30 岁以下农民工平均每年减少 570 万，那么到 2032 年，中国 30 岁以下的农民工将完全消失！

我们知道，无论是制造业的血汗工厂还是现在新兴的为网络平台服务的外卖员和快递员，对工人身体健康的消耗都极大，只有 30 岁以下的青年工人才勉强可以承受并连续工作数年。一旦 30 岁以下青年农民工完全消失，中国资本主义几个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就将陷入没有足够的工人供其残酷剥削的窘境。

当然，上面的数字计算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线性外推。现实经济的发展更加复杂，到2030年以后，中国的青年农民工应该也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到那时，中国的青年农民工规模将比现在极大地缩小，能够适应中国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模式的劳动力也将严重短缺。

这将带来几个方面的后果。首先，随着青年劳动力的短缺，以及上述的利润率的下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在2030年以后可能会快速放慢，直至陷入完全的停滞，其情形可能会与现在的欧美国家类似。另一方面，青年劳动力的短缺会大大地提高这一部分劳动力的斗争能力，迫使不同行业的资本家用更高的工资来争夺有限的青年劳动力，而工人斗争能力的增强又会反过来加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危机。

有的同志可能会提出，资本家会不会用机器换人、自动化等办法来应对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呢？这个问题以后可以再详细探讨。这里仅仅指出，机器换人仅适合于一些特定的劳动过程，其技术可能性被资产阶级媒体极大地夸大了，而且自动化需要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会进一步加重利润率下降的危机。

如果中国经济陷入完全停滞，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的欧美各国，虽然尚未发生革命，但是已经普遍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旧秩序正处于慢性瓦解的过程中。

就中国来说，经济停滞对于资本主义秩序的打击将更加沉重。这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始终依赖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模式。以往，广大劳动群众勉强还可以忍受这种剥削模式，是因为劳动者平均的实际工资在过去一直快速增长，使得广大劳动群众多少有一些“盼头”，农民工还可以盼着有朝一日成为城里人（或者最低限度回家盖几间房），城市工人的后代还可以盼着“消费升级”，工农子女还可以盼着自己比父母一辈过得更好，小资还可以盼着过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甚至实现“阶级跃升”，从而各自有相对充足的心理理由来抵消生理上被压到极限的负担。然而，一旦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大放慢并陷入完全的停滞，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也必然放慢并停滞，甚至下降，那样，广大劳动群众承受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心理依托将完全丧失。这种心理依托一旦丧失，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模式便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面崩溃。这种崩溃，可能表现为大量的、频繁的、无法全面镇压的自发罢工，还可能表现为普遍的怠工和破坏行为，并且像新冠病毒一样，迅速地在工人中传播开来，竞相效仿。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由于“法不责众”，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将全面瓦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将在恶性循环中迅速瘫痪。

### **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抗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总罢工”**

如上所述，未来的中国革命不会走城市工人武装起义、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也不会走“颜色革命”的道路。但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提出过一种工人阶级“总罢工”的设想。

这种“总罢工”的设想，就是说，当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斗争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可以发动全国范围的、各行各业的总罢工，通过使得资本主义经济陷入瘫痪的办法，迫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投降。根据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罗莎·卢森堡曾经指出，这种“总罢工”未必是由一个统一的机关领导、在全国工人中同时发动，而是可以采取遍布全国的大量自发罢工此起彼伏的形式。

未来中国工人革命的道路，可能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没有统一领导的全国范围“总罢工”的形式——反抗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总罢工”。

那么，这种自发的但是全国范围的“总罢工”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我们反对庸俗的“灌输论”（那种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掌握真理并有资格向工人阶级单方面“灌输”的思想）。但是，我们从来不否认，纯粹自发的、非政治性的工人斗争不可能自动地带来社会主义。但是，全国范围的、普遍的、自发的工人斗争虽然不可能自动地带来社会主义，却可以带来社会主义生长所需要的丰沃的土壤。正是在这种全国普遍的工人斗争中，才会产生出一大批经过实际斗争锻炼的工人阶级优秀分子。这些工人阶级优秀分子又可以与小资产阶级出身但已经初步站到了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革命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建立起新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的、普遍的工人斗争中陷入瘫痪，资产阶级将陷入动摇和混乱。当资本主义经济陷入瘫痪时，国内外垄断资本还可以勉强维持，但大批中小资本家将陷入全面破产。中小资本家虽然其经济力量有限，但人数相对较多，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主要社会基础。随着大批中小资本家破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将陷入严重的分裂和内讧。

这时，会有一部分资本家集团，为了挽救本集团的短期和眼前利益，不惜牺牲整个资产阶级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资产阶级国家也会丧失维持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能力。在广大劳动群众斗争的压力以及资产阶级内部某些集团压力的共同作用下，资产阶级国家将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用牺牲本阶级长远利益的办法，来换取短期的生存和稳定。比如，满足广大劳动群众限制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某些要求；比如，允许若干行业的工人按照民主原则组织工会；比如，允许区、乡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行自由选举。

然而，这样的让步，一旦开始，就将一发不可收拾。随着大量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脱颖而出，随着事实上或者公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随着资产阶级地方统治的瘫痪和瓦解，将首先在一部分地方出现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只要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能将所有的无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团结起来，消除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消极影响，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城乡半无产阶级和进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同盟军的社会主义人民大同盟，分化、瓦解资产阶级，孤立并打击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从而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 在没有希望与女朋友的年代，北一辉很可怕吗 —— 不，还有比北一辉更可怕的 (2021年5月20日)

远航一号

要感谢向东网友推荐的署名王陶陶的文章 —— “中国网络意识形态的现状与隐忧”。作者以一个没落自由派的立场，从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狭隘眼光出发，最大限度地、比较诚实和公正地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如何导致“新生代”抛弃自由主义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以及“一个贫穷的新生代群体”为什么必然“仇恨有产者”、必然“激烈冲击现有经济秩序”。

这个王陶陶是什么人呢？查了一下知乎，得到了有趣的回答：“（在知乎上）有三个王陶陶。第一个王陶陶，是作为民族主义者的王陶陶。这把他和绝大部分逆民、公知区分开来。第二个王陶陶，是作为右翼保守势力的王陶陶。… 他写了很多关于革命的书，但是并没有表现出对革命者的同情。相反，他往往维稳反革命。那么，他维的是谁的稳？在知乎问题‘谁是中国最伟大的人’中，他回答是邓公，在提问‘为什么中国科研落后’问题中，他回答中国科研体系被官僚控制，基层科研人员很难保护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被领导篡夺。从零零总总的回答中，都表现出他是个欣赏私有制西式国家的人。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私有化、市场化、西化的中国。因此，他本能地反感任何反资思想，华为 251 等反资运动中，王陶陶从没有站过劳动者的边。而知乎的主流言论同情劳动者，这是王陶陶口碑逆转的原因。第三个王陶陶，是作为英美文明崇拜者的王陶陶。虽然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内心中是极度崇拜英美文明的。他内心中是希望中国人像盎格鲁萨克逊人一样，战略上充满侵略性，战术上坚韧而懂得隐忍。而他对侵略文明的崇拜最终摧毁了他的理智，导致他变得像公知一样仰望英美的一切。最终在疫情的判断上，他失手了，堵上全部声望，梭哈到了输的一方。从王陶陶在知乎的起落，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网上民族主义者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向左，一派向右。入关学能够成为显学，是因为入关话术体系中，正好回避了左右辩经，以切美国人蛋糕为目标，暂时团结了民族主义者中的左右两派。然而我认为，入关学迟早会在左右问题上分裂。用嵩县的话来说，异端比异教更可恶。”

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的年代。这种激化必然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得到反映，在网络时代就必然要在所谓“网络舆论”上得到反映。王陶陶说：“从 2015 年以来，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了解释这种“巨大的变化”，王陶陶认为有“两种关键性的因素”。“第一种因素 … 即中西关系自 2015 年底以来的不断恶化”。关于这个“第一种因素”，我们暂且不做深究。比较有意思的是王陶陶所讲的“第二种因素”：“代际认知分化或者说代际矛盾”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这个欲言又止、云山雾罩的“代际矛盾”到底是个什么矛盾？且看王陶陶的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的中国人受惠于开放和市场带来的好处，尤其是知识青年，更是如此。60 后、70 后大学生毕业后，很快以较低的成本在城市定居，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

生活，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规则认同度是非常高的，这一代高知人群甚至普通人很难理解任何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反感情绪。这种心态大致一直持续到80后左右，但到了90后年轻人中，则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至少相当一部分90后知识青年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认知与前辈不同。我们很难理清变化的时点，但新一代年轻人对市场经济规则的看法确实是负面的，至少比前辈更不好。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中国新一代知识青年尤其是小镇迁居到大城市工作的知识青年，在经济上更崇尚财富平等而非自由竞争，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合理性的看法更加复杂化，甚至偏负面。”

原来，在王陶陶看来，“一代代的中国人”都受惠于“开放和市场”，包括了60后、70后、80后。然后，突然间，不知在什么“时点”，“开放和市场”就不再给“年轻人”带来好处了，从90后开始，“认知”就不同了，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看法就“复杂化”了，甚至“偏负面”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里，王陶陶口口声声讲“代际矛盾”。不知道王陶陶是因为太年轻（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王陶陶不像别的年轻人那样反感“市场和开放”呢），还是眼界太狭隘、还是立场太偏颇，整整一代、几千万60后、70后国企工人因为“受惠于”“市场和开放”而下岗和失业乃至沦为赤贫就这样被轻松无视了，另外几千万60后、70后的农民工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为了王陶陶笔下的“中产阶级”享受物质繁荣而付出青春和血汗、付出数以亿计的断手断脚、终于老无所养也被很淡定地被忽略了。

至于90后、00后，也不是全部都拒绝赞美市场、赞美开放、赞美私人产权的。网络上大胆炫富甚至不惜“坑爹”的富二代、官二代按绝对数量来说没有成千上万也有成百上千。

王陶陶所看到的，果然是“代际矛盾”吗？王陶陶是读过一点马克思的：“马克思说过，经济地位决定意识形态的流向，事实也果然如此。”但是，王陶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阶级矛盾”这个词，哪怕想一想，恐怕对于作者王陶陶来说都是十分恐怖的，因此，还是不提为好，不提为好。

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到底是上述“三个王陶陶”中的哪一个。但是，从作者的自我介绍来说，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梗概。据作者的自我介绍，他（她）当年也是在媒体行业里工作的，“我以前曾经在一个媒体公司工作，刚开始一个月薪水是税前4800，税后3000多，后来上涨到税前6000，税后4900，最高时达到税前8000，税后6000左右。租房每月花费是2000元，吃饭花费每月也是2000左右，一个月省吃俭用，结余1000-2500左右”。税前月工资8000左右，年薪就是10万元左右，已经超过中国经济的正式部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了。按照这个工资水平，王陶陶先生（或女士）已经可以位列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甚至摸到了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边了。

王陶陶所描述的工作环境也带有资本主义正式部门的特点：“我过去工作过的媒体企业还是非常人道的，至少基本保证双休，上班时间也不会超过8个小时，工作环境是比较安逸舒适的，虽然收入不高（？），但个人时间却也丰富。”（问号是笔者加的）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像付国豪先生一样在一线城市混不下去了，王陶陶转进回到了“老家”，最后谋了个“乡镇公务员”的位子，勉强还算在“体制内”。

所以，从王陶陶个人的事业来说，是有些失败的，但是他（她）的可贵之处在于：虽处江湖之远，不忘忧其君。王陶陶的“君”首先就是“市场经济和私人财产”，曾经“苦口婆心地”劝“年轻人”对市场经济要“感恩”、要“尊重”，却得到了令他（她）哑口无言的答案：

**“我凭什么尊重这种狗屁规则？凭什么比我毕业早五年的同事明明没有我优秀，却买到了一座我现在需要三倍价格才能买得起的房子？凭什么那些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深圳农民什么都不做，一天收的房租比我这个勤劳好学的优秀工程师几个月还要多？凭什么那些房东打打麻将，一年房价上涨的好处比我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还要多？我现在没有钱、没有女朋友、没有时间，很快连青春和希望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让尊重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凭什么？”**

是啊，一种让所有的劳动者都没有房住、没有“钱”（于是就没有医疗、养老、子女教育）、没有男女朋友、没有可自主支配的时间、没有青春又没有希望、又被逼着 996 和 007 的社会制度，难道还值得任何“尊重”吗？不要说“尊重”，应当问，“新生代”还能够忍耐多久？

从这里，王陶陶感受到了危机，感受到了恐怖。恐怖首先来自于“颓废思想的出现”，但是更加恐怖的是“仇富思潮的出现”，是“新生代年轻人的激进左化”，是年轻人认识到“自由主义”就是“自由的压迫员工、自由的炒作房价”。

怎么办呢？“自由主义”还能挽狂澜于既倒吗？不得不说，王陶陶的观察比绝大多数自由派以及一些还在幻想着“联合”自由派的“左派”都更加敏锐。他（她）为老自由派们的麻木和迟钝而焦急、而惋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数源于体制内外的有产阶层，他们往往倾向于将这种本质上服务于自己利益的思潮视为人类道德的唯一追求，并虚伪地自我感动不已。... 这些人不能理解中国新生代年轻人为何对自由主义如此反感 ...”

王陶陶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在一切“英美之外”的国家，“自由主义”行不通：“现代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有产者思潮，她体现了有产者实现有产后对政治权力和更大经济利益的追逐。从本质上看，他对更渴望追求基本经济利益的无产者毫无吸引力，这也是英美之外的自由主义者历来只会把事情搞砸的原因——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人数稀少的自由主义者依赖于无产者的不满，却在事成之后无法建立无产者真正渴望的经济秩序，进而引发新的动荡。”

这样，王陶陶就用他（她）自己的方式，从他（她）自己的眼光，得出了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中国这样的半外围资本主义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行自由民主、福利国家等阶级妥协的历史空间。于是，“自由主义”或者任何“有产者思潮”就对无产者“毫无吸引力”，因为这样的“主义”或“思潮”满足不了无产者的“基本经济利益”。

王陶陶对于“自由主义者”的尴尬分析地也很透彻：“自由主义者”要夺权就离不开“无产者的不满”，但是“事成之后”又给不了无产者他们“真正渴望的经济秩序”。于是，等待着“自由主义者”的大概只有两种前途，一种是，“事不成”，还有一种是，“把事情搞砸”——等待着真正的“王者”无产阶级来收拾残局。中国的自由主义于是正在无可挽回地没落下去：“中国自由主义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既没有时势，又缺乏群众的没落思潮，它只能是知识分子聊以自嘲的沙龙。”

对于这样的没落，王陶陶当然很不甘心。怎么办呢？王陶陶想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祭出幽灵，一个是告诫“体制”。

王陶陶祭出的幽灵叫做北一辉：“我读世界历史的时候，常常感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轻人被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均贫富意识形态所吸引，缔造了北一辉引领之新生代激进民族主义和仇富思潮的迅速崛起。... 历史不会忘记，20世纪30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轻人，在北一辉民族主义和均贫富思潮的引领下，打着‘尊皇讨奸、斩杀国贼’的旗号，先是猛烈攻击日本的财阀，随后则是猛烈攻击日本的官僚，最后发展到挑战整个日本体制的程度。”

王陶陶祭出的这个幽灵确实能吓到一部分小资，准确地说，一部分小资“左派”（有人管他们叫“学院派”）。这些“学院派”说：看看，中国青年的思想一旦被北一辉俘获，成了“国家主义者”，那么将会多么可怕啊！对外侵略扩张、对内法西斯式镇压，天塌下来了，这可怎么得了？对于这部分同志杞人忧天的错误，我们另找机会批评（过去，红色中国网已经论证了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既不会发展为帝国主义也不会发展为法西斯主义，也不可能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里仅仅指出，就算北一辉的幽灵能够吓倒一部分小资“左派”，甚至吓得他们急急忙忙要与自由派“联合”，这着实无补于整个中国自由主义正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大局。对于广大的中国无产阶级以及正在无产阶级化的大批小资群众来说，他们才不管什么北一辉、南一辉。他们的实际问题是，谁能够解决住房、双休日、八小时工作制和男女朋友？谁能够为他们自己带来希望、为他们的子女带来青春、为所有人带来尊严？谁能够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哪怕是毛泽东再世，中国的未来就属于谁？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王陶陶宁可用北一辉的幽灵吓唬人，却刻意回避了中国自由派的宿敌——毛泽东和文革——是为了逃避真正的敌人而故意竖起一个稻草人当靶子吗？

但是王陶陶还有一招杀手锏，是隐藏在北一辉这个幽灵后面的：“无论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存在多少分歧，官方依然是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的支持者和捍卫者，这就决定了——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工薪收入的停顿，大多数新生代年轻人在经济上与现有规则的矛盾会越来越明显，而自由派的瓦解和资本的低头，会让这种矛盾愈来愈难以掩盖——这种冲突，最终会难以避免地指向官僚阶层... 裹挟着对富裕前辈的仇恨不断升级的，最先被新生代攻击的将是被称为资本和买办的企业家，随后则是官僚阶层，如果这种经济矛盾不能缓和，那么这种趋势将很难停止。”

这一段，句句都是大实话。别看我们“自由主义者”与“官方”表面上互相攻讦，大家都是吃资本饭的，所以，“官方依然是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在要不要捍卫“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和“官方”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一家人。所以，“自由主义者”解决不了——毋宁说，已经无法再用“自由主义”掩盖——的矛盾，“官方”一样解决不了。只要这些矛盾解决不了也掩盖不了，“越来越明显”，那么，先是“自由派的瓦解”，接下来，“新生代”就会攻击“资本和买办”，随后，就会攻击“官僚阶层”。

王陶陶接着说：“这样的意识形态必然是激烈冲击现有经济秩序的，也是必然反体制的... 对此，应该尽早引起重视。”“自由主义对国家构成的威胁，绝不可能与之匹敌。”

这里，有点图穷匕首的意思了。王陶陶在对“体制”、对“国家”喊话，你们眼瞎了吗，你们脑子进水了吗，你们难道看不出来，我们与你们一样，都是“市场和开放”的支持者、“私人产权”的捍卫者，我们对你们是构不成真正的威胁的！真正的“威胁”、真正的“反体制”来自“一个贫穷的新生代群体”、来自“激烈冲击现有经济秩序”和“无情推进均贫富”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一个“乡镇公务员”能够看到的问题，难道“体制”看不到吗？只不过，“体制”也有“体制”的难处，“体制”也是困在系统里。要是镇压能解决问题，早就镇压了；要是收买和让步能够解决问题，也早就收买了。如今这年头，“体制”要操心的事太多了，保江山的事都外包给“辅警”了；王陶陶之流的自由派不当“体制”的家，哪里知道“体制”的难。至于什么“星辰大海”、“切美国的蛋糕”，也就是让那些荷尔蒙旺盛却又找不到性伴侣的男青年们权充一下性想象的替代品，能骗一天是一天。真到骗不了的时候，“体制”倒不害怕北一辉。不过，还有比北一辉更加可怕的幽灵——那颗真正的精神原子弹！

##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好？ (2021年6月3日)

远航一号

“激活”网友和“仗义执言”网友在红色社区论坛中讨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比较以及未来计划经济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这是有意义的讨论。

我们反对凭空想象未来社会的样子，但是在建设新的马列主义运动的过程中，总结以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在分析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解决资本主义所解决不了的各种矛盾，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未来革命所需要的理论准备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当然，这种在头脑中先建成的建筑还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材料是否具备，结构是否合理，都要在建设过程中逐步解决。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应当逐步消灭商品经济并实行计划经济呢？这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真正建立并巩固，从而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实行计划经济，才能消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灭巨大的经济浪费，从而为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开辟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严重阻碍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经济危机的原因，又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剥削，劳动群众的消费购买力赶不上现代大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从而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进而导致经济危机；二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没有统一的计划，各个资本家根据自己主观的、片面的认识决定投资和生产计划，相互之间没有协调，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在某些行业中带来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另外一些行业则发生严重的生产能力不足，从而引起严重的比例失调和资源浪费。（这里暂且不讨论马克思提出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导致危机的理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上述两种危机（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要带来的。只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计划，在对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进行科学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再根据社会现有的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资料，做出合理安排，使得每一个行业、每一种产品的生产能力都与这一行业、这种产品的社会需要大致相当，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市场所带来的巨大浪费，消灭经济危机，保障物质生产力的快速平稳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都有很大发展，在克服消费不足危机和比例失调危机方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实践中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或者不存在、或者很不明显。就消费不足危机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大加强并自觉实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纯粹由于劳动群众购

买力不足而引起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已经几乎不存在了。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协调的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实践中相对于资本主义也没有表现出优势，局部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频频发生，有时还很严重。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就爆发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辩论。辩论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哈耶克等提出，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以后，社会主义计划当局就无法收集并处理数量庞大的为了合理“经济计算”所必需的信息，因而是不可行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就可以完全解决哈耶克提出的信息问题。这是一种误解。哈耶克提出的信息问题，更多地是针对大量人们亲身经历的、在具体环境中获得的、无法用统计数据表达的信息，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实践知识”。此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谓大数据、云计算所依据的信息很多来自于垄断资本家窃取的信息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搜集的公民隐私。这样的技术手段与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都是不相容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应该是一个满世界摄像头的社会。

那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什么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比社会主义计划有优越性呢？主要有两条，一是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人都会为了发财致富努力劳动、努力创新；二是认为市场可以引导消费者、企业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实现资源的有效率配置。这两点实际上也都是有问题的。就第一点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劳动者是没有生产资料的，因而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都是有限的；即使少数劳动者一开始还有幻想（比如新进城农民工），假以时日，或者到了第二代长大的时候，也就纷纷幻想破灭，再也不做发财梦，直至“躺平”。

至于市场引导消费者、企业做出合理决策，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御用文人往往把所谓“看不见的手”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资产阶级经济学自己从来没有在严格意义上证明“看不见的手”能真正做到资源有效率配置。亚当·斯密严格来说只是提出了一个假说。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没有真正从数学上证明所谓“一般均衡”可以存在（也就是证明存在一组价格可以同时保证所有市场上供求平衡）。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才勉强可以证明，在加了一系列极端不现实的假设（比如消费者和“厂商”都有完全信息）以后，在所谓“完全竞争”条件下，可以实现所谓“帕累托最优”。这个所谓“帕累托最优”又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个很奇怪的概念，说的是资源配置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改善自身的福利。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是无法衡量和比较社会总福利的，所以只能用一个人的福利与其自身的福利相比较。

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市场价格的作用。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承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和私利，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一般来说也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那么，在所有人都追求个人利益的前提下，社会怎么会进步呢？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归根结底是为了证明，当许多个消费者的需求和许多个资本家的供给加在一起以后，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价格，可以合理反映消费者的“偏好”，还可以合理反映各种社会资源的成本。这样，在价格的引导下，无论资本家还是消

费者为了追求私利都可以做出符合整个社会进步方向的选择。一切为市场经济的辩护，归根结底都是基于这个论点。

但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己的研究已经得出结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正确”的，就是说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的利益或社会的成本。比如，差不多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不包括这些商品的环境成本，更不必说给劳动者强加的996、过劳猝死等巨大社会成本（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市场价格“不正确”的情况叫做Market Failure或“市场失败”；中国资产阶级为了美化资本主义市场，将其翻译为“市场失灵”，仿佛市场一般还是很灵的，只是偶尔失灵）。这样，一个社会全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又受到了“不正确”的价格的引导，从而拼命地追求那些私人利益大于私人成本但是真实社会成本大于真实社会收益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内卷”），在长远不仅不会带来社会进步，而且包含着巨大灾难的危险。

就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来说，确实没有做到如当初列宁所许诺的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过资本主义，也没有在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率方面超过资本主义。但是，在半个世纪以上的长期经济增长率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同期发展水平类似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可以做到大致相当。当然，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以及自由派分子，会拿出所谓西德比东德发展更快作为例证，但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拿出中国与印度相比作为反例。就大样本的、同等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来说，长期经济增长率大致相当，应当是持平之论。

社会主义的真正优越性，不在经济增长方面，而在于充分就业、铁饭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工人疗养院；简单说，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都过上有人的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像牛马一样没日没夜为资本家“奋斗”，又像农奴一样被资本家随意侮辱打骂。

社会主义既然有这样大的优越性，在历史上又是怎么失败的呢？一是因为，官僚集团窃取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又为了自己发财致富并且要把权力和财富世代传下去，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官僚集团不仅自己要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而且还动用他们所掌握的宣传机器，欺骗人民，用所谓“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划大饼，又用复辟初期所谓“万元户”典型刺激劳动群众中的某些落后观念，然后拼命鼓吹所谓“大锅饭、养懒汉”，“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类似于撒切尔夫人的There Is No Alternative或“别无选择”），使得许多缺乏政治经验的劳动群众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除了官僚集团的叛卖以外，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就需要参加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与资本主义做生意，因此就要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要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竞争，或者靠技术，或者靠资源，或者只能拼廉价劳动力。由于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甚至极端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不可能在尖端技术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像中东石油出口国那样资源丰富、人口又少的情况，属于可遇不可求。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与资本主义国家拼劳动力成本。但是，恰恰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过的是像人的生活，这必然意味着劳动力不可能“廉价”。所以，从长期来说，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社会主义经济竞争不过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低效率，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太野蛮。打

个比方，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是一个巨大的内卷机，内部竞争的规则是相互比狠、相互比烂。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又没有海外超额利润，又不能996，结果只能暂时退出世界历史舞台。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社会主义无法和资本主义竞争，那么，社会主义的出路在哪里呢？社会主义的出路就在资本主义走到尽头的时候。资本主义这个巨大的内卷机，内卷到最后，是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这一方面表现在全世界的生态系统濒临崩溃，即将毁灭人类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不能维持“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不是表现为物质消费水平的绝对低下，而是表现为劳动者无法在有尊严、不过度透支体力和情感的情况下完成正常的代际劳动力再生产。中国资本主义长期逼迫亿万劳动者在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条件下非人劳动的结果，就是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逐步崩溃；这种崩溃必将反过来引起资本主义积累和统治秩序的崩溃。

那么，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当是怎样的呢？首先，应当在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将社会剩余产品（以及固定资产的折旧）集中起来，在全社会民主讨论和决策的基础上按照统一的计划来决定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和使用。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同，未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用剩余产品的原则，不是为了实现物质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而是首先将全社会的物质消费水平限制在生态可持续性原则所要求的水平以下，然后将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用于改造国民经济，使其建立在生态可持续的物质基础之上。

在消灭了资本家阶级的奢侈浪费并停止了绝大部分对生态系统有害无益的扩大再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竞赛以后，可以立即大大缩小社会物质生产的总规模。在中国，由此而减少的物质产品生产可以占现有物质生产规模的大约一半，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有效劳动时间因而可以立即减少一半，使得所有劳动者可以真正地享受与人的正常生理和心理需要相适应的休息权。仍然保留下来的物质生产将足以给所有劳动者提供充足的有营养的食品、有尊严的住房条件、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并在劳动者丧失劳动条件时提供必要的抚养。

长远来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可以逐步地缩短所有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比如，如果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1%，过70年以后，社会平均的工作日或工作周就可以缩短一半；如果工作日或工作周不变，也可以采取每年增加两个节假日的办法，70年过后，大约半年的时间都可以成为所有劳动者的休假日。这样，最终就可以实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理想：“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从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向网友介绍“红色经济观察”和“红色能源观察” (2021年7月11日)

远航一号

红色中国网正在发布本年度的“红色经济观察”和“红色能源观察”。有些网友可能对我们这两个系列报告不太了解，对各期红色观察相互之间的联系也不太清楚。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红色中国网是中国马列主义左派数量众多并且不断增长的网站或社交媒体之一。在现阶段，一个左派网站的任务是什么呢？一方面的任务，当然是揭露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群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揭露资产阶级统治的黑暗，宣传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总结经验教训。

但是，我们知道，仅仅控诉资本家及其国家机器，是打不倒资产阶级统治的；至于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虽然打击了个别资本家，鼓舞了普通群众的斗争精神，但是在现阶段还不能根本改变广大群众被压迫、被剥削的局面。

所以，作为有决心、有抱负、有远大理想的马列主义小组，还必须做另外一项工作，那就是努力分析和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发现社会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条件，发现无产阶级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条件，发现资产阶级由盛而衰并最终走向灭亡的条件；通过分析和认识这些条件，为未来的伟大斗争做准备。

那么，怎样来做这项工作呢？我们知道，人都有生老病死。医生给病人看病，要检查病人身体的各项指标，比如心跳、血压、肺活量、血液中各种成分等，据此来了解这个人身体的一般状况，分析出哪些器官得了病，分别处于疾病发展的什么阶段，然后得出结论——得了什么病、怎样对症下药，还是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某个发展阶段或者像中国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特定时代、特定国家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都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生老病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就要像医生解剖病人那样，用科学的指标和分析方法来解剖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某个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的“红色经济观察”和“红色能源观察”就是进行这种分析的一种尝试。

怎样来了解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呢？作为这种分析的第一步，当然首先要了解各个阶级在整个社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关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我们以往已经做过一些研究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2560>)。今年，由于相关的统计数据还不完备，所以相应的分析报告还要再过几个月才能出来。

在一个阶级社会中，被剥削者、被压迫者总是占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剥削阶级只能是少数。所以，单纯进行各阶级人数的比较还不能有效地分析和认识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要运转，资本家阶级就必须反复不断地剥削广大劳动群众、攫取大量剩余价值，然后才能从事资本积累、维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用于资产阶级的穷奢极欲和挥霍浪费。作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尤其高度依赖对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分配来了解这种剥削程度。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剥削程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初期，资产阶级力量上升、无产阶级力量下降，因而资产阶级对劳动群众的剥削程度平均来说是趋于上升的，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总的来说也是对资产阶级越来越有利、对无产阶级越来越不利。但是，自2010年以来，这种情况就起了变化。在2010-2015年期间，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出现了明显上升的迹象。此后，尽管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反扑，但是并不能恢复资本主义复辟初期的局面，而是进入了两大阶级反复拉锯的新阶段。这是我们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而得到的一个重要认识（<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8487>）。

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积累来说，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剥削程度，只是影响资本家利润率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的资本生产率（或者说每一元资本家投资能够带来多少产值）。我们通过多年来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观察，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判断，即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其作为半外围国家的结构性矛盾，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出现了资本生产率趋于下降的长期趋势；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可能最终给中国资本主义带来致命的危机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8711>）。

我们观察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除了通过医学手段测量其身体各项指标以外，还要了解影响这个人生老病死的外部生存环境。任何人只要活着，就必须解决吃喝拉撒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要“活着”，也必须努力解决一系列“吃喝拉撒”的问题。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要运转，除了剥削广大劳动者以外，还必须从自然环境中攫取各种物质资源，并消耗大量的能量，才能将这些物质资源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各种“使用价值”。所以能源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最主要的物质基础之一。主要的世界经济大国同时也是主要的能源消费大国。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也是第一大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进口国。

但是，世界能源供应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化石燃料等不可再生资源。其中，世界石油生产有可能已经越过峰值，并将在未来趋于下降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8881>）。当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在都在努力发展各种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但是，风能和太阳能都主要用于发电，而无法直接替代主要来自石油的液体燃料。在石油的各种用途中，目前也只有公路运输中的旅客运输部分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地由电动汽车替代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8877>），并且这种替代还要受到锂、钴等矿物资源的限制。

除了“吃喝”，还要“拉撒”，也就是排放各种污染物，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全球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于崩溃。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过去普遍比较轻视环境问题，这是一大缺点。我们关系环境问题，绝不是像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那样追求所谓“绿色”生活方式或者可怜北极熊无处藏身，而是因为环境问题关系到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中国左派以往轻视环境问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习惯于高速经济增长的资产阶级，与其他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相比，更加崇拜技术的力量，也更加沉迷于庸俗的物质享受，在中国广大劳动群众中也形成了某种对技术和物质消费的迷信，一些左派群众也难免受到这种迷信的影响。

我们认为，中国的和外国的资本主义都解决不了环境可持续性的问题。资本主义积累对环境可持续性的破坏，不仅仅是造成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不便，甚至不仅仅是造成空气污染和各种癌症村，而是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人类文明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在以后的“红色能源观察”中，我们还会进一步论述，在环境可持续性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全球气候稳定所规定的碳排放预算）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稳定所需要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尖锐不可调和的矛盾。资产阶级目前正在大力宣传的所谓“碳中和”，不过是一些自欺欺人的鬼话。只要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人类文明毁灭的危险就在与日俱增，从而“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的历史抉择也就更加临近、更加迫切！

## 给 XHS 先生的复信 —— 关于 HP 先生可能被驱逐出境的问题

(2021 年 7 月 23 日)

远航一号

XHS 先生:

你好! 你托朋友转信给我, 内容如下:

远航的文章点 HP 的名了哈。指明话实就是 HP。HP 从来没有说明过这一点呀。他的笔名什么时候公开过? 这是逼着党妈妈将 HP 驱逐出境吗? 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 我从来没有看见 HP 在哪篇文章中点过远航的真实名字。远航躲在美国, 这样随意点名, 太过分了。没有远航的联系方式, 如果能转达就好了。

据我们了解, 在近日署名远航一号的文章中均未提及话实或 HP; 最近一个时期红色中国网的其他文章也未涉及话实或 HP。

你所谓“逼着党妈妈将 HP 驱逐出境”,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据我所知, 多年来, 无论你本人还是话实先生或者 HP 先生, 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境, 而且连一次茶也没喝过。

在我看来, 你们是很安全的, 你们的主张、所作所为对于现体制也是很安全的, 大可不必庸人自扰。

关于你所说的“HP 从来没有点过 ... 真实名字”的问题, 下面的跟帖附上了话实先生 2017 年文章的注释部分, 其中提到了一些人名, 可以供你参考。

<https://jiliuwang.net/archives/65455>

注释:

[1] 也就是说, 虽然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维持劳动力生存所必须消耗的价值, 即其工资, 但是资本家通过工资所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 而不是工人所能够创造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工资代表的是劳动力的价值, 而不是劳动力所能够创造的价值, 就像耕牛的价值是由饲养耕牛的成本决定的, 而不是由耕牛所能做的工决定的一样, 因而雇佣劳动不需要违背等价交换的原则。

[2] 参照李民琪、张耀祖、许准、齐昊著: 《资本的终结——21 世纪大众的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列表 6-2

[3] 也就是说，活劳动是有机的，资本是物化了的无机劳动，价值是由活劳动创造的，因而越是资本密集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占总投资的比例就越小，因而利润率就越小。

[4] 李民骐：《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冥王星出版社（Pluto Press），2015年，第一章

[5] 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156个援助项目，在专家撤走之前，才是没有保留的技术转让。它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少走了十年、二十年的积累过程。今天世界500强的所在国，没有一个会像当年苏联援助中国，或毛泽东时代援助亚非拉国家那样无保留地通过技术转让来援助发展中国家。

[6] 远航一号：《将马列毛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二十一世纪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红色中国周刊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6日）

[7] 程广胜：《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红色中国周刊2015年第33期（2015年9月2日）

[8] 这是金融资本大显身手的地方。那些把更多的控制权转让给金融资本的资本集团会有更快的资本扩张，直到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的太上皇。

[9]<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717>

[10][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11579101016xuv.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11579101016xuv.html)

[11] 远航一号：《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红色中国周刊2015年第8期（2015年2月24日）

[12] 李民骐：《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第七章

[13] 远航一号：《经济危机与社会变革（三）》，红色中国周刊2015年第32期（2015年8月20日）

[14] 马克思主义100讲：《【第4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红色中国网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 ... ;aid=488&page=3](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aid=488&page=3)

[15] 萨米尔·阿明:《当代帝国主义》,《每月评论》2015年7月

<http://www.cwzg.cn/theory/201509/24539.html>

[16] 陈其人:《世界体系论的否定与肯定》,时事出版社,2004

[17]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18]<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4225>

[19] 刘涛在《中國崛起策》第40节中列举了很多使得“中心、外围”论很尴尬的现象。

<http://read.jd.com/5057/263915.html>

[20] 李民琪:《“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阶级斗争》红色中国周刊第44期(2014年11月24日)

[21] 远航一号:《21世纪与共产主义》,红色中国网,2014-3-13,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17299>

[22] 马克思主义100讲:《【第5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红色中国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593>

[23] 李民琪、张耀祖、许准、齐昊著:《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的经济学》第18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24]<http://www.globalresearch.ca/the-worldwide-network-of-us-military-bases/5564>

[25][http://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6/11/01/chasing-chinas-outbound-direct-investment.html?utm\\_source=iContact&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Asia%20Briefing&utm\\_content=AB\\_Flyer\\_Nov22016\\_USWest](http://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6/11/01/chasing-chinas-outbound-direct-investment.html?utm_source=iContact&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Asia%20Briefing&utm_content=AB_Flyer_Nov22016_USWest)

[26] 该数据来自下一个注脚,而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成为非洲 FDI 最大来源国”的报道包括了比如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非埃及的 200 亿美元房地产投资意愿(占全非洲 FDI 意愿的 22%),并非实际投资额。

<http://forms.fdiintelligence.com/africainvestmentreport/?ref=TIA>

[27] IMF A Rebalancing Act for China and Africa: The Effects of China's Rebalancing on Sub-Saharan Africa's Trade and Growth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Departmental-Papers-Policy->

[Papers/Issues/2017/04/07/A-Rebalancing-Act-for-China-and-Africa-The-Effects-of-Chinas-Rebalancing-on-Sub-Saharan-44711](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Departmental-Papers-Policy-Papers/Issues/2017/04/07/A-Rebalancing-Act-for-China-and-Africa-The-Effects-of-Chinas-Rebalancing-on-Sub-Saharan-44711)

[28]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15/09/03/chinas-direct-investment-in-africa-reality-versus-myth/amp/](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15/09/03/chinas-direct-investment-in-africa-reality-versus-myth/)

[29] 严海蓉, 沙伯力合著《中国在非洲: 话语与现实》, 第一部分: 《中国、非洲、西方及殖民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5月1日, 摘要见:

[http://www.ydylcn.com/skwx\\_ydyl/ ... 07&contentType=literature&type=%25E6%258A%25A5%25E5%2591%258A](http://www.ydylcn.com/skwx_ydyl/...07&contentType=literature&type=%25E6%258A%25A5%25E5%2591%258A)

[30] 卢荻: 《希腊左翼能和中国站一条道吗?》观察者网

[http://www.guancha.cn/ludi/2015\\_02\\_04\\_308493.shtml](http://www.guancha.cn/ludi/2015_02_04_308493.shtml)

该文章系于 2017 年在国内公开发表, 且在经历了两年前众所周知的对左派大清洗后安然无恙, 可见十分安全。原作者既然不介意某网将这篇文章在国内公开发表并且一直保留到现在 (已经保留了差不多四年), 想必也不应该介意四年之后有人在一篇英文学术文章中将他的姓名与上述这篇文章相联系。

我们看不出, 这篇文章会给文章的原作者带来什么样的危险或不安? 如果确实会有这样的危险和不安, 原作者也不应该找“躲在美国”的远航一号兴师问罪, 而是应该首先联系首发这篇文章的网站将该文删除。难道不是这样吗?

反之, 如果这篇文章果然是对现体制大大不利而不是有利的, 仅仅用一个笔名就可以蒙混专政机关让他们找不到真正的作者吗? 话实先生或 HP 先生数量庞大文章的文风很难识别吗? 话实先生或 HP 先生难道没有在很多集体的场合公开发表过与上述文章相类似甚至完全重复的言论吗? 专政机关如果果然有兴趣向某网了解话实到底是谁, 某网会不如实相告吗?

XHS 先生, 你是政治幼童吗? 还是把我们大家都当傻瓜?

所以，请不必故作惊诧！

没错，做人应该有底线。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做起，先守住自己应该守住的那些底线。

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与阶级斗争，1980-2020 年

(2021 年 8 月 28 日)

远航一号

近日，中国资产阶级上层重弹所谓“共同富裕”的老调。怎样看待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这一策略变化？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这样一种“改良”姿态，将怎样影响中国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以及将来中国革命的前景，是有利于缓和中国社会矛盾还是会不以资产阶级自身意志为转移地加剧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收入分配的现状以及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变化。

那么，怎样才能够对国民收入分配的状况得出一个相对准确、全面的认识呢？有人认为，只要观察自己个人以及周边亲友的经历就可以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中国是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国，方圆 900 多万平方公里，各个地方、每个地方各个社会群体的情况千差万别。仅仅从个人和亲友的情况出发，或者仅仅依靠通过局部社会调查得来的印象，很难正确反映全局的、一般的状况。除了这种局部与整体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别以外，个人对于经济状况的认识往往还受到阶级地位、思想感情、政治见解的影响，从而产生更多的偏差。比如，无论在左派还是右派的反体制积极分子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认为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言外之意，就是一般工人实际工资的购买力是趋于下降的。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不需要接受资产阶级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日子过得好多了”一类欺骗宣传。毫无疑问，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亿万劳动者残酷剥削的基础上；这种残酷剥削，体现在血汗工厂、996、过劳死等各式各样的非人压迫上。但是，尽管有这些非人压迫，中国一般劳动者的物质消费水平与资本主义复辟之初相比，有了很大的增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要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情况，包括了解国民收入分配的情况，就必须善于运用资产阶级统计数据。无论什么社会制度，要了解一个社会一般的、全面的情况，必须通过了解和分析统计数据。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



有大量水分，乃至公然造假，因而没有利用价值。不客气地讲，这种对资产阶级官方统计数据一概简单否定的态度，是一种十分简单化的、无知的做法，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作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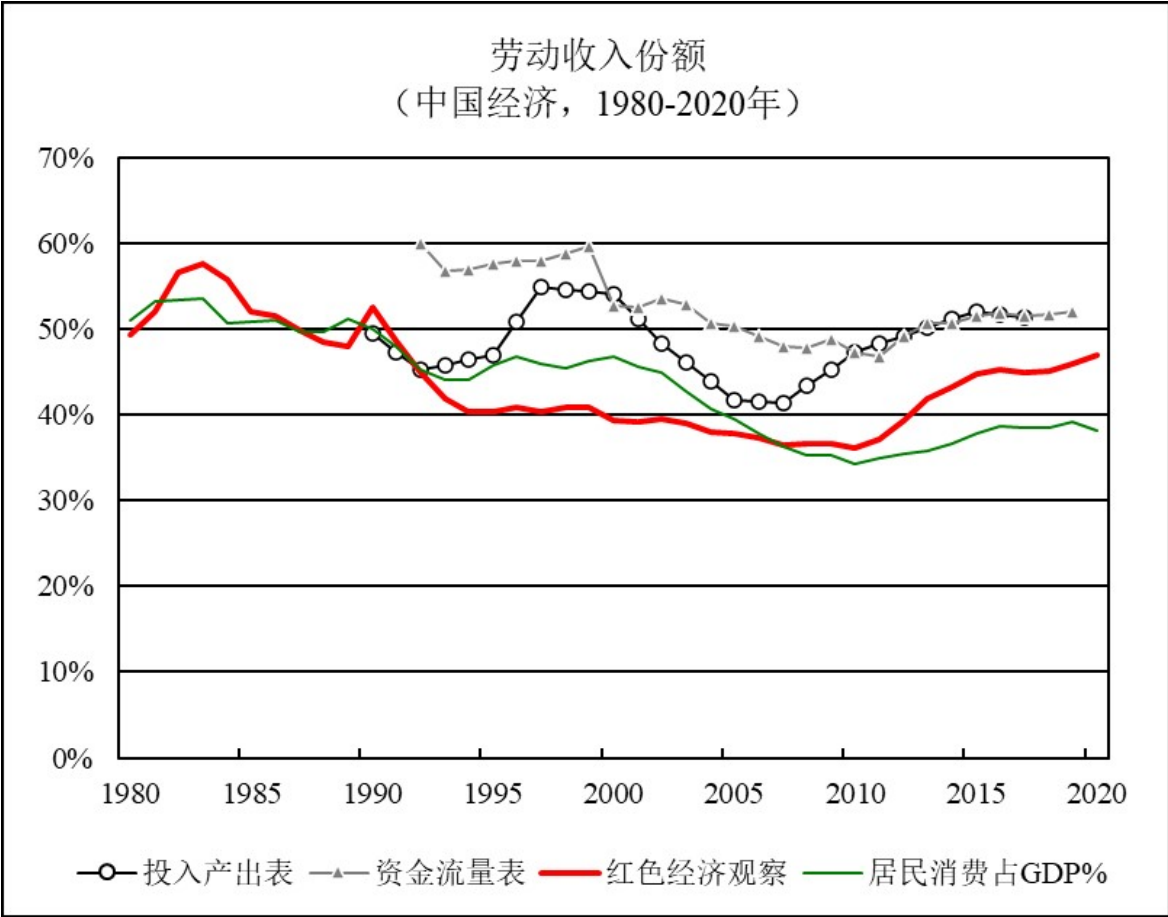
当然，资产阶级国家为了欺骗人民群众、粉饰太平，是完全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些数据做一些篡改，从而部分地掩盖真相的。但是，资产阶级实行统计调查制度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欺骗人民群众，更主要地，是为了获得有关社会和经济的相对准确的数量信息，并以此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制定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依据。如果听任统计数据全面地、大范围地失真，这最终会导致资产阶级国家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即使资产阶级的统计部门确实有可能对一部分数据进行篡改，但大量的、占主要部分的统计数据往往还是相对准确或者有参考价值的。即使对于资产阶级统计部门已经加以篡改的数据，通过与资产阶级统计部门发布的一些相对准确的数据相互比对，也可以对之做出修正从而得到比较接近真实状况的数据。

从一般经济与社会研究者的经验来说，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在世界范围来说是比较好的，虽然不能与美国这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顶尖核心国家相比，但是好于绝大多数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统计数据质量，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分析所需要的数量信息的基础。

就国民收入在社会各阶级间的分配来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主要是来自资金流量表和投入产出表。这两套数据相互之间采用的方法、数据并非完全一致，每一套数据系列内部在不同时间段上所采用的方法、数据也不完全一致，从而给研究者带来很大困惑。

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包括了一些在国际上知名的政治经济学专家。经过 2014 年以来的反复推敲和研究，我们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成熟的估算中国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方法。

下面第一个图比较了自 1980 年以来分别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国家统计局的投入产出表以及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计算得出的中国经济劳动收入份额历年变化的情况。此外，第一个图还包括了自 1980 年以来中国经济中的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在历年变化的情况，作为参考。



在上图中，“劳动收入份额”指的是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工资和薪金、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以及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和提供的其它福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其中，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包括了1992年至2019年期间的连续数据；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包括了1990年至2017年期间的各个基准年数据，每两个基准年之间相隔两年或三年，缺失的年份用线性内推法粗估；按照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则包括1980年至2020年期间的连续数据。

首先来看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2-1999年期间，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始终保持在接近60%的较高水平。从2000年起，国家统计局修改了资金流量表中关于“劳动者报酬”的定义，主要是将一部分所谓“混合收入”（即小业主和小资本家的收入）重新定义为“营业盈余”的一部分。2000年，按照资金流量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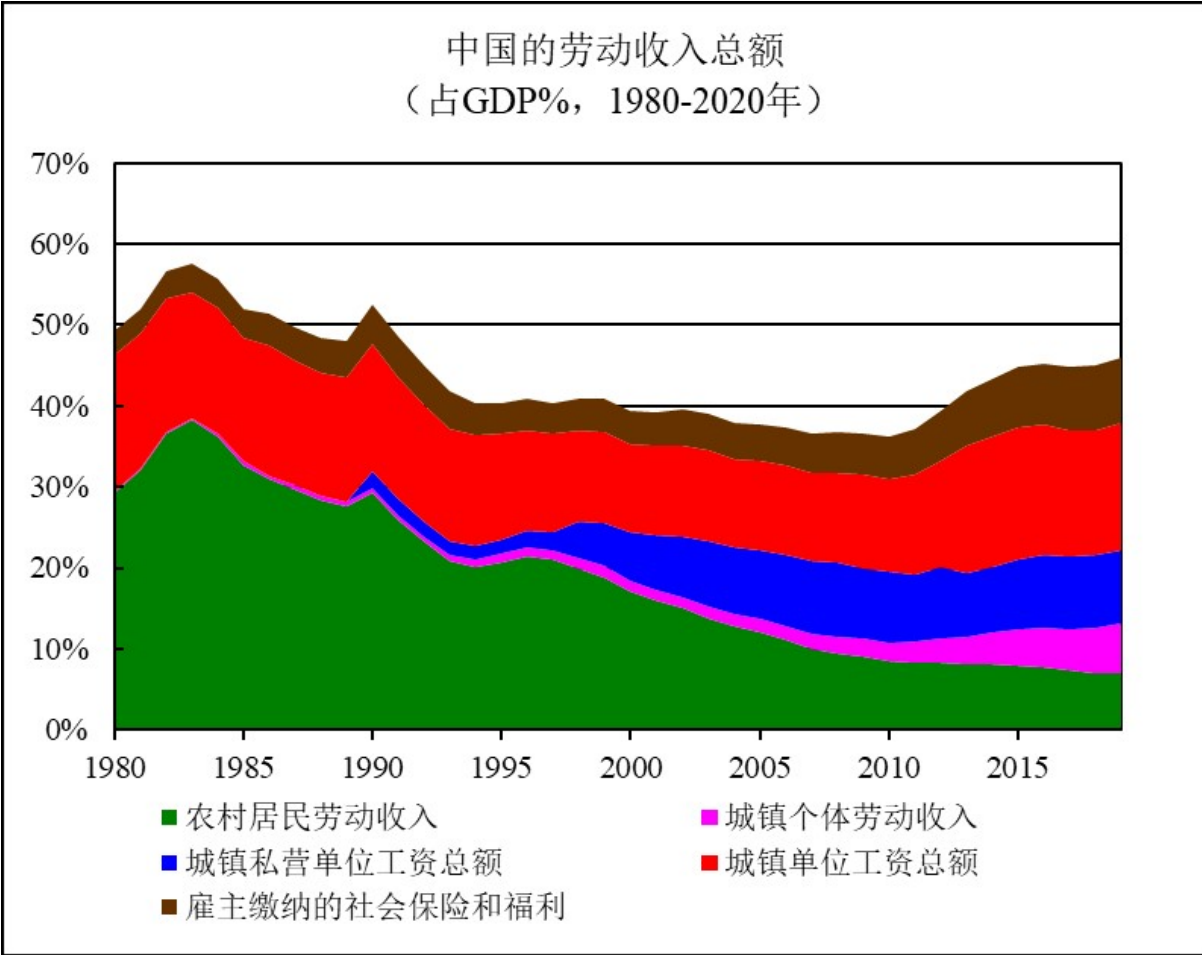
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是 53%；此后，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至 2010 年，下降到 47%。2015 年，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回升到约 52%；此后几年，一直保持在大约 52%的水平。

相比之下，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波动较大。1990 年，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是 49%，至 1997 年竟然上升到 55%，至 2005 年又下降到 42%，至 2010 年又上升到 47%。这几次大的波动更多的是反映国家统计局统计方法和数据来源的变化，而不是真实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变化。2010 年以后，投入产出表的统计方法和数据定义调整为与资金流量表相一致，从而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也与资金流量表基本一致。2015 年，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到 52%，至 2017 年略微下降到 51%。

从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两套官方数据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中国官方统计，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至 2010 年总的来说趋于下降。其中，在 2000-2010 年期间，按照资金流量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 6 个百分点；按照投入产出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 7 个百分点。2010 年以后，资金流量表与投入产出表基本一致，按照两个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都表明，在 2010-2015 年期间，劳动收入份额显著回升约 5 个百分点；2015 年以后，按照两个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都保持相对平稳。

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中国国家统计局不同，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南。我们以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工资、居民收入、社会保险等数据为基础，计算出从 1980 年至 2020 年的连续劳动收入份额序列。仅从统计分析上来说，与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相比，红色经济观察的劳动收入份额序列时间跨度更长并且连续不断，可以反映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状况及其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反映。在上述历史时期的范围内，我们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概念和数据来源可以做到基本一致，因而可以对不同时期的变化趋势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和比较。

下面第二个图介绍了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各个组成部分在 1980-2020 年期间变化的情况。



我们所计算的劳动收入总额包括了五个组成部分：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和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其它福利。

**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农村居民劳动收入总额用乡村总人口乘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劳动收入来计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劳动收入包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经营净收入；其中，前者属于常住农村、只在城市从事季节性打工的农民工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的收入，后者则大致相当于个体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获得的收入。关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9年，中国乡村总人口约5.5亿（其中乡村就业人员总数约3.3亿、农业就业人员总数约1.9亿）。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在中国官方统计中，所谓“城镇单位”（又名“城镇非私营单位”）主要包括“国有单位”（主要是党政机关以及教育、医疗等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其中一部分是“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以 2019 年为例，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约 1.72 亿；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约 5500 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就业人员合计约 8500 万（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员约 3000 万）、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就业人员合计约 2400 万，此外还有一些诸如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等就业人员较少的企业类别。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城镇非私营单位”包括了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以及已经私有化、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等显然属于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并不包括官方定义的所谓“城镇私营单位”。

总的来说，“城镇单位”属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正式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要明显好于其它就业类型，税收、劳动法等资产阶级法律在“城镇单位”中执行得较为“规范”。在各类工资和收入数据中，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总额数据也最完整、最可靠。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用城镇私营单位和城镇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之和乘以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得出。在官方统计中，所谓“城镇私营单位”指的是“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企业，大致相当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家族式资本主义企业。此外，所谓“乡镇企业”也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官方统计不直接提供城镇范围内乡镇企业就业人员的数据，但这一数据可以用全部城镇就业人员减去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城镇个体就业人员以后的余额来推算。2019 年，城镇私营单位和城镇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之和约为 1.65 亿（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约为 1.46 亿）。

2009 年以前，国家统计局不提供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对于 2009 年以前的年份，我们用就业状况与私营企业相近的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代替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本来，在官方统计中，“个体就业人员”指的是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成员劳动为生的小商品生产者。不过，近年来，大量的所谓“新就业形态”就业者，如快递员、外卖员、滴滴司机在官方统计中被认为是与互联网平台发生“独立承包”关系的就业人员并被归为“个体就业人员”。因此，在官方统计中，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人数近年来恶性膨胀，从2010年的约4500万暴涨到2017年的约1.17亿，增加了约7200万，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总数约四分之三。

所谓“城镇个体就业人员”中，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有小业主，有外卖员、快递员等雇佣劳动者，也有个别的小资本家。目前，关于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收入没有可靠的官方统计。原来主要以小业主为对象的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的概念已经不能反映所谓“新就业形态”急剧膨胀以后许多“个体就业人员”的收入情况。我们暂且假设，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平均的劳动收入（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等“平台经济”劳动者的工资以及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等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从而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总额等于城镇个体就业人员乘以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从劳动力市场的规律来说，如果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低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那么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就会放弃现有的“平台经济”工作或者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小微企业，转而谋求在一般私营企业中出卖劳动力；这样，两个部门中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就会逐步趋同。所以，假设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等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近年来官方统计的“个体就业人员”恶性膨胀，但是其中并不包括“劳务派遣工”。在官方统计中，劳务派遣工被视为实际用人单位的雇佣人员，其工资也算入实际用人单位的工资总额。

**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其它福利：**除了上述城乡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各项外，劳动收入总额还应该包括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以及企事业单位向职工支付的各项福利。

在1998年及以前，国家统计局提供完整的城镇单位保险福利开支总额。对于1998年及以前的年份，我们就用城镇单位保险福利开支总额来代表那个时期的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其它福利。

对于 1998 年以后的年份，国家统计局不再提供企事业单位保险福利开支的数据。不过，国家统计局提供历年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来源有企事业单位和职工、城乡居民和财政补贴。各地对各项保险中单位和个人的缴纳比例所做的规定不尽一致。但大致上，在企事业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中，单位缴纳的比例约为 70%、个人缴纳的比例约为 30%。考虑到总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城乡居民和财政补贴，对于 1998 年以后的年份，我们假设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等于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的 50%。

此外，根据一些历史数据，我们假设城镇单位职工的福利总额相当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 25%。社会保险以外的福利费用可能包括由企事业单位提供的住房公积金、交通补贴、餐饮补贴、出差报销或补贴、劳保开支等。

我们假设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城镇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和城镇个体就业人员没有除雇主缴纳社会保险以外的福利。

从上面两个图可以看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夺取了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根基还不稳，为了欺骗群众，采取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给城市工人发奖金等收买人心的政策。1983 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中国经济劳动收入份额一度上涨到约 58%。但是，好景不长，在八十年代的后半段，一方面官僚资产阶级推行所谓“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向工人阶级进攻并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做准备，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吞噬了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在官方统计中，1988 年和 1989 年是“改开时期”城镇单位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发生下降的仅有的两年）。至 1989 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 48%。

1990 年，惊魂未定的官僚资产阶级一度为了稳定政局对城市工人阶级做出了短暂的让步。此外，此前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的大约 2400 万乡镇企业职工被纳入官方统计。在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恢复到了 53%。

此后，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时代，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几千万城市工人下岗；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后，所谓“三农问题”全面恶化。至 2000 年，红色经济观察

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 39%，与 1990 年相比减少了 14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按照官方的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 1992-1999 年期间没有变化，按照官方的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 1990-2000 年期间反而增加了 5 个百分点，完全不能反映这个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全面进攻、工人全面溃败的阶级斗争动态。

2000-2010 年期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又下降了 3 个百分点。这个变化趋势与官方的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所显示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是红色经济观察所计算劳动收入份额在这个时期的下降幅度大约是同一时期官方统计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幅度的一半。

2010 年至 2015 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从 36% 增加到 45%，增加了 9 个百分点。官方的资金流量表和投入产出表也显示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上升，但是上升幅度是 5 个百分点，大约是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幅度的一半。

2015 年以后，官方的资金流量表、官方的投入产出表、红色经济观察都显示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官方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保持在 6-7 个百分点。

以上分析表明，自 2000 年以来，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变化趋势上大体一致，但变化的幅度在每个时期各有不同，而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始终小于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两者之间的差距在 2000 年曾经高达 14-15 个百分点，到了 2017 年仍有 6-7 个百分点的差距。

那么，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相比较，哪一组劳动收入份额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呢？在上面第一个图中，除了三组劳动收入份额以外，还显示了自 1980 年以来中国经济中的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历年变化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三组劳动收入份额中，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比例最为接近，变化趋势也大体一致。

据国家统计局的城乡居民住户调查，2017 年，中国居民平均约将可支配收入的 70% 用于消费。2017 年，按照红色经济观察的计算，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约为 45%，如果



其中的 70%转化为消费，那么，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这一年的消费总额大约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1.5%。2017 年，中国经济中全部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8.5%。这就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或相当于劳动群众消费总额的 22%。如果假设资本家阶级占全国总人口的 5%，以上结果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人均消费大约相当于劳动群众人均消费的 4 倍。

如果我们采用官方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那么，2017 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为 51.5%，如果其中的 70%转化为消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这一年的消费总额大约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6%。这样，留给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总额仅有国内生产总值的 2.5%；这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人均消费仅比劳动群众的人均消费高出约 30%。这样的结果显然是荒谬的！

通过与居民消费数据做比较，可以看出，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显然比官方的劳动收入份额更加合理。

为什么官方统计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会显著高于红色经济观察的劳动收入份额呢？通过对官方的投入产出表做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差距可以通过对农业部门劳动收入计算方法的差别得到解释。在官方的投入产出表中，实际上将农业部门的全部产值（增加值）都视为“劳动者报酬”，因而使得 2017 年农业部门的“劳动者报酬”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8%。相比之下，按照红色经济观察的计算，2017 年，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的总额（大致相当于个体农民从农业生产和经营中获得的劳动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5%，与官方统计中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的差距为 4.5%；这可以解释 2017 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总差距的大约 70%。

无论是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还是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都表明，在 2010-2015 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明显上升，此后又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劳动收入份额的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哪些变化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仅仅是一种“假象”，是因为物价水平上涨了，资本家为了弥补工人生活成本的提高，不得不给工人增加工资。这是一种漏洞百出的错误观点。且不说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资本家会不会自动就根据生活成本的上涨给工

人涨工资，如果工人工资的增加纯粹是物价上涨引起的被动反应，那么，资本家一手给工人增加工资，另一手又用高物价把拿出去的钱再拿回来，那么，在整个的国民收入中，资本家的利润所占的份额怎么会下降？工人的工资所占的份额又怎么会上升呢？

实际上，从统计上来说，如果果然发生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情况，几乎一定意味着实际工资不仅在上涨（也就是说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物价的增长速度），而且上涨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

在历史上，中国经济曾经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和九十年代前半期发生过两位数的高通货膨胀，两次高通货膨胀时期都伴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而不是上升。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长期的、持续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一定是反映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世纪中，官僚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倒算。到本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中国全面确立，中国进入了“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在经历了本世纪初前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队伍显著扩大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萎缩的趋势。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剥削以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初步的发展。2007年以后，沿海制造业工人的斗争开始逐步高涨。此外，以国企“老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马列毛主义社会运动迎来了第一次高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开始出现了工人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

习近平当局上台后，企图恢复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在所谓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对剩余的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2015年，习当局又提出全面的“供给侧改革”计划，企图向残余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人阶级发起全面进攻。此外，在2015年以后，习当局加紧了对自由派和左派的劳工组织的镇压。

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复辟之初。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萎缩，资本家面临着青壮劳动力和有技能的熟练劳动力短缺的困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开始逐步学习与资本家斗争的办法，并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和社会要求。资产阶级的反扑与对工人阶级客观上有利的

长期结构性趋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在 2015-2018 年期间，中国阶级斗争形势出现了暂时的僵局，形成了劳动收入份额相对平稳的局面。

但是，据红色经济观察的计算，2019 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开始恢复上升，增加到 46%；2020 年，进一步上升到 47%。

虽然在 2018 年以后，一批左派青年小组遭到镇压，但是，大批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青年在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下逐步觉醒并开始接受马列毛主义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尽管中国处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政治压迫之下，中国的劳动群众还是以各种灵活多变的方式开展自己的反抗。在青年中愈发流行的“躺平”要求正在从根本上威胁依靠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中国资本主义剥削体制。广大劳动群众根据自身直接的生存利益所做出的拒绝生育、推迟生育的决定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断绝中国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青壮劳动力供应。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再上一个台阶。

面对阶级斗争形势的新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不得不抬出“共同富裕”的欺骗口号。但是，基于中国资产阶级贪婪狭隘的本性，也是受制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作为半外围国家无法在世界市场上攫取大量垄断利润），在“共同富裕”的口号后面，永远是口惠而实不至，拿不出真正的真金白银来缓和阶级矛盾。

尽管如此，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这一策略变化仍然有着一定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上层在 2013 年就开始策划、在 2015 年全面发动的对工人阶级的新一轮反扑已经彻底失败了，因而现在不得不至少在口头上承认工人阶级要求的某种合理性，在口头上承认——如果再不满足工人阶级的这些要求，中国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无法维持了，资产阶级国家就要“国将不国”了。

然而，资产阶级现在既然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那么，假以时日，他就无法阻止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其他的广大劳动群众来要求真正的“共同富裕”。这种真正的“共同富裕”不是资产阶级所许诺的庸俗富裕（无论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而是消灭 996、消灭血汗工厂、消灭工人不能热饭不能上厕所的奴隶制度，是每一个劳动者都有人的尊严的“共同富裕”，是杀富济贫的“共同富裕”，是每一个普通的年轻人都可以摆脱金钱和宗族束缚自由追求爱情的“共同富裕”。中国的资产阶级当然无法提供这样

的“共同富裕”；而当中国的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意识到，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拿出他们自己许诺要拿出的“共同富裕”，而 996、蜗居、过劳死、爱情的绝迹又为绝大多数劳动者无法再忍受的时候，旧世界爆炸和毁灭的时候就要来临了。

只有在旧世界的废墟上，联合起来的自由的人们，才能开始建设一个更好更美的新世界。

中国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工业体系的国家吗？

（2021年9月1日，原载“聚焦与余光”）

吴昊阳、李平

本文的核心观点：全工业体系的真实性值得商榷。这一说法从横向产业类别粗分来看似乎可能，但从横向产业类别细分，尤其是纵向价值链层级来看完全不成立。中国亟需高端隐形（精一）冠军，以此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在工业和经济领域流行着一个鼓舞人心的说法：“中国以拥有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这个论断被很多文章所引用，作为支持“我国已经成为制造强国”的论据。有些学者甚至以此为根据，指出我国有能力单靠内循环打赢科技战，实现我国工业的全面振兴。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01

该说法的源头

实际上，这个说法已经在网络上传播长达 6 年之久。这句话按时间线在各类论坛不断变形如下：

1. 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成为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

2. 只有中国和美国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

3. 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

4. 中国以拥有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5. 中国以拥有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美国以拥有 94% 的工业门类排在第二。全世界只有中国具备大而全的完整工业体系。

论述 1 是起源最早的，因此可信性也最大。仅从这个论述里得到的结论是：中国是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但未必是唯一的。至于我国是否真正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02

产业足够完整？

由于这个论述的源头关于联合国产业分类，于是在网上找到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 2009 年出版的《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修订本第 4 版）。

下图为《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中第二部分第一章总体结构中将单个类别归并，成为以下 21 个门类：

门类	类	说明
A	01-03	农业、林业及渔业
B	05-09	采矿和采石
C	10-33	制造业
D	35	电、煤气、蒸气和空调的供应
E	36-39	供水；污水处理、废物管理和补救活动
F	41-43	建筑业
G	45-47	批发和零售业；汽车和摩托车的修理
H	49-53	运输和储存
I	55-56	食宿服务活动
J	58-63	信息和通信
K	64-66	金融和保险活动
L	68	房地产活动
M	69-75	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
N	77-82	行政和辅助活动
O	84	公共管理和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
P	85	教育
Q	86-88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活动
R	90-93	艺术、娱乐和文娱活动
S	94-96	其他服务活动
T	97-98	家庭作为雇主的活动；家庭自用、未加区分的物品生产和服务活动
U	99	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活动

从 A 到 U 这 21 个门类下面又划了 99 个类，其中 C 类制造业下面又进一步划分为 33 个大类。大类下面又分为 70 个大组，大组下面再划分为约 140 个组。与网络上流传的“中国已拥有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等说法接近，但存在差距。

为此，笔者找到了中国政府参照联合国分类标准制定的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国家标准“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国标对行业分类划分得更加精细：其中最大的门类从 A 到 T，其中门类 C 为制造业，拥

有从第 13 到第 43 项共 31 个大类，179 个中类，613 个小类。与网络流传的说法也大致相当。

那么当我国拥有了联合国或国标列出的所有工业大类和小类，是否就可以说明我们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呢？

首先，这个分类的颗粒度过大

下图是我国的工业产业分类国标的示例，与联合国的分类标准大同小异，都是精确到 4 个级别。

我国国家标准的国民经济分类同样把制造业放在门类 C 中。

下表中节选了中国国标分类表中的部分条目，例如大类 30 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其中类 307 为陶瓷制品制造，第四级小类分类 3071 到 3079 为陶瓷制品下属的子类。从小类 3071 到 3076 分为为：建筑陶瓷制品制造，卫生陶瓷制品制造；特种陶瓷制品制造；日用陶瓷制品制造；陈设艺术陶瓷制造。不容易归类的统一划到小类 3079 其他陶瓷制品。

可见分类原则是先分大类，不容易归类的都划归到第 9 项其他。也就是说，第四级的所有子类都不会超过 9 个。



代 码				类 别 名 称	说 明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C				<b>制造业</b>	本门类包括13~43大类，指经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后成为新的产品，不论是动力机械制造或手工制作，也不论产品是批发销售或零售，均视为制造；建筑物中的各种制成器、零部件的生产应视为制造，但在建筑预制器工地，把主要部件组装成桥梁、仓库设备、铁路与高架公路、升降机与电梯、管道设备、喷水设备、暖气设备、通风设备与空调设备、照明与安装电炊等组装活动，以及建筑物的装置，均列为建筑活动；本门类包括机电产品的再制造，指将废旧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等进行专业化修复的批量化生产过程，再制造的产品达到与原有新产品相同的质量和性能
	30			<b>非金属矿物制品业</b>	
		307		<b>陶瓷制品制造</b>	
			3071	建筑陶瓷制品制造	指用于建筑物的内、外墙及地面装饰或耐腐蚀的陶瓷材料（不论是否涂釉）的生产活动，以及水道、排水沟的陶瓷管道及配件的制造
			3072	卫生陶瓷制品制造	指卫生和清洁盥洗用的陶瓷用具的生产活动
			3073	特种陶瓷制品制造	指专为工业、农业、实验室等领域的各种特定用途和要求，采用特殊生产工艺制造陶瓷制品的生产活动
			3074	日用陶瓷制品制造	指以粘土、瓷石、长石、石英等为原料，经破碎、制泥、成型、烧炼等工艺制成，主要供日常生活用的各种瓷器、石器、陶器等陶瓷制品的制造
			3075	陈设艺术陶瓷制造	指以粘土、瓷土、瓷石、长石、石英等为原料，经制胎、施釉、装饰、烧制等工艺制成，主要供欣赏、装饰的陶瓷工艺美术品制造
			3076	园艺陶瓷制造	指专门为园林、公园、室外景观的摆设或具有一定功能的大型陶瓷制造
			3079	其他陶瓷制品制造	指以石英、长石、瓷土等为原料，经制胎、施釉、装饰、烧成等工艺制成时实用陶瓷的制造，以及其他未列明的陶瓷制品的制造

显然这些子类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更细的集合。

代 码				类 别 名 称	说 明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33			金属制品业	
		331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332		金属工具制造	
			3321	切削工具制造	指手工或机床用可互换的切削工具的制造
			3322	手工具制造	指在生产 and 日常生活中, 进行装配、安装、维修时使用的平工具的制造
			3323	农用及园林用金属工具制造	指主要用于农牧业生产的小农具, 园艺或林业作业用金属工具的制造
			3324	刀剪及类似日用金属工具制造	指日常生活用刀剪、刀具、指甲钳等类似金属工具的制造
			3329	其他金属工具制造	指上述类别未包括的用于各种用途的金属工具的制造

再比如二级分类（大类）中 33 是金属制品业，其下面的三级分类（种类）332 金属工具制造中，3321 切削工具制造就已经是该分类目录中第四级的最终分类了。然而，对于业内的从业者来说，这个分类实在是太粗糙了。

按照说明，3321 分类指的是“手工或机床用可互换的切削工具的制造”，也就是把诸如手工钻头和机床钻头等切削工具都归为一类了。

但事实上，这两类产品几乎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例如，手工钻头可以在普通的五金商店买到，而机床用的钻头生产商基本上都是 2B 的业务，价格也要远高于普通钻头。

更何况金属加工刀具不只钻头一种，仅机床用的基础刀具就包括车刀，铣刀，钻刀，磨轮，镗刀等不同的刀具；刀具的材料又有工具钢，硬质合金，立方氮化硼等等；如果要加工特别硬的金属就需要更硬的刀具，而我国军工航天制造中所需的高端刀具和刀具材料要靠大量进口。

现代加工中所使用的切割刀具也不只是用于切割的刀具本身，而是包括刀柄在内的一整套刀具系统。为了提高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国外很多厂商在刀柄内部嵌入各种传感器，或者干脆开发一套新的功能模

块。很多类似的工业产品在国内市场几乎是买不到的，因为当我们把这些工业产业进行更细化的划分后，我们会发现，很多工业技术和产品都是我们无法自给自足的。

应该说，在这个联合国定义的工业分类中，每一个最小的子类都不能算作一个市场，更无法定义一类具体的产品或技术，只能作为宏观经济的统计门类。因此，如果把这个产业分类不断细化，那么在颗粒度更高的精细化的分类中，中国制造并不能包括大部分门类，比如文中提到的不少高性能的刀具系统就不是全部能够国产的，里面同样存在大量的“卡脖子”因素（好在卡得不算紧）。

其次，工业系统完整性未必赶得上发达国家

把工业门类划分到 4 级，总共分出了 525 个小类。但如果把这个分类再继续精细划分，那么子集的个数将会呈指数级增长，那么最终的工业分类将会出现数十几万，几十万个迷你类。而只有划分到这样精度，评价一个国家的工业完整性才有可操作性。

如果按照同样的分类方法，将现有工业门类 Zoom in 到更高级别，假设到第 8 级子类，那么最终子类总数的最大值为  $525 \times 94 = 3,444,525$ 。因此我们需要评估我国现有的工业体系是否能够覆盖这 300 万个细分行业。建议有关部门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统计以便真正确定我国工业的完整程度。

因为无法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调查，但通过符合逻辑的评估，我们认为工业发达国家拥有的“迷你子类”的数目会多于中国。

1.中国同类产品的同质化竞争程度非常高，对细分市场的开发严重不足

如果按照大类划分，我国的制造业和工业体系也许涵盖了所有工业门类，但是当分级的细致程度从目前的四级增加到更高以后，相当于不断地对市场进行细分，而发达国家的工业品生产企业往往都是针对细分市场，因此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有大量的隐形冠军企业和技术特色明显的中小企业。

相比之下，我国的工业企业更多的是扎堆在一个红海市场，大家竞相降价，拼得你死我活。但细分市场规模往往比较小，且项目的技术风险相对较高，因此中国的工业企业很少主动涉足这类细分领域。例如在机床领域的水切割和激光切割是两类非常成熟的加工技术。如果按照国标的分类规则，估计可以划分到第 6 级或 7 级，而这两个产业门类我国都有，而且从业的企业数量众多，大型企业也很多。但是当我们把分类进一步细化到第 8, 9 级时，会发现我国的激光切割设备企业基本上都是集中在那么几个大众化的门类里，诸如大功率，特殊光源等的激光切割设备我们就欠缺了；

再比如欧洲有个利用水的射流把激光导入其中的技术，这样激光束的能量被约束在极细的水流里，于是可以切割较大厚度的超硬材料。当然，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也十分有限，主要是钻石，厚硅片和超硬合金的切割和打深孔。诸如此类的细分行业我国是十分欠缺的，而从事这类细分行业的公司大多是具有足以卡全世界的脖子的不可获取的隐形冠军，而它们的规模很多还不足百人。这类工业企业在我国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因为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而接触的项目也多是高技术风险的，银行不乐意贷款，更没法上市。这类具有潜质的中小企业在我国的

结局不是被不愿付款的大客户拖死，就是对赌协议玩砸了被投资人接手。

由于我们的营商环境对中小制造企业并不友好，所以必然导致小众市场无人问津，于是在一个相对微观的产业生态中，有大量的产业分类是中国制造不曾拥有的。

## 2. 中国的市场需求长期受到压抑，很多市场需求根本不存在

工业产品的订单说到底都是来自于最终的市场需求的：比如美国和以色列对军备的需求一向旺盛，因此军工相关的产业就得以培育，所以军工产业链也会相对完整。我国的高铁和基建项目需求旺盛，因此铁公基相关的产业链也相对完整。身处阿尔卑斯山区的奥地利人热爱滑雪，因此滑雪橇滑雪板等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链就比较完整。

但是我国的消费应该说是政府主导的，民间的消费水平并不高，并且特别缺乏创意。由于在消费端欠缺多样性，所以生产端的产业生态也就不会完整。例如，欧美国家大量使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相关标准完善，因此林木自动化采伐，木料加工，拼接板，交叉木等建筑原料制造业，以及相关的林业机械和木工自动化等产业链就非常完善。相比之下，我国的普通民宅几乎没有木结构的，所以消费市场几乎为 0，因此我国的这个产业几乎可以忽略不记。

类似的情况在很多领域都是存在的，特别是高附加值民用产品的制造业，比如各种赛车，改装车，帆船，运动滑翔机等。这类产业并没有转移到亚洲和拉美国家，而是由于其客观的利润保留在发达国家本土。这类产业在我国几乎也是找不到的，所以相应门类的工业完整程度也不会很高。

## 中国工业系统图景之一：枝繁但叶不茂

如果把整个工业系统比作一棵树，那么树的枝干相当于初级的分类，而细小的枝干和树叶相当于精细化的产业分类。那么一个健康的工业系统的枝杈不见得很多，但是每条枝杈上都枝繁叶茂，而且枝头长着嫩芽，时刻可能萌发出新的枝杈。

我国的工业系统这棵大树应该说枝杈很多，但是每根树枝上的叶子不够繁茂。而其中由于叶子过大，吸收的营养也就过多，反而阻碍的其他叶片和嫩芽的发育。

可见，中国具备全部工业门类完全就是个讨巧的说法，不说明任何问题，既并不能证明中国的工业系统就是完整的，也不能说明中国工业系统的完整性优于其他国家。

## 中国工业系统图景之二：缺乏高端部分

与此相关，分析工业门类不能仅仅从各个行业的横向视角来看，还需从单一行业的纵向视角来看，即行业内部的低端、中端、高端部分。

众所周知，中国工业特别强在以成本取胜的低端部分，而最近也在中端部分开始逐步具备较强的竞争能力与地位，但在高端部分依然很弱，在很多行业不得不依赖从发达国家的进口。最近发生的半导体芯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并不能说真正具备工业系统的完整性，更不能说比其他国家优越。换言之，中国工业系统从行业纵向视角来看，还

远远没有达到具备完整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追赶。这也符合中国制造大而不对的现状，正如工信部苗部长所指出那样。

## 03

### 唯一拥有全产业分类的国家？

再退一步，如果我们把拥有联合国定义的产业分类作为评价一个国家工业体系完整性的标准，那么我们也不见得是全球唯一的拥有“全产业分类”的经济体。

#### 1. 传统工业强国和新兴工业大国都完全有可能拥有全产业分类

由于该分类过于粗糙，只有 525 个小类，所以对于全球各大国来说，要获得按照这个分类标准的全产业门类也并不是特别难。

实际上，获得所有产业门类的最大难点在于大型工业配套产业，例如军工，高铁，航天，飞机制造，整车制造等。很多工业强国只是碰巧差了一点点而已。例如，美国也有极其完整的工业体系，可是唯独缺少高铁相关的部分产业；工业强国德国和日本由于是战败国，因此军工产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但是，这并不说明这些国家就没有技术实力和经济潜力去发展这些产业。比如德国和日本都有极强的军工潜力，他们相关的军工技术都是隐藏于民用和科学设备产品中，以色列和加拿大的企业只需要并购就可以获得整车制造这个工业门类。

法国倒是极有可能同样拥有完整产业分类，因为法国的航空，高铁，核电都极强，其他的传统产业诸如汽车，钢铁，船舶也都不弱，所以要拥有这个 500 多个产业门类的分类一点都不难。

2. 随着全球各经济体的发展，原本不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获得了全部的工业门类；

一向被国人看不起的印度反而有可能具备相对完整的产业门类（不是工业体系，先不管质量如何），因为印度也有很强的工业潜力，低端制造涵盖范围很广，高端制造也比较完备：它是有核国家，有汽车工业，军工产品虽然差，但是也能自己生产军机，舰船，潜艇等武器平台。

很多中国制造原本拥有的门类可能会因为利润太低转移到其他地区。比如，中国曾经是全球的火柴生产大国，但现在这个行业已经基本上完全转移到了印度。

3. 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兴工业产品可能会导致工业门类的变化

例如电动车生产应该属于整车制造子类，当电动车的门槛越来越低，就有越来越多的不同国家的公司会具备电动车的生产能力，如此一来，这些原本缺乏整车生产门类的国家就会获得一堆新的工业门类，都可以号称拥有了汽车工业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东欧北欧的一些国家，加拿大，以色列等国家虽然工业能力不弱，加拿大庞巴迪的飞机和高铁技术也是世界一流的，但他们都没有整车制造能力，但是汽车零部件产业很完整，那么电动车门槛降低后，这类国家就有可能与中国一样，获得完整的工业门类。



更何况换一种同样合理的分类方式，很多经济体也许就拥有了完整的工业分类。

## 04

### 小结

拥有联合国定义的全部 500 多个工业门类不说明任何问题。既不能说明这个国家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不能说明他的工业体系强于其他国家。只能说这个经济体从传统制造业到新兴制造业前后通吃。而这类国家通常是规模比较大，制造业从业人口较多，例如印度。

高端技术往往存在于细分市场，如果将工业门类划分得更细，那么就会出现我国的工业体系能覆盖不到的分类，而这也印证了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现状。

因此，对于我国拥有联合国定义的全部工业分类这个说法，可以自豪一下，但不应过度解读，更不应以此作为指导对外经贸政策的依据。

当然，这也说明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快，因此从传统行业到新兴行业分布较广，而这也是工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为英法德美俄日韩在经济起飞时都曾经发展出具备当时全部工业分类的产业生态。这部分我们在后续篇章会继续讨论。

总之，我们认为，全工业体系的真实性值得商榷。这一说法从横向产业类别粗分来看似乎可能，但从横向产业类别细分，尤其是纵向价值链层级来看完全不成立。中国亟需高端隐形（精一）冠军，以此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说说“中国经济，细思极恐”

（2021年11月5日）

远航一号

网上有篇文章，“中国经济，细思极恐”，原本是发在右派网站新品葱上的，红色网友可以在我们的红色社区论坛上看到：<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79>。作者似乎是一个金融投机家，基于其对金融投机的认识，又夹杂了一些粗糙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提出了他自己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危机的看法。虽然作者的立场反动，方法也不尽正确，但他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我们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看法、坚定我们对于未来革命事业的信心。

先把“中国经济，细思极恐”一文的基本观点梳理一下。如果去掉原作者各种故弄玄虚的投机术语，作者的经济分析方法大致是某种粗糙的重商主义，又掺杂了货币数量论（货币供应量决定总需求）和凯恩斯主义（总需求决定产出和就业）。按照这种粗糙的重商主义，对于中国这种本国货币并非世界货币的国家来说，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总需求的最终来源）是通过贸易顺差产生的外部需求，这种外部需求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又通过一系列渠道和传导机制（在中国主要是居民因买房而产生的债务）决定了国内投资和消费（仍然是通过房地产投资来传导）。如果外部需求出问题了，或者由外部需求到国内需求的传导机制出问题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无法继续了。

按照原作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上述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细思极恐”，其根据，大概有这样几条：（一）中国居民债务占收入的比例不断趋于上升，正在逼近极限，一旦达到极限，房地产泡沫将无法维持；（二）老龄化将加重房地产萧条；（三）房地产泡沫崩溃后，土地财政将无以为继，导致基建投资减少，而社保缺口将压缩领取社保人口的消费；（四）未来出口将因为欧美财政刺激支出用完而停滞，还会受到印度和东南亚的

蚕食。以上几点，最终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大约从 2025 年起开始落后于美国，并于十年以后导致“内战”（内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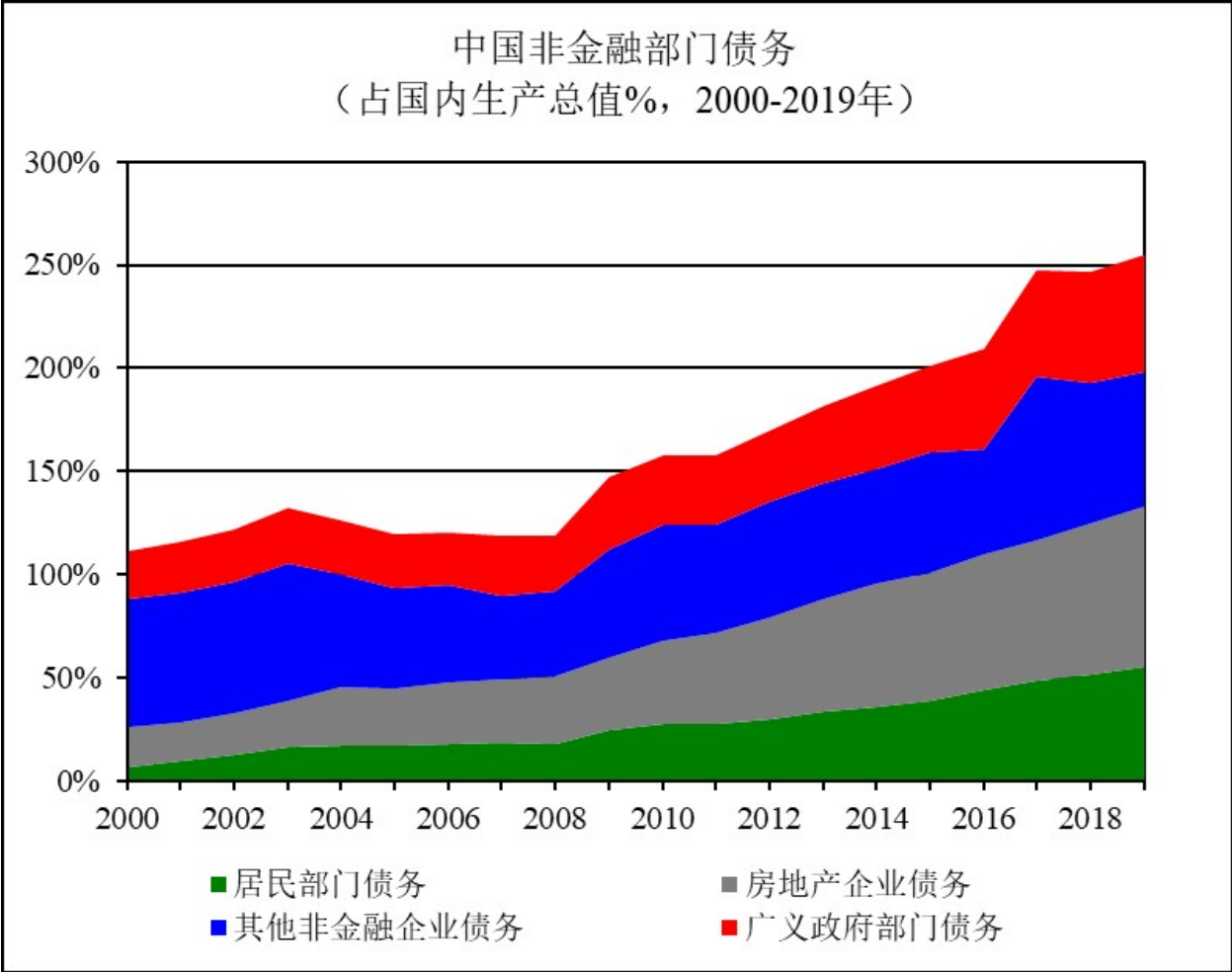
作者指出，中国政府尝试用产业升级来摆脱对房地产泡沫的依赖并实现经济软着陆（房市稳定“横盘”、居民债务用更高的收入水平来消化）。但是，作者认为，中国虽然有一些在个别行业领先的高价值企业（举了华为、宁德时代、隆基股份作为例子），但这些企业相对于房地产经济的体量太小。中国政府虽然以往渡过了几次难关，但是每次都是通过放宽货币供应、拉动房地产市场来拖延清算时间。

作者还将中国经济的前途与日本、美国房地产泡沫崩溃后的处境做了比较。关于日本，作者认为，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崩溃后，日本还可以通过占有中国市场来获取较高的国民收入。中国无法得到类似的历史机遇，因为中国无法占有足够大的海外市场来维持十四亿人的高消费。

关于美国，作者认为，在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经济体制允许资不抵债的居民破产（从而免除无法支付的债务负担），从而将居民债务转化为银行坏债，美联储再通过“量化宽松”将银行的坏债都买下来（实际上即私人债务社会化），从而使私人银行部门和居民消费都得以逐步复苏。关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作者只是说，中国的体制不会允许居民破产后不再给银行还债。站在作者的立场，也许作者还可以强调人民币不具备美元那样作为世界货币的信用，从而使得中国的中央银行不具备无限承担银行坏债的能力。

以上是对“中国经济，细思极恐”一文的梳理和总结。那么，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怎样看待这篇文章罗列的一些经济现象呢？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将在十年后面临暗淡的前途呢？

先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如图，自 2008 年以来，中国各个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规模确实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从 2008 年至 2017 年，非金融部门债务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2 倍增加到 2.5 倍。2018 年和 2019 年，非金融部门债务之和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致稳定。但是，2020 年，非金融部门债务之和进一步上涨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8 倍（由于 2020 年的数据不全，在图中没有显示）。

如果看各个部门债务的构成，推动非金融部门债务上升的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债务（2008 年至 2019 年，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33% 增加到 77%，增加了 44 个百分点），其次是居民部门债务（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18% 增加到 55%，增加了 37 个百分点）和广义政府部门债务（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27% 增加到 57%，增加了 30 个百分点）。

广义政府部门债务包括了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地方政府提供隐性担保的“投资平台”等机构的债务。2020年，中国的广义政府债务进一步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6%（图中没有显示）。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图中显示的居民部门债务仅限于居民部门对银行部门的债务，没有包括诸如“花呗”、“校园贷”、“租金贷”、“P2P”等高利贷性质的非正规债务，因而显著低估了居民债务对人民生活的实际影响。

从近日恒大等房地产企业的债务危机来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确实初步出现了破灭的迹象。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投资可能大幅度减少。中国现在每年新增住房商品房销售约15亿平方米。另一方面，每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口约1000万，按人均50平方米计算，需要新建住房约5亿平方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如果没有房地产投机的话，中国每年新建住房与新增就业人口的住房需要相比过剩约三分之二。房地产投资大约占中国经济规模的六分之一；假如房地产投资减少一半，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总需求直接减少约十二分之一。如果再考虑到房地产崩溃对相关产业以及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房地产崩溃对总需求的负面影响可以达到中国经济规模的十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

如果在未来几年，中国果然发生由于房地产崩溃引起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当局是否有应对的良方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现代条件下，对于纯粹因为总需求大幅度下降引起的危机，资产阶级当局只要坚决大胆地实行赤字财政并辅以大规模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只要在没有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前提下，一般是可以实现经济的基本稳定并避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大萧条的。

当然，从日本、美国、欧洲近年来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来看，在严重资产泡沫破裂并引起危机以后，资产阶级当局的宏观经济干预虽然可以防止经济全面崩溃，但却无法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在危机后摆脱停停走走的停滞局面。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将面临类似的困境，还有待观察。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由于总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发生困难而引起的危机（即资本家剥削工人所生产的剩

余价值无法在市场上按照商品所包含的价值变现)。我们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组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不在于剩余价值的实现，而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

熟悉我们的读者知道，多年来，我们一直指出，中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作为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在与外围国家（如非洲、南亚、东南亚）的贸易交往中处于有利地位，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在与核心国家（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的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通过不平等交换向核心国家输出剩余价值。

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出口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确实重要，但是其真正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中国经济，细思极恐”一文作者所说的，是所谓只有靠出口换取外汇才能发行“基础货币”（货币银行学术语，指的是流通中现金与银行系统中的准备金之和），而在于通过出口使得中国得以参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通过与外围国家的贸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低价进口中国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通过与核心国家的贸易，中国固然要通过不平等交换输出剩余价值，但是可以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后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必需的。

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优势”就是依靠对数量庞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表现为中国劳动者被迫普遍接受超长劳动时间以及超高的劳动强度；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之长（平均年劳动时间约 2300-2400 小时，大约是欧美工人年劳动时间的一倍半）、劳动强度之高，在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也是罕见的。

但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正在遭到中国工人阶级以及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的积极和消极反抗。特别是，随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步枯竭，为了维持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所需要的青壮劳动力正在迅速萎缩。2025 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队伍（特别是青壮劳动力队伍）将开始加速减少。

随着中国的劳动力队伍开始减少，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将完全依赖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才能够维持。以往，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于中国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与核心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一方面，通过单纯的技术赶超实现劳动生产率快速增

长的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在若干领域，随着中国资本家对欧美日的技术垄断造成威胁，核心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加强技术封锁（比如对中国的芯片“制裁”）。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依靠从核心国家进口技术和设备来比较容易地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不得不依靠固定资本的大量投入来勉强维持劳动生产率的生长。但是，固定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这种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一方面使得企业部门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债务过度扩张来维持投资；另一方面增加了中国经济在未来某个时刻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以及国内投资崩溃的危险（因为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开始下降到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利润率以下）。如果发生后面一种情况，那么，由于劳动生产率的生长无法抵消劳动力队伍的快速下降，中国经济将在未来的某个时期陷入零增长或负增长。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马列毛主义者的总任务，是认识并向广大劳动群众揭示中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的规律，并将这种规律转化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自觉的革命行动。

为了这个总的目的，我们要准备经过若干个步骤和阶段来争取实现劳动群众解放斗争的目的。

作为第一步，要揭露中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激发广大劳动群众对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仇恨、觉醒及反抗斗争的决心，同时展示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这一项工作，绝大多数马列主义小组以及各种进步工作团体，已经在做，并且正在取得越来越大的成绩。

第二步，是逐步掌握并正确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把握这一矛盾的基本发展规律，并据此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必然胜利做出比较正确、比较符合实际、能够为未来的历史进程所验证的回答。只有对于这两个问题做出比较正确的回答、得到比较符合实际的规律性的认识，中国未来的革命运动才能在思想和理论上站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我们对于未来革命的信心才能是比较坚定的，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的，而不是一有风吹草动就随时动摇的。

第三步，是要积极地参与和鼓动劳动群众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日常斗争。

在现阶段，这种斗争尤其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躺平”。具体来说，劳动者的“躺平”斗争，一方面表现为在工作场所力争以普遍的怠工结合偶尔的停工、罢工来反抗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或者是为生活所迫、或者是自觉地以不生、少生的方式减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所需要的劳动力再生产。

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条件下，不生、少生是一种可以直接减少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成本同时又能够给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长远利益以沉重打击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要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坚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如果不生或尽可能晚生，更好），那么只要一代人的时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新生血液（青壮劳动力）就将减少一半，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迅速枯竭，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将迅速瓦解。所以，在当前历史条件下，“躺平”是有革命意义的。

这种“躺平”斗争的进行主要是由劳动群众自己来进行，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也逼迫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躺平”状态。但是，**马列毛主义者对于主要由劳动群众自己进行的“躺平”斗争完全可以起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就是，我们要积极宣传“躺平有理”、“斗争有功”、“为资本家劳动可悲”、“靠资本家施舍而发财致富可耻”的观念，特别要注意批判某些青年农民工中仍然存在的“劳动致富”的陈旧观念，要在劳动群众中形成一种“躺平光荣”的风气，而且要让那些幻想“劳动致富”并且通过个人为资本家劳动给其他群众造成“内卷”的个别工贼成为群众中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随着“躺平”成为风气，随着剩余劳动力储备的枯竭，中国资本主义的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最多不出二十年，必然土崩瓦解。

第四步，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继续下降，资本主义经济转入零增长或负增长，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将陷入普遍的财政破产，中央财政也将出现债台高筑。



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地方政府将无法提供大量的基本公共服务。比如，地方教育、医疗、养老金、公共交通将无法维持，正式编制的公务员全面辅警化，辅警职能则外包给私人资本家或黑社会等。

随着资产阶级国家能力的下降，在若干地方（特别是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强大的地方），劳动群众可以自行组织起来，在暂时不公开挑战资产阶级政府权威的前提下，以自愿结合、民主自治的方式自行提供一部分公共服务，并且维持治安，打击黑社会。

第五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为了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斗争也必然激化（如果经济陷入长期零增长或负增长，那么这种斗争将更加激烈）。

这个时候，在经过一个时期地方民主自治的锻炼以后，在劳动群众中将涌现出一大批有政治才干的先进分子，将广大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以登上政治舞台。

这个时候，代表劳动群众的政治力量，只要审时度势，利用好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必要时，以满足资产阶级中某一派的短期利益来交换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长期利益，从而孤立并打倒资产阶级中可以打倒并且应该打倒的那一派，就一定可以创造条件，首先在一些最有利的地方建立一批地方工农民主政权。

中国的无产阶级只要有了第一批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又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正确的政治策略，从这里出发，就不难发展壮大；到那时，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烂到哪里，无产阶级的地方政权就发展到哪里，假以时日，必然得陇望蜀、问鼎中原。

## 试论无产阶级持久战及“躺平”在阶级斗争中的战略意义

(2021年11月25日)

远航一号

近日，红色中国网上的各位网友就劳动群众中日益流行的“躺平”实践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的重点，在于“躺平”实践在当前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重要的乃至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无关紧要的。

在进入“躺平”的主题之前，笔者想先说明一下，对于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以及未来的中国革命，我们应该采取怎样一种认识和分析方法。为此，有必要先学习毛主席在抗日战争之初《论持久战》中的有关论述。抗日战争之初，反动腐朽的国民党政府坐拥两百万大军，结果在所谓的“正面战场”上，一败于淞沪，再败于南京，华东国土精华之地尽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人民被屠戮如草芥，用梁漱溟的话说，全国上下一派“崩溃之象”。那个时候，不仅国民党方面失败主义大行其道，一般的所谓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也对前途怀疑动摇，以为亡国之祸已然不远。为什么呢？除了这些人的阶级局限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都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或者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主席撰写了《论持久战》的光辉著作。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分别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和中国人民方面的强点和弱点、优势和劣势。毛主席指出，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强弱差别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初期可以得逞于一时，也决定了抗日战争不可能速胜。

日本虽然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然而，它的侵略战争却是野蛮的、退步的，必然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中国虽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然而中国已经进行了“近百年的解放运动”，出现了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进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性、退步性和中国解放运动的进步性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胜利的可能。

日本虽然是强国，但是也有严重的先天不足，“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虽然是弱国，但中国也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

多”，可以坚持长期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来到中国，面临着“少兵临大国”的困境。中日双方这一方面的对比决定了，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对中国人民有利的因素则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性、退步性与日本无法支持长期战争的根本弱点共同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在战争初期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最终必然失败；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进步性与中国作为大国可以支持长期战争的优点共同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虽然在战争初期会经历相当的艰难曲折，但最终必然取得胜利。

目前，中国的阶级斗争发展处于一个相持的阶段。在这个相持的阶段中，左翼进步力量的发展面临着很多实际困难。一部分曾经满腔热忱、热血沸腾的进步青年对前途感到迷茫徘徊，看不到无产阶级胜利的前途，在精神上产生了动摇情绪，乃至发生了萎靡不振、自暴自弃的情况。**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尤其有必要学习和借鉴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的分析方法，一方面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的速胜论，但是尤其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的失败主义，树立起胜利的信心，建立起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持久战的决心。**

怎样才能建立并保持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呢？过去一个时期的经验表明，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靠教条主义，靠照搬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或段落，靠宗派主义的方法强行束缚和绑架青年的思想，是绝对不行的。这已经由大量曾经信奉“中帝论”、“灌输论”的青年在现实斗争中碰壁以后陷入精神苦闷、犹疑彷徨乃至一蹶不振的状况而得到证明。

多年来的斗争经验表明，**越是在暂时困难的时候，能不能、敢不敢、善于不善于在困难中看到有利的一面、光明的一面并将其作为可以指导实际行动的指南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标准。**

在今天的条件下，真马克思主义不仅应该帮助我们批判中国资本主义，更主要地，是要帮助我们认识和分析哪些因素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暂时强大，还有哪些因素是长期起作用的并且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

今天的中国是个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个怎样的资本主义呢？过去，有很多同志认为，中国已经是个帝国主义国家，还要与美帝争霸。对于这种错误观点，我们红色中国网已经在其他文章中多次做了批判。进步左派的斗争实践也表明，沿着“中帝论”的路线走下去，完全不能解决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无产阶级为什么必然胜利的问题，完全不能给苦闷中的进步青年以真正的、持久的信心，是一条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死胡同。

若干年来，红色中国网一直指出，要正确地分析今日中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必须将中国的资本主义与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联系起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国不是一个核心国家，也不是一个外围国家，而是一个半外围国家。

中国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完全占统治的地位，已经完全或几乎完全消灭了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残余，已经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已经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主要的阶级，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斗争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

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还意味着，与一般的外围国家相比较，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相对稳定和“繁荣”的，中国的资产阶级统治是相对统一和稳固的，内部没有严重的内乱、军阀割据或游击武装，资产阶级国家有相当的镇压能力，并且装备了所谓“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镇压手段。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目前暂时还是强大的，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可能很快地取得胜利，而要经历一个比较长时期的（十年以上的）准备过程。

另一方面，中国又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将来也不会成为核心国家，这个基本事实又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无法用从世界其他地方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来缓解国内阶级矛盾，因而也无法在将来建立起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秩序。中国资本主义无法在将来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将来有着以无产阶级革命（而非资本主义内部改良）的方式求得解决的可能性。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外围国家中，大多数国家是靠着出口某些高价值资源来维持半外围地位的，比如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巴西。与这些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个特点一方面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无产阶级的发展并且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特点。

由于中国不是核心国家，决定了中国资本家无法在绝大多数行业依靠带有垄断性的高科技作为竞争手段；由于中国的人均资源不足，又决定了中国资本家无法在世界市场上靠出卖高价值自然资源获取丰厚利润。这样，尽管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地位，**中国的资本家仍然要依靠残酷剥削广大的廉价劳动力才能在世界市场上维持竞争力，特别是依靠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中国的劳动者被迫从事非人劳动的程度是惊人的。据官方统计，中国劳动者年平均劳动时间已经达到 2400 小时（按每周 48 小时、一年工作 50 周估计）；相比之下，核心国家劳动者的年平均劳动时间大约在 1400-1800 小时之间（德国约 1400 小时、美国约 1800 小时）。实际上，大

多数中国劳动者的年劳动时间很可能超过了 3000 小时（相当于每周工作六天、每天 10 小时以上），相当于核心国家劳动者劳动时间的两倍。

中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中，保证了中国资本家享有世界上比较高的利润率，刺激了高速资本积累，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保持相对繁荣，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也使得广大劳动者丧失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同时，由于劳动者的可自由支配时间被极度压榨，从而失去了从事必要的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上住房、教育成本暴涨导致抚养下一代所需要的经济成本超出了劳动者家庭的承受能力，从而迫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以不生、少生作为维持生存的基本策略。

以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从农村源源不断地获取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但是，**现在，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支中国资产阶级过去几十年一直用来挑动劳动群众内部矛盾、反对城市无产阶级的战略预备队——终于开始枯竭了！**

据联合国人口预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 岁至 64 岁）将从现在的大约 10 亿减少到 2050 年的不足 8 亿；其中，最佳劳动年龄人口（25 岁至 59 岁，大致决定一个国家的就业规模）将从现在的 7.7 亿减少到 2050 年的 5.7 亿，平均每年减少约 700 万。

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口已经达到 4.6 亿，乡村就业人口不足三亿（其中农业就业人员总数不足两亿）。过去十年，城镇就业人口平均每年增加约 1100 万。如果今后城镇就业人口每年增加 1000 万，而最佳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 700 万，那么，到 2030 年前后，储蓄在农业中的产业后备军就将全部枯竭；到 2035-2040 年之间，储蓄在整个乡村地区的产业后备军就将全部枯竭。

在 1985-1995 年期间，中国经历了最后一波婴儿潮；其中，1991-1995 年，中国累计出生人口约 1.07 亿，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在 2016-2020 年期间进入劳动力市场。2016-2020 年期间，中国城镇就业人口累计增加约 6000 万，然而待遇较好、执行资产阶级劳动法较为规范的正式部门就业人员（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国企就业人员、外企就业人员）在此期间减少了约 1000 万，从而使得依靠残酷剥削的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官方统计中的所谓“个体就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变相的被资本家剥削的雇佣人员）总数增加了 7000 万。如此增加的 7000 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过去几年得以继续维持制造业中的血汗工厂剥削同时又大大扩张与所谓“平台经济”相关的“新就业形态”的客观物质基础（据官方统计，为所谓“共享经济”提供服务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驾驶员等达到 8000 万人，所谓“灵活就业人员”总数达到两亿）。

上述统计中，1991-1995年期间出生人口总数与2016-2020年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增加总数的差别，是由于在2016-2020年期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还要补偿在此期间退休的城镇就业人员，此外还有极少数继续在校学习、出国、留乡村就业、选择不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者过早死亡。

如果再往下推十年的时间，到了2001-2005年，中国累计出生人口减少到8200万，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将在2026-2030年期间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是中国人口的出生高峰，1966-1970年，中国累计出生人口约1.34亿，这些人将在2026-2030年期间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如果其中一半是从城镇劳动力市场退出，那么，到2026-2030年期间，中国的城镇私营和个体部门可以新获得的廉价劳动力将只有1500万，与2016-2020年期间相比将减少五分之四。

**中国资本主义的各个经济部门都高度依赖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模式，连所谓的高科技“研发”部门也不例外。这种剥削模式只有依赖源源不断的青壮劳动力的供给才有可能持续。随着青壮劳动力供给的枯竭，不仅制造业的血汗工厂模式难以为继，所谓“平台经济”赖以运行的“灵活就业形态”也将陷入困境，能够承受超高剥削强度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驾驶员将越来越少，而大批依靠“平台经济”来“节约”各种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时间以维持他们自身超长劳动时间的无产阶级和小资劳动者的脆弱生活平衡也将被打破，整个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阶段劳动群众已经普遍自发开展的“躺平”斗争有着战略的意义。**在当前的“躺平”实践中，人们对于“躺平”的理解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不再受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绑架，主动消费降级、不买房，从而减少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二）面对日益高昂的抚养成本以及被压缩到极限的可支配时间，从生儿育女的传统观念束缚下摆脱出来，不再承担生养义务，不生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三）放弃发财致富和“阶级跃升”幻想，在资本主义工作场所反对劳动者相互之间“内卷”，不求“上进”，主动“摸鱼”，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对抗资本主义劳动纪律。

这三个方面的“躺平”是相互联系的，又都可以打击中国资本主义。主动消费降级、不买房，就可以减少挣钱压力，使得劳动者可以选择少加班、不加班，减少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上的有效供给。少生或不生可以直接大幅度减少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上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加速中国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剩余劳动力的枯竭。**随着剩余劳动力的枯竭，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将逐步占据有利地位，迫使资本家让步。这种让步，将不仅体现在资本家不得不给工人涨工资，更主要的，也是更加有革命性的，是这一力量对比的变化将造成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逐渐瓦解，以及劳动者逐步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从资本家手中夺回到自己手中。**随着劳动力市场上新增青壮劳动力的枯竭，资本家对现有劳动力将变得越来越依

赖，即使发现劳动者“摸鱼”也无可奈何，不敢随便开除；资本家的这一虚弱本质将被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发现，劳动者在工作场所也将变得越来越大胆，想“摸鱼”就“摸鱼”，不再顾忌。到那时，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国营企业工人某种程度上违反自己的阶级利益用涣散的劳动纪律搞垮了社会主义残余一样，未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将在新的历史时期自觉地、在符合本阶级短期和长远利益的条件下用普遍的“躺平”搞垮中国资本主义。

那么，中国的资本家能不能用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办法来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弥补剩余劳动力枯竭所造成的困境呢？实际上，中国的资本家已经在这样做了，而且已经将这些手段用到了极限。在宏观上，中国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独一无二地将几乎全部资本家利润都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国家（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储蓄大致被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所抵消，所以资本家的总利润大致等于新增加的投资）。尽管这样，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仍然在趋于下降。

2016-2020年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按照官方统计年平均增长约6%（其中一半可能是统计水分）；在同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劳动比（相当于马克思说的“资本技术构成”）年平均增长约10%。这就是说，中国资本家每投资一定量的资本所能够带来的收益是不断下降的，每年下降约4%，五年时间即下降约五分之一。

这种趋势进行下去，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将下降到低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到一定程度，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将发生投资崩溃或大规模资本外逃，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将大幅度下降，无法再抵消劳动力总数的下降。到那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就将陷入零增长或负增长。

一旦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不再增长，赖以支撑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的最后一根心理和社会支柱也就坍塌了。劳动者们将普遍、自发“躺平”，资本主义劳动纪律将全面瓦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总危机，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将陷入无法自拔的财政危机（现在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已经入不敷出），资产阶级中央政府到那时也没有财力来补助地方政府。这样，一方面资产阶级国家在地方的镇压能力将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原来由资产阶级地方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职能也将陷入全面瘫痪，这就要求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以民主方式管理地方公共事务（而资产阶级国家地方镇压能力的瓦解也将为人民群众的自我组织提供便利）。到那时，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就将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于全国各地。

总之，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繁荣”、资产阶级统治的相对稳定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半外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国资本主义剥削体制赖以维持所需要的剩余劳动力逐步枯竭，却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

**在未来十年或稍长一些时间，马列毛左派的积极分子应当下决心，与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起，开展针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持久人民战争。这种持久人民战争在现阶段**

**段的主要办法，就是用普遍的、大量的、由自发到自觉的“躺平”消耗资产阶级、增加资产阶级的困难、提高资本主义积累的成本，结合中国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上剩余劳动力逐步枯竭的总趋势，一步步地将中国资产阶级逼进绝境，直到资本主义劳动纪律全面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全面瘫痪、资产阶级地方政府风雨飘摇，从而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准备好一切必要的条件。**